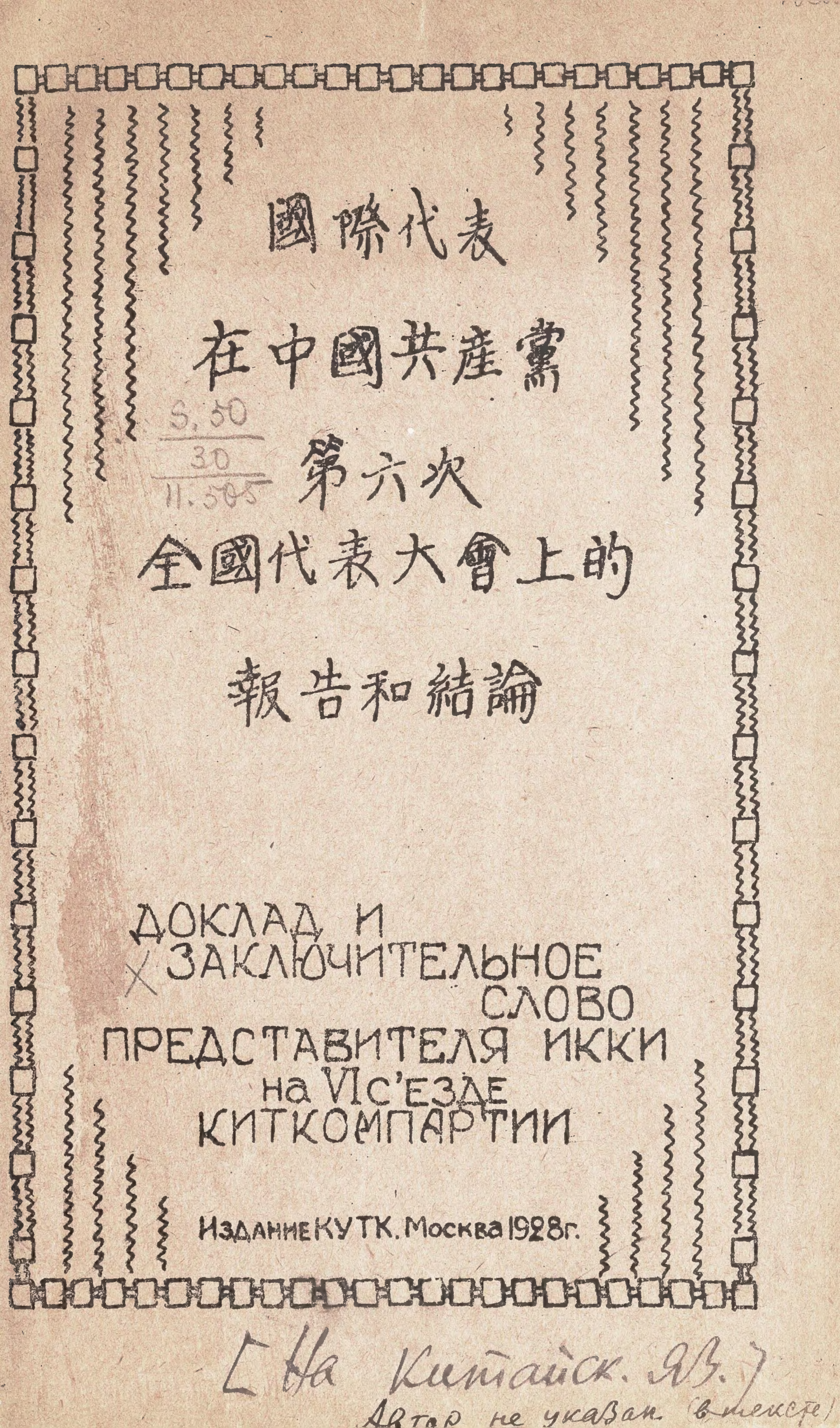


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

ДОКЛАД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ИККИ на VI с'езде КИТКОМПАРТИИ

Издание КУТК. Москва 1928 г.



Доклад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ИККИ на VI съезде Киткомпартии.

國際代表在中共第六次大会上的報告.

同志們，我報告的開始先簡單的分析一下已往国际形势，和現在我們所生存着的時期内国际革命，即国际工人運動所经过的几種發展形式

我覺得，我們現在正在進入国际革命運動的第三个時期，第一个時期是緊接着帝国主义大战之後發生出来的，這一時期中主要的表現，就是在許多国家内發生了緊急的革命的危机，首先就是在歐洲各国，其中有俄国的两次革命，都是勝利的革命，其结果由工人階級奪得了政权，其中又有德国的革命，奥匈两国的革命，德国工人階級几次三番的企圖加深革命和奪取政权，有意大利的深刻的革命的動發，匈牙利及其他許多較小国家的内組織蘇維埃共和国等；這个深刻的革命的恐慌的表現是群众的直接進攻，歐洲大陸上工人階級向資産階級的武裝战争，和在国家許多裡面的農民的大暴動（例如在匈牙利，羅馬尼亚，波蘭的一部分等）這个革命的危机如果整个的拿起来看，那么是工人階級失敗了的。

工人階級所以失敗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為在西歐工人運動中间，全然没有團结緊密的和組織良好的共產党，而且在許多国家裡面，竟只有一些分散的共產主义者的小團体，或者因為——這第二个原因是和第一个原因密切的相联繫着的——西歐大部分的工人階級分子是还在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影响之下。

工人階級的失敗，是異常深重的，尤其是在以下的這些国家裡面，比如法国，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部分拿了武器投身到戰爭中去，遭受了流血的失敗，喪失最

好的中堅分子，而且喪失這樣偉大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像如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許多別的人。工人階級既遭受了失敗，資產階級就能夠在某種程度內從新開始新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循環，容許了資本主義以及整个的資本主義結構進入一个新發展時期。所以工人階級的失敗，剛々做資本主義新時期的発出點。

工人階級失敗以後，資產階級往々用新的方法或者用新的辦法，例如意大利所発生的法西主义之類，去開始鞏固把自己在第一時期中破壞了的資本主义經濟，如果在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一時期內，我們看見經濟關係是遭受了深刻的破壞，極大的經濟的解体，許多國家降為赤貧，生產力衰困不堪，金融和貨幣制度紊亂不堪，總之，一切的經濟生活都已經解体，那從在工人階級失敗以後在由于工人的失敗，而資產階級的政权稍々鞏固了一些以後，資本主义的經濟是恢復得很有限的，資產階級化了很大的力氣，然而終于開始使貨幣流通，信用制度，都恢復起來了，開始將企業的裝置稍々改換了新的利用着工人階級的困難狀況，用全身力量去進攻工人階級，以求從工人階級身上去榨取出前一時期中所不曾有過的巨量的額外利潤，而將這利潤的大部分去用在改變企業裝置，所謂改變企業的裝置，就是在企業內改用新的生產工具，而改用新的生產工具，又必須有新的勞動組織方法，使工人比前要工作得緊張得多，工人在以前斗爭中所獲得的許多勝利條件，又被取消，因此由于向工人階級竭力榨取，由于取消工人階級以前勝利中所獲得的條件，由于強迫工人階級比以前更緊張更努力的去工作，資產階級開始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礎上去進行他的資本主义的生產了，在這一个時期內，有了不少的新発明，其中大部分是在大戰時候，關于化學方法，電學之類，以及許多其他方面的技術的新発明，此時都被采用

着来改造或改良資本主义经济了，因此由于一切這些原因，資本主义終于提高了他自己的经济，而如果我們不單讀西欧，同時把全世界的資本主义经济来看一看，那在我们可以知道，資本主义的確把自己从战後的百般混乱的情况中救起出来了，把自己的经济中的生產力，先是恢復到战前的平面，然後是超过战前的範圍，不僅如此，我们並且可以說在技術方面，資本主义竟能够進行了不少技術上的革命，將工業和他的生產机關大大的改造了一下，同時並且創造出了战前所未有的偉大的企業，人所新提的托拉斯，联合銀行等等怪物一樣的强大的企業来。

第二時期中資本主义經濟中的经济發展關係的是，這个樣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单把資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一下或察看一下，是不能够盡知道一方面的情形的，我们不能說這一時期中資本主义已经 好了他在战爭中所受的一切重傷，資本主义的经济虽然一般的高漲，可是資本主义的躯体中本身还含着許多極大的病根很大的矛盾，而且這些矛盾，终于必是要向前發展的。

這些矛盾是什么？第一就是資本主义虽然有了這一種我上面所說过的技術上的革命，可是到底不能够消滅或消去掉他背脊上所背着的一个由战爭中所得来的頂大的矛盾，這就是由苏联的存在，而發生出来的矛盾，我们国家内的工人專政，乃是革命勝利的結果，我们国家内的革命勝利同時，又是從沙皇国家在战爭中所遭受的深重的战爭的震撼深重的战争的危机和許多败仗之中所產生出来的，大家都懂得的，就是資本主义如果能够不僅々恢復了他自己的经济，並且能够殺死了，縊死了，消滅了他自己的躯体中所發生出来的，這个新的完全另外一種類的肢体，像苏維埃共和国，那么他的事情，可以就是完做了一大部分了，但這件事他却做不到。

其次我們要知道由于战争時和战爭後全世界資本主义经济都受了極大的震撼的袭擊，在歐洲方面，故然發生了 工人階級的暴動和誕生了蘇維埃共和国，同時在殖民地中间，亦增加了許多暴動，許多殖民地的民家都利用了資本主义的结構在战争中衰弱了的時机，于是在地球上許多最偏僻的地方都發生出 殖民地、半殖民地来。

我們應當指出来，在地球上很大的疆域内，例如中国、印度、安南、和埃及的一部分，至今不但資本主义还不能够消滅和撲滅由戰爭所產生出来的殖民地民家间的運動，並且在地球上許多僻遠處所，第一是像中国共和国這樣疆域廣大的国家内，帝国主义的地位，反而非常困难了，虽然牠們的力量是那么強大。因此，不单苏联的存在，是整个資本主义整个資本主义系统深刻危机的表現，並且殖民地運動的日益激烈，同樣的亦表現資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漲，亦是從帝国主义大战的歷史基礎上所發展起来的新矛盾。同志們，不用說的，有了這两个矛盾，別的由資本主义穩定本身中發生矛盾的，自然和牠們發生相互關係了。從資本主义穩定中何以能發生矛盾，因為資本主义的生產力發展的時候，一方面這些生產力固然發展，然而這發展是采了強大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形式而發展着的，這些国家是時々的準備着彼此互相衝突的，牠們的生產力愈大，牠們所需要的市場亦愈要擴大，市場是日本要美国亦要，英国要法国亦要，法国要德国亦要的，因此資本主义经濟愈向前發展，則資本家愈加急迫的要去找求出賣自己的商品的新市場，找求新的投資地，新的原料出產地等々，資本主义经濟愈發展，則牠們中间為争一切這些市場而互相角逐的爭鬥亦更激烈，而他們中间矛盾亦就更厲害了，這就是說剛巧是在資本主义结構和他的經濟穩定這些基礎上，發

展出牠内部的矛盾来，無可懷疑的，最近战爭問題在我們一切人的面前異常緊張，竟是每天更加緊激烈起来了，資本家為爭奪市場，引導人類到新的大战的路上去，于是資本主义關係發展的第二時期又过渡到第三時期去了。如果第二時期，可称為資本主义的局部穩定的時期，是資本主义經过1918年至1922年的大風潮之後又生長起来，鞏固起来，產生了新的連繫，增長了經濟的關係的時期，那么第三期時首先就是資本主义旧有的矛盾和新生的矛盾一齊發展一齊擴大的時期，苏联與資本主义国家间的關係，一天天惡化了，緊張了，資本主义的世界要得取新市場，同時消滅從苏联的存在所發生出来的社会的危險，因此各国爭先恐後的，瘋狂似的武裝起来，因此有許多次的企圖包圍苏联，因此战爭的危險就加緊了。

帝国主义国家與殖民地中间的關係也緊張起来了。中国的同志們自己背上親身嘗着這个味道，所以知道的一定最清楚，各个国家相互之间，不但是苏联與各資本主义国家之间，並且是資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關係亦一天天緊張了，我來举一个例，比如：英国與美国中间的關係，多少時候以前，許多我們自己的有識見的同志們和徹底的經濟学者，还說他們是互相合作的，但現在都已經非常的明顯，英美兩国是成了死对頭了。

最後我們看見歐洲内部，各階級之间的關係亦緊張起来了，因為跟着資本主义穩定的增長，对工人階級的榨取亦一天天的加劇。在国际工人運動發展的第二个時期中，工人階級因為剛剛失敗，自己的地位非常困難，所以没有力量去抵抗，但是大战之後牠慢慢的回復了一些精力，重新整頓了，或更正確些說：開始整頓了自己的隊伍，那時候，資本家們再要向他進攻，牠可就要反抗了，于是工人階級就左傾起来，革命化起来，共產党

的力量就加强起来，于是階级鬥争剧烈起来。

這就是國际革命運展的第三个時期，第三期的性質在殖民地方面的表現，首先就是中国大革命和帝国对中国大革命的战争。在欧洲方面，就是工人群众的革命化，和各国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战争危險，這一个時期重新又挟着最大的歷史的災禍的預兆降臨了，在劳動者資本之间，在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都将有極大的爭鬥，現在的形勢正在發展着，一个偉大的階级鬥争，無產階级与殖民地被压迫民众，以全世界全地球的規模起来反抗的階级鬥争，像這樣偉大的爭鬥，是人類歷史上所没有的，是全世界歷史上一些也没有逢到过的。

這就是目前國际革命運動發展時期的特質。

現在我轉到本題上来，講中国革命的世界的意义，據我所能知道的，中国同志中对於這个问题有兩種意見，這兩種意見之不同，对于策略上所得出来的結論是有関係的。有一些同志這樣說：我们的革命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革命是国際革命的一部分，這就是說：甚至於假如中国革命並不是無產階级的，但是因為牠是反帝国主义的，而帝国主义剛又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的障礙，因此我們中国的革命就此成為国际革命的一部分了。

另有一些同志以為中国革命之所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並非因為牠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因為牠是將要轉變成社会主义革命，因為牠遲早總要过渡到無產階级革命一樣，是国际工人革命的一部分。

據我和中国同志们的談話中所能了解的，這兩種不同的意見，是和不同的策畧上的結論，有連帶関係的，這些策畧上的結論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講，現在呢，暫且專門来討論這兩種意見。

同志们：我应当說，如果我们拿這兩種意見来對立

起来，彷彿是两種彼此不能相容的意见。那么，這種說法是不对的，假如說：今天中国的革命已死了，今天或者明天已经再不存在了。或者假如說：中国的革命在北伐後就死也了，那么從一九一一年到今日，連北伐在内的這一段時間之内的革命，顯然不是無産階級革命，也決不会有人說，這革命鬪爭中的最後一組的北伐，直接是無産階級革命的一部分，然而這个革命，從牠最初的階段看起，所有一切对帝国主义者的同盟抵制，一切的排貨運動反帝国主义的罷工，对擁護帝国主义的封建者爭鬥，等等運動，都無疑的是含有極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所以一般的講來，如果這革命不是無産階級的，祇是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结構，並且甚至如果這反帝国主义的爭鬥，是由民族資産階級来進行的——就是像這樣的革命，也还是有国際的意义，如果在中国這个革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大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許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的，牠就必然带有国際的意义，你們要看到在中国駐紮着許多外国列强的軍隊，有許多外国船舶，從比利時的一个小船起直到英美国家的大船，就像這樣的革命，其国際的意义，也是極明顯的，因為牠損害到許多国家中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不单是本国的資産階級本国的封建主，亦不单是某某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而已，而如果牠是国際式的向着許多帝国主义国家進攻的，那么牠本身就帮助併行存在而彼此一致的許多国家中的工人階級，如果牠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如果牠同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如果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如果牠此外比如在某一時期中那樣，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去擁護苏联，那么非常明顯的，牠是减輕了英国革命工人的爭鬥中的困難，减輕了美国革命工人的爭鬥中的困難。同樣亦是無用懷疑的，就使中国革命祇發展到了這个階段再不進行了，他还是

帶有国际的意义，因而不能不說是那總的，大的，有全世界歷史意义的，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可否將這種意思与另外一種見解相对立起来，認為只有這樣才是世界革命一部分，而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当然不可以的。如果中国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段階中去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了，而继续的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発展下去了，這樣難道他就不成為国际性的革命了麼？决然不会的。在這个階段中他是否仍旧是国际性的革命了麼？但是意义否是有些相同呢？是有些不同的。為什么？因為他將要不单反对帝国主义，並且直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部分，他將不单在整个的意义上成為国际革命的一部分，將不单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中一个助力，並且將要成為更狹义的更名实相符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举个例来說明這句話，假定說在埃及或波斯，或一个什么别的有很多農民而簡直沒有無產階級的国家裡面起了暴動，假定這个暴動要想奪取政权，要把帝国主义被趕出去等等，這革命是否国际革命的一部分呢？是的。為什么？因為這是一个能減弱帝国主义統治的力量，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个助力。如果举一个别的国家，在那裡無產階級是在進行革命，或無產階級的革命已在進行着的，這是不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呢？也是的，但是這和第一个例中的情形是否一樣呢？不一樣，不完全一樣，广义的說：這个那个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一个例子中間，因為他是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中的一个助力，所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第二个例中间呢，這革命已经不只是一个助力，且是更切適的意味上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或者說：這个革命直接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部分。這樣講来，他們中間当然有些区别，這个些小区别，当然在以後的発展中要大力地表露出来的。

假如在某一个国家裡面，是没有無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是非常弱的，或者是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轉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程度的，而革命勝利了，那么那裡是獲不到直接建設社会主义的。唯有在無產階級已經得了勝利把国家政权拿在手裡，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国家裡，在某一定的条件之下，方可以直接開始建設社会主义。這当然是一个區別。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什么殖民地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是無產階級的国际革命，都是国际革命中的一部分。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無產階級的革命可也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而且這種革命是更近于直接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其中更直接的部分呵，再重复一句罷，在某个例中間，這革命是無產階級運動，無產階級奪取政权的爭鬥中的一个助力，或更正確些說，這些是国际無產階級奪取政权的爭鬥中的一个助力。但在第二个例子中間，這革命乃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权的爭鬥的本身之中，一个直接的部分，因此，如果拿起中国的問題来看，那怕革命的实际領導权，是在資產階級的手裡的時候，試問那時中国革命是否国际革命中的一部分？是的，因為牠會帮助別国的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权，反过来看，如其牠更進一步，取了新的形式了，那么，牠的国际的意义就更加大了，我还可再重復一句：如果中国革命的第一種形式是帮助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权，那么社会主义階段的中国革命將不但繼續是世界革命中之一部分，而且要成為這奪取政权的爭鬥中一个直接的部分，因為那裡的工人階級也將要為政权而爭鬥。

因此所以我曾経說，関于中国革命何以有国际性的問題，這兩个答案是不能当做兩个互不相容的答案拿来对立起来的，我們不能說，贊成了這个就不能再贊成那个，如果第一个对，那么第二个就一定不对，也如果第二个对，那么第一个一定不对，一般的講来，兩个都是对

的，問題只在現在中国革命是在什么階段。但這却是另一問題了，這另外一个問題，我要在詳細講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質的問題中再來答覆。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革命在他过去的階段中，在他現在的階段中，在他將來的階段中，都無疑的含有極大的国际意义。他有極大的国际意义，第一就是因為他有極大的数量上的撼動，中國有很古很古的文明，他雖然比其餘国家落後，可是同時却是一个人口異常稠密，疆域非常廣大的國家，這是誰都知道的。由于人稠地廣這兩个要素，所以中国的人口也非常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两个，中国和印度，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是人類材料主要的後備軍。這是地球行星上最大的人群所在。因此就非常明白的，在我們考察我們這地面上走到处翻騰着的偉大的歷史过程，所謂国际革命的过程的時，我們就要来問一問，這被牽引到這过程中来的人群是怎樣一些質地，因為国际革命的前途是大部分依賴于這一点的。因此列寧在臨死的時候所做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問題是完全正確的。他分析我們的苏联我們世界状况和国的地位時曾一直的提出了一些這類的問題，他說：我們恰恰处在敌壘之間，我們的命運如何，到底要看這些偉大的人類材料的大準備，如中国印度等地能以如何速度被捲到革命運動中來而決定的。我們覺得列寧這種預言完全被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証实了。如果捲入運動中来的不是中国民众——這民众二字我所指的是劳動群众，即工人農民和一部分的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等等——中任何一部分，而是全部，那么我們將战勝帝国主义已可斷言了。如果這裡能夠決定我們对帝国主义的勝利，那么這就等于說，帝国主义的整个系統中有了空前的破裂。只是須計算一下苏联有多少人，中国印度有多少人，我們已經得到了大多數，地面上生存着的人類中

的絶対人多数了。不待言的，不論從那方面来看，随你從市場和經濟関係方面，或者從直接的政治争鬭方面或者從武裝的勢力方面来看，群众到底决定一切——因為就是在武裝争鬭中亦还是依靠人力，如果没有人力单々依靠技術，那么無論怎樣完善，武装争鬭即使不致完全不可能，到底亦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数量方面的事等于一切。参加運動的群众数量是最後的决定者。

在資本主义的国家亦未嘗不如此。工人階級之所以能夠勝利，畢竟工人是群众而並非由于工人有什么特別的本領（他須去爭得這个本領；而其所以能取得爭得這个本領還是因為他是群众的力量），這数量方面的問題，拿全世界的歷史規模来看，亦是一樣，中国四万万，印度約三万万，已有了七万万，再加苏联一万五千万，共有了八万万五千万這个大数量的人群擺動起来其力量就足以决定世界争鬭的勝敗。因此所以中国革命有偉大的国际意义。因此所以每个有革命思想的真々求他自己的階級勝利的無產階級者，也不看輕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中国革命首先对于東方許多国家有直接的意义，对于印度，对于印度安南，对于馬来群島，都有直接的意义。這些国家的革命潮流如果沸騰起来，假如說：印度脱離大英帝国主义的羈絆而独立了，亦就等于帝国主义战線的大破裂。中国的革命假如果和印度的革命一同勝利，那就等于最大的崩裂，或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滅亡，日本和英国這東西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強国，两个最大的海盜国家，是决不能生存的，如果中国革命和印度独立的發展起来。

並且如果這樣，那么美国這个怪物一樣厲害的共和国家的力量，也一定大坍其台，不过，不用說的，如果以為發生了這樣事，而不跟隨着發生全世界最大的革命，那簡直是笑話了。如果中国和印度革命勝利，那么英国

的無產階級必然要空前的革命化。日本必然要起急劇的非常大变，而這些事件的本身又必然成為一種力量去推動許多别的国家内的工人運動的發展而釀成全歐空前的革命。這殖民地与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与压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之間的関係，馬克思早已說过了，現在却在我們个々人的面前实际的展開，我們一伸手就觸得到。如果印度脫离了大不列顛帝国主义，如果中国的市場脫离了英國的勢力範圍，那么英国資產階級必將非常困難，而英国共產党及大不列顛工人中革命部份，奪取政权的斗爭必將非常輕易，把將使大不列顛的政权与工業非常艰难，而國内將發生空前的恐慌，把將使在大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引起直接革命的革命騷動，而迅速的引導大不列顛的無產階级起來暴動以反对大不列顛帝国主义，因此过程的數量方面，即中国有如此的众多的人口，這件事使国中的革命自然而然的就会帶有極偉大的意义，這種意义首先要在許多東方国家中發生作用，而中国与印度革命勝利的結果，即等于將帝国主义統治的最重要的堡壘從基礎上打得粉碎，這就是中国革命在他的一切發展階級上所含有的国际意义——只要在這革命是發展着的是向前進着的——所以等于全世界的歷史的国际的革命过程中最大的槓杆的原因。

同志們我現在說到我報告的第三部分就說到中国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的問題。

我開始就說第一个問題，就是在中国一般說起來究竟是否有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這个問題決不像開始一看那樣簡單的。許多人以為所謂社会主义的革命，就是在這个革命中工人佔有主要的指導作用的革命，以為這樣便已够足了。但是這是不正確的意見。或者工人階級在這个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而革命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於工人階級已经得着了政权然而没有能力来

建設社会主义，決不像許多人所說的一樣，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將工廠製造廠土地等分配了就完事，這並不是社会主义，在落後的国家中，在俄国在中国以及在許多其他的国家中，以為將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了，將土地上一切需要的東西都分割了——社会主义，將工廠作坊分配了——社会主义，米店的倉廪打開將他的米平均分配了——社会主义，將店舖拿來而將裏面的商品都平均分配了——社会主，但是這決不是社会主义。這不过是將全国的財產土地，私有物店舖，商品……等々給了總平均的分配，在這裡與社会主义一点共同的也絕对沒有。社会主义不是這樣的了解的。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種社会制度在這種制度的時候，广有工廠與造廠、等々在受工人国家的支配管理，大家都知道真正社会主义並不是要分散財產的。而建設真正的社会主义还要在這个国家中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条件，這種建設的条件就是大工業發展的程度。假使沒有大工業，假使沒有经过工人階級国家政权而進行的有組織的生產假使生產是散漫的，假使存在的有數十万數百万的小工業，假使沒有大工業，使他成為無產階级国家的財產使他成為一个整个的而可以按照一定的計劃進行——則便沒有社会主义的前提。假使在這種條件之下，即使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权，那么他在第二天能做什么呢？他想這些組織手工作坊么，但是手工作坊有數十万數百万怎樣能以組織呢？当然是不能組織的，因為他不能計算，他可以生產好多在当用什么樣的總計劃他們中間应当怎樣分配工具等，既然是這樣散漫的经濟，則不能用一个總的計劃或總的管理來联合他們則因此不能建設社会主义，一切都能勝利，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建設，仍是一点社会主义氣也是不能聞着的。在這種国家中，即使工人階级奪取了政权，他最後仍是不免於失敗因為他不能建設社会主义，在几十几百

另外企業中他是不能進行有組織的经济的，假使工人階級不能組織自己的经济基礎，也没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則他最後便没有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保持自己的政权，或者他不能执行社会主义的利益，他可以执行另外的利益另外的任務，則仍是等於工人階级失掉了自己的政权而执行别个階级的利益。工人政权仍是变成了另外别的階级之政权，因此，当着我們指出在某一个国家能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並社会主义革命勝利之可能的問題就是在說某一个国家他是否有使他不能独破坏旧的，則我們绝对要研究在這一个国家中是否已有了物質的经济的最低限度的前提使工人得政权以後可以继续前進而組織自己的经济。

当着在我們蘇联提出建設社会主义之可能与否的問題的時候，我們認為（事实的经驗也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在我們国家中是有這些條件的，在我們這裡是有這些最低限度之東西，在這个最低限度之基礎上我們是能以組織经济的。我們国家的经济事实上也是逐漸前進的。但是同志們，我們在过去以及現在都承認，我們所有的已经是這種建設之最低限度的條件了，假使我們国家若是比較事实這樣再有三四倍的落後，而又没有其他各国之工人階级的经济帮助，則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在我們国家中当不会放在議事日程之上的，那末我們在這十年中間，一定是已经退倒台而失去自己的政权的。我們没有倒台，仅是因為我們已经有了我們国家的大工業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質的经济的建設前提。

假使我們說到中国，則我們对於這問題的答覆，最低限度是有很大的怀疑，我們很怀疑中国無產階級能依靠着中国经济而自主的，在中国基礎上建設社会主义，中国之大工業与其他经济形式的比重是要比較俄国更不順利些。假使在中国没有組織大資本主义生產的外国資

本則中国経済还要更為混淆些。固然，即使在俄国，為没有外国资本之侵入，巧然也是没有事实上那樣大的大工業与其他经济之相互關係。但是在中国這種特質就要更為不好些，因此我們更比較可信的說，中国工人階級即使在他已拿取了自己之政权時候，仍是单独的不能做這件事的。他一个階級建設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或者簡直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說在中国建設社会主义或是說中国之非資本主义的發展之問題，乃是一種特别的方式地不能像西欧一樣，不像对於以前之沙皇俄国一樣，也不像在現在的苏联一樣。

中国的同志們，你们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当相很清楚的细看事情的本身，不要有一个表面是社会主义的而事实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一个很大的小資產階级的空想就是將社会主义認為是平均分散主义。以為平均分散，澈底的平均分配這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每種分散的行動都帶有社会主义的性質。因此更有了对於農民就是說对於鄉村小資產階級之社会主义的估計。社会主义的性質，関於這个問題我以後再說。這裡我只想特别指明一句，若是机械的將西欧及苏维埃联邦的经驗，很、板式的搬到中国去，則完全是不正確非馬克思非列寧主义的。在我們的運動中，以及整个共產国际的指導中，都有一很大的危險——列寧当時也指示出来了的——就在於將俄国的经驗机械的直接轉運於其他各国去。我們的影响，我們革命的影响自然是很大而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們是自觉的指導的，指導所有各処的革命过程我們絕不能机械的死板的將這一国的经驗搬到另一国去。將這一国的经驗，应用到那一国的時候，应当研究分析所在国的特殊的一切発展的條件。假使我們未分析中国発展之特殊條件，假使我們站在研究中国能否非資本主义的发展能否有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的問題之观点

上，則我們應当說只有在一个條件之下可以使革命真正有社会主义的性質，就是說使革命的結果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設——這个条件就是当着這種發展是依靠着要他国家之勝利的無產階級的，是那一国的無產階級呢，是蘇联的还是其他更大的更進步的技術最高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這要在鬥爭中来决定，要在实际事变中来說明無論如何，我們不要空想，也不要过於着重了自己的力量我們仅只有這个條件之下可以真正的使中国將来的革命轉变為社会主义的革命，使這種革命可以担保社会主义建設的勝利。

我們現在問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質呢，不是問他的將来，而是問他的过去和現在。

在共產国际最後的一次的执行委員会上，所通过的関於中国問題的决議，他認定中国革命現在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階段，這个名詞在部分中国同志中間引起了很大的誤会。我認為中国革命現在及过去的性質，以及関於資產階級民主性的解釋，是决定正確策畧，了解中国事变的基礎。

我開始要說一个時常可以遇見的很多的很熱烈的反对的意見，他的話大概可以這樣說：資產階级的民主革命仍是資產階級的因此這不是什么好的是个不大好的東西，那末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党员应用什么樣的関係对待他呢。並且还有一个時常反对我們的論語說：既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為什么我們的鬥爭又是反对資產階級的，或是說，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什么要沒收地主的土地，為什么能破坏私有制度，因私有制度是資產階級之基礎，表面上好像這裡有很多的衝突矛盾一樣：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他的領袖又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又要破坏土地的私有权，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我們為什么要做這樣混蛋事，去完成什

么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什么鬼蚤又需要這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呢？

這几个問題，這几个好像是矛盾衝突，我認為應当說明的。我首先想說在現在中国發生了些什么事，這些事最好是用事实的例子来說明，現在中国每一个工人每一个農民都知道革命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不仅是反对土豪劣紳，封建軍閥，並且也是反对中国資產階級。這是很明顯的，現在是由土地上趕走地主，是要推倒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勢力。誰也知道現在革命動力是工人農民或者还有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份。關於動力方面自然是什么没有争論的問題的。大家都明白，工人階級在革命中是有領導作用而農民是他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就數量之比較說来，則革命中之最大多數的人口是農民，工人很無疑問的只佔了少數，还有是大家所都明瞭的，現在革命所能做的最大的事件，能使革命傳播到最遠地方而能為革命之基礎的——一方面是土地革命，就是要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鬥爭，我要問同志們，工人階級帮助農民实行土地革命是不是可以的呢？這不是可以的嗎？假使工人階級引導廣大的農民群众　　　　趕走一切地主，奪取一切土地，使土地都給農民分配，這裡有不好的非無產階級的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所不應該做的事呢？這裡难道有什么不好的嗎？我想這裡都是好的，假使工人階級引導廣大的農民来趕走日本人英国人，將他們的統治根本剷除，這裡有什么不好呢？我想這裡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有好的。假使我們党定出工農專政的任務，就是說主張工人与農民两个階級的政权，這裡有什么不好的嗎？我想，只有好的没有不好的。但是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這是否社会主义，這是否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我答复說，無論就那一个問題說，还都不是社会主义，首先我們說，政权，

然我們現在的企图是工農兩个階級的專政，小農民並不是無產階級，不錯，農民是工人階級之一个最親近的同盟者，農民在世界各国，特别在中国，都是進行自己經濟的小的最小的私有者。

現在是要向前進的是離要求解放的，要分散地主的土地，要趕走一切地主，使他戴高帽子遊街，這是很好的，這是應該做的，但是這还不是社会主义呀！問題的实质就在這裡，每个小私有者都想奪取一点比較多的土地，以使得自己的經濟比較以前要好些和大些，我們要利用這種企图，利用這種農民的力量来趕走我們主要的敵人——地主，不要打擊了他們之後，不要使他的財產特权仍然留着一半或多少，而要非常徹底的来打擊地主，使他在政治上，经濟上甚至於在肉体上都完全不存在，使他永遠不能再来了，這是土地革命中之一个最大的任務，但這是小私有者的大革命，工人階級应該起来指導這个革命：但是這个革命的内容是肅清封建制度，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因為社会主义乃是肅清資本主义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而建設大的社会主义經濟，難道我們肅清封建制度乃是社会主义的任務嗎？一点也不是的，我們主要的同盟者是農民，他是我們的兄弟，同盟者他是很大的一个階級，他很可以跟着無產階級走，他在像中国這樣的国家中是一个非常偉大的革命力量，他是完成現在中国革命中之最主要的群众，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小私有財產者，他本身是不希望任何社会主义的，他希望社会主义是要經过很長的時間，是当着工人階級在事实上向他証明了社会主义是有利的時候，我們国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十年了，但農民到現在仍然不是任何的社会主义者，農民之開始將自己經濟轉変為合作社的集体的形式，僅々在吐露幫助這種經濟，我們現在仍然有時还有與農民發生小的矛盾，這是自然，小資產者決不能

在一个短的時間中便願意組織自己的经濟而經营大的生產，在中国同樣也是這樣的。許多人以為社会主义就是分散財產，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很簡單的，就是資產階級散佈許多空想的種子、資產階級，尤其是地主，見了什么可怪的事情都以為是社会主义，所有一切於他們不利的東西，他們都稱謂這是社会主义，他們可以將一切東西，都裝到"社会主义"這个名詞中来，女人將頭髮剪短了一点，這件事或者很好，我也不反对，不然你們又説我是反動派了。但是這一点也不是什么社会经濟的建設，同樣資產階級看見男女的関係比較自由一点的時候，他們也説這是社会主义，但是這無論從一方面説不是社会主义，這裡一点社会主义氣也没有的，農民是澈底趕走地主的假使資產階級反对地主的時候，他一定还將地主的特权餘留一部分，資產階级在其他各国是反对过封建勢力的，在中国於相当階段以前他也是反对封建勢力的，但是到工人農民這種反对封建的鬥爭也損害了資產階级之一部分勢力的時候，如没收了地主的銀行，在資產階级的信用，抵押……等関係，也要忍受相当的損失，在這時候資產階级怎樣对付這種反对封建的方法呢？当着他自己的特权自己的財產也受着一部分之損失的時候，自然，他們对於工農之澈底肅清封建餘孽的方法便表示反对，便造出謠言，他説，這是社会主义，赤化，共產党，布尔塞维克，苏俄……等。我們应当明瞭，這只是他們仇恨我們的話，我們应当認清白，這並不是社会主义，工人階级與農民的專政，并不是無產階级的專政，無產階级專政乃是工人一个階級的專政而引導農民，這裡所有的政权乃是一个階级对政权之独斷而使農民跟着他的，這完全是另一个事、農民是一个小生產者的階级，他的本身是不希圖走向任何社会主义的，在中国這樣廣大的國家中，農民的數目非常的多，工農專政的政权都帶着很大的小資產階级性，許多人以為"小資產階级"這个字，是一个罵

人的名詞,這完全不正確的,小資產階級是說的不是大資產階級,這裡所說的"小資產階級",完全不是用來罵人的,這乃是一个正確的經濟学上的名詞;我们可以用混蛋,王八旦,等々許多罵人的話,來罵這个資本家,但"資產階級"這个字的本身,是指的一定的社会階級,他拿有生產工具以剝奪工人階級,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乃是一个小私有者的階級,這裡之大多数群众是完全不剝奪其他人之劳働的,他們不是寄生虫,不是剝奪者,乃是劳動群众,不是雇傭工人,農民不是雇傭工人,不是產業工人,他是另外的階級,他有与工人階級不同的自己的特点,工人階級生活於大工廠之中,他日常所看見的是机器,大生產,他的任務乃是想使這个生產变為更大的形式,他所企圖的這樣,乃是社会主义的,而小私有者或最小的私有者都是希望着改良他自己个人的經濟,他想他的經濟中可以收穫一点来,他想在出賣自己来的時候多得一点利益,他想由他的那塊土地上發財,這是他的思想,這是他的企圖,則需要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後,這是說的將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現在我們要尽量掃除這些封建勢力,只有我們轉変到下一个階段的時候,到那時候我們再說建設社会主义。

我們不要站在感情用事的观点上来看"小資產階級"這个字,這是糊塗,我們說"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小私有者之階級性的經濟名称,正因為現在中国的情形是這樣,在国内之主要任務,一面要趕走帝国主义,另一面要肅清農村中的封建勢力,實行土地革命,又要推倒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权力,因為他客观上是擁護封建制度。現在在中国,若不動員广大群众来反对資產階級,則決不能趕走帝国主义。除了反对封建勢力以外,並且要反对資產階級,非此不足以完成土地革命。但這種鬥爭是否直接為社会主义的鬥爭呢?鬥爭的本身是否

為社会主义的呢？不是的，一点也不是的，現在工人農民以及我們指導工人階級的政党，擺在自己前面的任務，並不是要直接使一个工人階級奪取政权，並不是要肅清資本主义而組織社会共公的経済，這就是説在現在革命的基礎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無產階級。是什么樣的呢？難道無論什么性質也不是的嗎？不会有一个革命，他一点性質也沒有；就是不会有革命，他一点任務也沒有的。他究竟是什么樣的革命呢？他的鬥爭的任務是肅清封建势力，完成土地革命與趕走帝国主义。但這些任務都是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制度之範圍之外的他沒有超出這个範圍以外，他乃是用了很澈底很激烈的方法来肅清封建制度而完成這个任務，只是用了馬克思列寧時常所謂的急進的平民式的方法。這種與封建制度之澈底的平民式的鬥爭，是可以由反对資產階級之方向而進行的，但他在客观上之経済內容是沒有超出資本主义之範圍以外，他沒有超出這个範圍，是因為他的任務只在於肅清封建制度，而不在於肅清一切大資產階級，他还不是企圖一个工人階級奪取政权的任務，不是在革命勝利第二天便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務，問題是這樣

反对這種观点的人，或由於对"小資產階級"這个字之感情用事的了解，或由於过於看重了農民的作用而認農民為社会主义者，或由於將工人階級與農民混合，甚至於將農民抬得比工人还高，或者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將土地革命看成了社会主义，所謂農民的社会主义，就是將土地平均分散，其实這與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沒有有一種意見是在書上時常可以遇着，例如説共產主义社会是实現平等的，這个話是对的

，共產主义社会之最後的目的是要实現经濟平等的．但是平等却有各樣不同的樣式．我們現在可以很平均的將一切東西都分散了他，平均的將机器分散了他．你拿一个螺絲釘，我也拿一个螺絲釘，你分得這房子中的一塊磚，我也分得一塊磚．虽然這裡平均分配是很困難的，許多東西是不能這樣分劃的，但是無論如何這裡沒有真正的平等。我們若想用分散的方法來实現平等，结果只是將一切都打爛了，而什么東西也沒有造成。在我們中国几个苏维埃区域中曾经發生过這樣的事情，將店舖封閉了他，將其中的商品貨物散分了他。但是這裡一点社会主义也是沒有的，因為在這裡並沒有組織社会经濟．假使在我們分散了一切東西之後，大家都成了一樣的小私有者，大家都有了一樣多的商品貨物以及其他的東西，以後怎樣呢？他們要生活了，他們要彼此買賣交換了，他們要企圖擴大自己的个人經濟了，他們有的要發財，有的要破產了——於是另一方面仍然是走到資本主义的道路了。這裡就是問題的實質．一切小資本家的小資產階級的心理，都是希望着再買点財產，变成一个更大一点的私有者。因此，平均分散土地的本身绝对沒有破坏什么資本主义。相反的，他还造成了在另一个時期另外一个基礎上之資本主义發展的条件，沒收地主土地這件事，已经在許多其他革命中施行过的。在法国大革命的時候，也是沒收了一切土地，趕走了一切封建勢力，並且当時打倒封建勢力是反对着資產階级而進行的．代表大資產階級之政治勢力的濫康特党人，完全被别人打得粉碎．小資產階级的雅各賓党在当時之無產階级帮助之下推倒了資產階级。分配土地是澈底的执行了．但以後這个封建的肅清，只是打開了發展資本主义的道路．因為土地的買賣存在，一切商業関係存在，一部分小的私有者，逐漸变成了大的私有者，因此這由中間便產生了真

正的資本主义，並不像以前那樣的半封建式的資本主义。反对資本主义發展的保証，不在於平均分配一切財產，而在於組織大的社会经済。有這種能力的仅只是工人階级，這个階级能以教訓農民，但是必須在自己的統治建設了几十年之後，我們革命中的经驗就是這樣明顯告訴我們的，我們国家中虽然已经造成了社会经済及国家之大工業之範圍，但是在這十年專政之後，我們都沒有將農民教訓成社会主义者，因此，很明顯的，假使說現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簡直是瘋狂的胡說，是糊塗，是閉着眼睛而不顧事实的乱吹，是不明瞭現在在中国之中心任務是趕走帝国主义，統一中国，與農民共同奪取政权。中国党這種任務是很遠的，並且在很快的時期我們还不能完成這種任務的，在完成這種任務之前，我們还有許多血要流的，我們現在為這種資產階级的民主革命的任務而鬥争，這種任務並不輕於其他任何的任務。因為只有這種任務的解决才能允許再多向前進。我們已经說过了，這一種任務之完成是要動員广大的群众，作嚴重的鬥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資產階级，應該打倒資產階级的政权，要建設工人階级與農民之民主的平民的專政。這还不是社会主义，还不是無產階级專政，但這是走到無產階级專政之一个必经的条件，由工農專政轉到無產階级專政之必经的条件。

因此，於我看来，在現在有許多同志將現在中国發生的事變與社会主义混淆在一塊，老实話，我直接間接的反对這些同志，他們腦中実有些小資產階级的傾向，因為他們関於社会主义所了解的東西，实在完全不是社会主义，假使我們將擺在我們面前的小資產階级的任務認為是社会主义，則便是蒙蔽了這些任務的真相。我們將小資產階级的傾向認為是無產階级的，則等於在我們肚腹中像肉包子一樣的裝滿一肚子的小資產階级的空

想。

我们固然説這些東西是小資產階级的，但是决不能由此便説他不是進步的．每一个無產階级革命的战士，他应当参加這个偉大的非社会主义的革命。他現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但無論在那一分鐘都没有失去他的偉大的意义，他是值得工人階级帮助的偉大的小資產階级的革命。

我們应説明的．在中国革命之过程及其発展中，其中已有了使這个資產階级的民主革命必不可免的轉為無產階级革命成分：在革命勝利的時候一定要引起巨大的革命力量，而無產階级在其中間一定有很大的指導作用。在解决資產階级民主革命任務的時候，一定要发生轉変到無產階级革命的萌芽。譬如在反对帝国主义之鬥爭过程中，我們也要没收大資本家的企業．這種没收之继續進行，一定使無產階级被迫而不得不自己出来组織生產，就在這个中間使革命轉変為無產階级的。

但是無論如何决不要將這些事件看成今天的任務，這種任務还是在現在中国革命经过几个階段之後，统一中国的問題没有解决，土地問題沒有解决，只是在這几縣中是不能作补的，這裡还不能説真正的土地革命的任務都已経完成了，你們在報告中还提出了這裡的土地問題还需要解决的。拿起中国的地圖来看，在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我們还需要好大的努力才能將地主推倒，將資產階级的政权推倒，請你們討补一下，还是做許多工作，才能完成這个資產階级的民主革命。我們自己是应当明瞭革命之轉変之前途的，這為的是党不致於走到不正確的方向，使党的群众不要提出当時他还不能解决的那些任務，使我們不要費一些冤枉氣力，使我們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等々。土地革命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个核心

趕走帝国主义是第二个重心。我們党的工作目前，就在這裡，不必要想两年以後怎么樣，只要將我們所有努力都集中到現在的实际策略的问題上。一个同志問我，我們打倒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势力之後，对於他的經濟勢力怎樣办呢？在相当的時間以内，我們打倒了他的政权之後而仍是不動搖他的經濟基礎的。我們在俄国革命之工農民主專政的問題是怎樣說的呢？我們在当時並沒有提出沒收大工廠大製造廠的問題。假使我們在一九〇五年得着了政权，我們一定在一个很長的歷史階段中，只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威廉第二式的外国敵人，反对一切散佈全国的反革命殘餘，也要與資產階級進行嚴格的鬥爭，打倒他在政治上的勢力，在最後被逼迫着或者也要举行各種形式的沒收，或者在打倒了一切封建势力完成了自己之歷史的任務以後，在当時的基礎上之並沒有轉変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開始建設社会主义，這是可能的，在中国或者可以這樣，理論上是不能免除的。到那時候，資本主义的發展便可以在一个新的基礎上之而得一些新的動力。但是我們有大的相信，就是不会這樣的。為什么這樣相信呢？在所有中国革命發展的時期，在戰爭時期，苏維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的時期，西方革命轉変的時期，這些都不是笑話而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親愛的同志們，現在还沒有到這个時候，這需要一个長的時期，而不能立刻可以来到的，這是我们所称謂的革命之轉変。這並不是我們開始便可以走到的，這乃是我們最後要走的道路，革命是可以這樣勝利的，我們的任務也是要引導革命使他可以走到這樣的勝利。当着我們前面擺着策略問題，問我們現在应該做什么？注意应該集中到土地革命，趕走一切帝国主义而引導工人階級与農民奪取政权，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内容。

我現在要說到下部分的問題，即關於过去教訓与机会主义的問題，在中共的許多真正机会主义錯誤之後，『机会主义』之名詞，已成了一个很時髦的名詞，且造成了各種各色的机会主义（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同時对於所有一切不正確的意見，也加上它一个机会主义的名詞。我們知道，在真正作政治上的分析時，应与濫用名詞和名不符实的說話奮鬥。故中共的机会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比較確实解釋一下的必要。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以為首先应把關於中国革命在过去時期中一个策略的中心問題提出来說一說。這樣的策略問題，須是一般的說，我們在中国革命相当的階段上，能否与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或者唯因中共与受其指導的中国工人階級曾与中国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唯因有這樣的事实，所以才發生中共策略路线上的根本錯誤，致使革命後来的各階段都受這種錯誤的影响，這是第一个最普遍的問題，我以為对於這問題应有明確的回答。無產階級政党可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内与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反对外来的敵人呢？或者說這是不許可的，因為這可掩沒階級路線，因為這是背反階級奮鬥的策略。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固然是民族資產階級，但它始終是一个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仍是無產階級，如若說是許可的。如若說有理由可与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那末，在何種条件之下才可合作，到何種時候，在何種条件之下才可与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這个問題在布尔塞维克的出版物中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也不是从中国革命時候起才發生的。這个問題在布尔塞维克中曾經过激烈的討論（战前，特別是在战時討論的詳细）。很奇怪的，西欧工人運動中，我們右边来的敵人（即社会民主党），对於上一問題，擁護民族革命發展的可能問題，他們抱着不贊成的態度，且他們不贊成的理由，是[illegible]上看

来似乎是很急近的社会民主派曾屡次提出這樣一些理由以反对对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所謂這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同樣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所以民族運動的時候擁護資產階，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的事情，不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反之，对于這樣的民族運動，对於這種幼稚而按歷史过程發展的資產階級，应持中立的態度。這樣看来，這个理由，見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很急近的。就其表面来上看来，似乎比我們平常对于這問題的解釋，比我們平常的策略路綫还左些。当然，社会民主派的注意点绝不是在這裡，他們的注意点是在于擁護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正受着民族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威脅。英帝国主义首先就受着印度和中国民族運動的威脅，法帝国主义首先就受着亚非利加和安南民族運動的威脅。欧战時，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受了爱尔蘭暴動的直接威脅，且不論其他。保護和宣傳「自己」資本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当然要当造出各種形色的理由，以保護資本主义的国家，以保護帝国主义国家使臻之完善，提防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方面的武裝自衛。社会民主派实际上的目的是在於能直接帮助帝国主义的国家，因為他們对工人說，「你們不要擁護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因為無產階級不应擁護資產階級」。但同時，社会民主派都在自己的国家裡很堅决擁護着「自己的」的資產階級，德国的社会民主派擁護德国的資產階級，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擁護法国資產階级与法帝国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擁護大英帝国的資產階级。總之社会民主党人是拼命的堅決的擁護着最無廉恥的，最狡猾，最侵略人家的資產階級的。而在民族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們都說：「擁護民族資產階级并不是無產階級的情事了」，這種手段，這種腔調是很顯明的。

布尔什维克都不是這樣来观察問題的。他們說：「

種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們，都应当用種々方法（直至用武裝的援助）擁護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裡一切反帝国主义的解放運動？在這些時候，這種力量是破坏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因此，凡是真正革命的工人們都应擁護這種運動，而騙人的社会民主派，实际上不過是擁護自己帝国主义的国家罷了。

布尔什維克对于這問題的態度是這樣，我們对於民族解放運動甚至在領導這一運動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都应当擁護，但這並不是說，在各種情况和各種条件之下，都必須擁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階級，不是在各種情况和各種条件之下都应擁護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

民族革命的這一名詞的本身，不是這樣簡单的一个觀念，就拿現在中国的面来說吧，資產階級現在已反革命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現在与帝国主义要妥協，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不能說，這个資產階級对於帝国主义虽毫不表示抵抗了。在某種情况之下，它是能够表示相当反抗的，近来中国的事件，已有一部份資產階級已对日本表示相当的反抗，誠然不錯，這種反抗是很沒有力量的，它的前途，妥協的成份已是多过於鬥爭的成份，但這些都是表示民族資產階級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間，甚致在現在都还有彼此衝突和意見分歧的相当事实存在，然而任何有健全思想的人也不能說，我們現在能够擁護民族資產階級。為什么？在上面所举的一例中，可比較容易瞭解我們不擁護民族資產階級的那些條件，現在中国資產階級反对帝国主义的鬥爭，不是革命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沒有用絲毫革命方法来实行的，它甚至連革命的口号都沒有，現在的中国資產階級沒有提出「帝国主义從中国滾出去」的口号。它所提的口号，是妥協的口号，它沒有向民众宣傳：「大家起来，把帝国主义從中国驅

逐出去吧？現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宣傳和鼓動只完全依另種形式來实行的。現在的資產階級，并不準備与帝国主义作革命的鬥爭，這是一个事实。工人階級能否擁護民族的社会集团呢？如果這是指民族資產階級而言，并且如果這个民族資產階級不能与帝国主义者作真正的革命的鬥爭，而与之妥協，如果這个資產階級在這很多時候，尚且擁護那些帝国主义者以反对工人階級的反对農民——工人階級能否擁護這樣的民族的社会集团呢？很顯明的，工人階級对于這樣的集团不能予以擁護。

第二个問題是民族資產階級与無產階級政党的関係問題。這裡可有各種完全不同的關係。這也是很明白的。僅至於半殖民地裡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如果它不許可工農群众的革命組織，如果它妨礙共產党建立工人階級与農民的階級組織，妨礙共產党作革命的宣傳等事，那末，縱然它还在那裡与帝国主义奮鬥或半奮鬥，工人階級与其政党是不能擁護這些資產階級的，殖民地工人階級政党的能否擁護民族資產階級，要依两个主要条件來決定。如果某个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作反帝国主义的真正的革命鬥爭，如果這个資產階級許可工人階級有独立的革命組織，許可共產党有独立革命的存在，許可在广大群众中作宣傳工作，許可共產党的行動独立，如果我們的党同時还有充備的自由以批評自己的同盟者——如果這樣，即在這些條件之下，我們能擁護或能与民族的革命資產階級合作，甚至在這些条件之下，重要点还在于我党的独立性，在于我党批評的自由，在于無產階級及其政党对于自己的階級任務明白瞭解。問題不是在説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党，我們共產主义，亦是民族联合战線的附客工具，而是相反，我們共產党工人階級同意与資產階級的合作，為的是要在一定的時候，利益這一部分時期，推翻自己的[illegible]相当的歷史的時期，要看[illegible]

级，反对那个在革命的相当階段上為無產階级同盟者的資產階级。我们試一問問自己：「在中国革命發展的相当時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許工人階级在革命的相当階段上而民族資產階级合作的條件呢？」我們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级，的確在一个時候，曾经有过民族革命的作用，它曾经拿武器在手裡反对帝国主义。這是毫無疑义的，它曾经执武器在手裡去反对封建势力最顯明的代表者，這也是毫無疑义的。它曾经拋棄而反革命派合作的半封建派别，如反对国民党内西山派等的鬥爭，就是好例。很明顯的，這種情形对于一般的政治局面，而鬥爭的一般结果上有过影响。我可拿這一時期的最後階段，即這一時期的完成階段来説——北伐。虽然在北伐的時候，已经表現了情形的轉變，即資產階级轉变到反革命方面，但這个北伐都引起了群众的大動員。這个北伐引起了農民運動的大高漲，引起了工人運動的大高漲。促進了群众在思想上的大变動，使這些群众在自己生存的全部歷史上頭一次表現是一个一定的政治势力，頭一次暴露起来，頭一次建立了自己最大的群众组織，會員数目達十数百万，如農民委員会，農民協会、工会等々都是。

工人的政党，共產党在這一時期是曾经能够存在的，并且他是一个完全力量独立存在的。

這裡可以提出第二問題，即能否在相当的歷史時期内擁護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级這一問題的附帶問題，這問題就是，如果一般的説来，在一定的厂史時期内，曾经可能擁護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级的，那末共產党加入一般的組織，加入国民党是否是一个錯誤呢？或者後来机会主义錯誤的根基就在這一点吧？或者這是一个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錯誤，就在這一錯誤上發生了後

来許多机会主义的錯誤，促成了我党所受的嚴重失敗吧？我想我們对於這一問題，要否定的回答，因為我们的錯誤，不是在這裡，我們的錯誤或中央的錯誤，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在一个時候曾经是一个最特殊的政党，在共產党方面適当正確的策略之下，对于国民党曾经可能把他完全改組，把地方上的群众組織括集到国民党中去，取得這些組織中的指導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广大無定的組織，同時在這个團体中努力的工作，且在革命的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而資產階级中的左派激進份子联合战線。曾经可能把国民党這空葫芦拿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级的中的民主激進分子来充实呢？保証激進分子中的力量，同時擴大階级運動的傾向，移動国民党組織内部的力量重心点，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們自己共產党力量的源泉。這種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這種希望是曾经完全切实的一種希望，但是這希望的現实是曾经以共產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這種政治手腕的能力，共產党方面是沒有过的，机会主义的根源恰々在就這裡。為什么共產党方面沒有政治手腕的能力，我所謂沒有政治手腕的能力是指什么呢？我所謂沒有政治手腕的能力是指曾经存在于共產的三个最大的缺点，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錯誤，和机会主义的影响。

第一：共產党缺乏独立性。我們已說过，擁護民族資產階级的条件之一，是無產階级政党自身的完滿的独立性，這个独立性首先要表現於什末呢？它首先应表現於我党的政治路线之明顯，表現於我党的特殊政治面目，表现於我党的特殊的共產主义路线，表現於這樣一个政治面目，這个政治面目又应表現於口号，要求鬥爭的方法等，這个政治面目使政党成為一特殊的政党，不是像其他的团体的政党，這个政党在群众面前应表現自己這

一特殊的，单独的，有自己特殊的階級任務，自己特殊政治面目的政党。此外這个独立性還顯露于一点，就是党对于自己的同盟者，甚至对自己的最接近同盟者，時々持着批評的態度，党对于自己的同盟者說：我是在某種条件之下擁護你的，我和你在一塊作一件共同的事情，是在這樣的条件之下的；是在這樣的範圍之内的，如果你動搖起来，我就要無情的批評你，如果你要中途不進，我就要爆露你，如果你要作離開我們共同目標的事情，我就把你看作是卑鄙污濁的東西，開始作反对你的争鬥。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有结合政治同盟的可能。我們曾经屢次走过這種道路。我可　把俄国布尔色维克党来作例。這个党有些時候，甚至曾和孟色维克在一个党裡，但牠没有特别加入过人家共同的政党。我党在1912年　是与孟色维克在一个共同的党的。我党曾和孟色维克作過（虽然不是共同在一个党裡）经过1905年的革命。两派分裂後的联合战线代表大会是在1906年開始的。即十二月暴動（1905）失败後開始的。我們曾经过或分或合的時期。但我党曾经明顯的認識孟色维克這个敵人（即党裡的另一派别）是社会民主工人運動中的机会主义派。当我們甚至和孟色维克派在一党（這党曾是一个名称）裡的時候，我們是曾经時刻保持着自己批評的自由的。我們曾经数次和許多其他团体政治上的联合，我们在十月革命　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联合，但我們没有一次曾经拒絕批評自己最接近的同盟者之動搖，排徊，不澈底和不正確的步驟。雖然与這些同盟者我們曾常常结這種或那種政治上的協調。因此，我党永遠曾有过自己的政治面目，自己的政治特殊路线，它在群众面前說話時，是一个特殊的政党。

在中国是否曾遵守过這个条件呢？没有遵守的，在很多很多的時候。在武漢時期，或武漢時期以前中国共產党没有充分鞏固的政治面目，固然，共產国际執行委員会的代表（鮑羅庭也在其中 ）在這一点上要負很大一部的責任，不过這是另一問題，我还要講到的，但事实是說我党没有过充分的独立性，对於国民党這个同盟者很少批評的態度，不但如此且常々把自己的政治路线来屈服於自己的同盟的路線，這是共產党中國在过去時期中政策上最主要的一个根本錯誤。

第二，第二个最大的缺点、和政治上的錯誤（這个錯誤直至与武漢分裂為止，其後也有过）是不瞭解從一个階段到另一階段，從一个政治和策略口号到另一政治和策略口号的过渡，如果我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能与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那么從最初起就已很明顯，情形不是永久不变的，群众就將起来，運動就將擴大，農民運動就將高漲，革命就將擴大到公然劇烈的暴發，那末，必將發生有力的重新滙合——関於這一点，在共產国际適当的訓令中与擴大会議的决議中，不止說过一次。

很明顯的，当我們自己預先看見從一階段过渡到另一階段時，当我們自己預先看見我們的同盟者，明天就要成為我們的敵人時，我們对於這个已經預見的危險，不仅应当用適当的方法，計劃力量以為防止，而且并積極的準備起来，以走上這个轉变為關頭。

我們应当，我們看見我們的同盟者，明天要成為我們的敵人時，我們应当從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过渡時間内配好自己的力量，圍住敵人，採取防衛的办法，且準備進攻，俾不受敵人的「出其不意」的攻擊，我們应当

事先准備反攻的力量，俾能在這个过渡的階段上得着勝利，在中国種這複雜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和同盟者或半同盟者的関係是很不穩固的，這个同盟者明天就可变為敵人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党的战鬥能力，党的迅速准備技能和迅速轉変方針的技能是能战勝敵人，或保存勢力（至小的損失）的另一个先决條件，這一先决条件，中国共産党在蔣介石最後叛変的前夜和武漢政府变到反革命方面的前夜都没有过，中国共産党那時没有对於轉変的瞭解，没有採取適当的方法，以备反攻。甚至在要明瞭的看出敵人正在開始攻擊，而要和這敵人作抵抗的時候，我們所得到的，却只是譚平山式的那種退出武漢政府的宣言，這个宣言是最可耻的一件文具；因為本应說，你們已是卑鄙的東西，我們要和你們决裂，要向你們宣佈無情的战爭，本应预先採取办法。配置自己的力量，俾敵人不至出于我們意料之外来攻擊我們，但譚平山没有這樣做，却申明說，我去了，因為患病不能維持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对於譚平山這種人，不是当時中央的一切同志都应負責的，但是毫無疑义的，在那个歷史的階段上和上海暴動的前夜，和屠殺上海工人的前夜，党的指導上的一般的路線是這樣的

類似的例証，还可举出許多来，証明那時党的指導不瞭解由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変，没有預先採取必須的办法，没有准備党的群众以走上這个轉変，為事变弄得慌忙了，於是手裡失落了，而一部分同志也来發通電，採取譚平山那種策畧上的办法，然後更按照那条策畧上的道路繼續的走下来了。

這就是第二个大机会主义錯誤的所在，這个錯誤，我把它叫作是对於由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変不了解，对於党去預積極的准備以走上下一階段的不了解，对

於政治手腕，更要等々的不了解。

第三，第三个錯誤是由上面兩個錯誤有联系的，就是党在政局轉变的時候，在最緊急的時候，沒有成為広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反而常々成了群众運動的阻礙者。這一点首先即關係於土地革命，且同樣也關係於都市的工人運動。如果要把民族联合战线劃分開来，或把我們的党由工農群众運動劃分開来，什么对於我們是比較危險的呢？什么对於我們比較的好呢？很明顯的，革命的發展將要群众一天多似一天的動起来，革命的發展，就是說，要使我們和我們那个臨時同盟者的联合要發生危險，因這个同盟者所以為臨時的，就是因為它害怕群众運動的更大的發展。如果這个臨時的联合要以阻止群众運動發展為條件，那么我們就应把這種联合和同盟者拋到九霄雲外去，因為我們自己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於团结群众，吸引他們参加運動，以最大的努力去發展廣大的群众運動。這即是我們的根本目的。我們要盡可能的去消滅封建的力量，打倒封建，不使廣大的群众加入革命運動，怎樣可打倒封建呢？如果一切民众不起来，廣大的平民群众不起来，那怎樣可打倒帝国主义這个敵人呢？很明瞭的，運動的發展一達到這樣的程度時，便不仅应犧牲那个臨時的同盟者（且這裡也無所謂犧牲），拋棄一切的同盟者，且应發展群众運動，因為發展運動群众是我們的根本任務。党的指導在武漢時期以前，特别是在武漢時期內，作出了几个很明顯的机会主义的錯誤，且這些錯誤，我們簡直沒有法子来解釋，如繳工人糾察隊的械，征服長沙（譚平山那時曾到長沙）等都是。這簡直是一種純粹社会民主派的政策，因為在取得政权前，工人政党的代表公然出馬以征服調節意外的事变

這是第三个最大的政治錯誤，或正確些說，是一个全盤的政治路线的錯誤。

從這三个主要的根本錯誤，無產階級党的独立性的缺乏，不了解一階段过到另一階段的轉变，阻碍了方才发展的群众運動，從這三个机会主义的根本錯誤，正或確点說，從這三个机会主义的路綫便形成了一貫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上的系统。

我再要着重的說一句，就是我們派出的代表，這些代表中首先就是鮑羅庭，是有許許多多錯誤的。這些过錯，首先就是在於把我們這已經寄到中國的訓令沒有告訴中央中央的政治局。我們曾檢查过這件事，是絕对的事实。但当然不能拿這点来解释一切。這裡当然还有某種深切的根源，才引起了中國共產党的這種情形。

如果我們從客观方面来观察，以中國現在的階级力量来观察，說中央本身及其指導人材方面来观察，那末我們要說，這裡表現了一種相当的小資產階级的智識階级的影响。但是從這点不可作个這樣的結論，就是把指導中的每一个智識份子都看作是不可許可的，若果這樣，是一種絕对的笑話。有些很好的智識份子是革命運動所绝对必需的，那種对於每个智識份子的輕蔑，对於智識份子階级的一味的非难，工人運動中是不能許可的。這在理論上和实践上都是不正確的。但是在特殊的中國條件下，中國共產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時候，他自身是從民族革命中產生出来的，它的許多負指導工作的同志都是從左派資產階级学生運動中出身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曾经仅在開始萌芽，在這些特殊条件之下，当然造成了這種情形，就是指導分子的社会成分，依自己的社会联系而生長，都會

經而那些左派智識分子的階層很接近。此外，指導分子中，曾经表現得差不多完全沒有理論上的認識，沒有相当的经驗，党內分歧推，它不得不经过了特種嚴厲的条件，以補充犧牲上的缺乏。俄國的布尔塞维克党搔有西欧的经驗，它在理論上擁有多量的智識分精華。這是在中国曾经可还不能有的。中国的党曾经需要嚴厲的经驗，以便党體着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建立个一定的政治主張。

我要结束報告的一部分了。現在来且總結一下。

中共机会主义的錯誤在什么地方呢？這些錯誤不是在于共產党在一个時候曾经与民族資產階级合作，也不在于共產党曾经加入国民党一起的組織，成为其一组成的一部分。這些錯誤是在于中共沒有充分的独立，在於它要批評自己同盟者的時候沒有批評，在于它沒有瞭解從一階段过渡到另一階段的轉變，沒有準備群众走上這些轉變，而是相反，它有時候曾作了完全不可許可的事情，就是阻障工農群众運動的發展，沒有把自己成为一个发展工農群众的因子，而是相反，成了一个阻礙這个運動的因子。這些深刻的机会主义的錯誤，使少數当过我們同志的人走到了政治上破產的地位，例如譚平山等現在所謂第三党的一部分人都是，但是叛党的人，离開了革命的群众運動，拿最大失败和机会主义錯誤的代価僅只是露出了自己的真目。如果党曾经有一正確的策略上的主張，那么实際上將如何呢？我們绝对不能不說說，沒有這些大的錯誤，在客觀力量对比之下，甚致有正確的策略，我們或者也遭了大失败。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党曾有正確的策略，但也遭了大失敗，因為那時客觀力量的对比是如此，因為工人起来，工農民沒有起来，以致不能支持，且不可以支持，而工人們被擊敗的時候，農民運動却起来了，工人与農民運動的分離，致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我党和其他一切革命集团都遭

了失敗。

或者中国在另種策略之下也遭失敗，這是不能証明的，這裡只能提出一種理論上的推論。或者在正確的策略下已要失敗，因為無論如何，那時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如帝国主义国家可集合充分数量的大炮出反对中国的革命運動。但有一点是無疑的，即在這種場合之下，我们的党從失敗中跑出来，要比從現在的失敗中跑出来較鞏固些，我们的主張比較要明顯些，群众所处的情况比較現在所处的情况要好些。因為他们可得明白運動的目的和道路，而這些道路，是不明顯的，蒙混的，甚至連我們自己党的党員現在对於這些道路都还不明白。這是要明顯的指出的，如果我们能正確的運用政治手腕，那我們就應該怎樣：当資產階级拿武器在手裡反对封建勢力的時候，則擁護資產階级，同時批評資產階级不澈底性，暴露其弱点，自己則把較好的分子都聚集到共產党裡来，建立我们的机关報，依我们自己特殊的共產主义观点来說話。擁護国民党，但同時要批評国民党在由一階段过渡到另一階段的轉变時，对於自己的同盟者要作更紧張的批評，把自己的人要多量的送到国民党中去，訓練他們，教育他們，而他們从一定的口号。当你看見敵人在那裡轉到別方面去時，就要和他宣战。或者把自己的軍隊整个的從戰場上退出来，但不是被破坏了而退出来的軍隊，而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場，有一定政治思想，組建自己的軍隊。任何時候和任何階段上都不是国民党的尾巴，任何時候也不成為群众革命運動的障碍物，這樣一来，我們的結果完全是两樣了。

我要再三的說，主要的机会主义錯誤是在於共產党的独立性，在於不明瞭由一階段过度到另一階段的轉变，在于障碍群众的革命運動。

同志們，我們已分析了过去歷史時期中最主要的机

會主义的錯誤之所在。机会主义根源之所在。這些問題在現時來說只有間接的関係，這些問題都是过去的問題。

拿現在的資產階級來說，是連要不要与他合作和能否与他合作的問題都沒有的，資產階級及其最激進的派別，如汪精衛等，都已最後的走到反革命的营壘方面去了，因此，很明顯的，对於現在的時期，尤其是將來的時期沒有討論這一个問題的必要，就是：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敵人，打倒他在政治上和经濟上的力量，是中共与中国工人階級最必須的任務。這問題我們已說过了，用不着再討論。

我們已在報告的上一部分中分析了中國革命目前的階段，假設這一階段是一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這个階段將轉变到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只說現在階段是个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階段，這話是不够的，因為這个赤裸裸的界說，还不能与我們以決定策略任務的門徑。在這一階段的进程中，在這个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階段的範圍内，可是有各種完全不同的情勢，各樣的環境，各樣的階級分化，各樣的政治局面，為要回答策略上的問題，党在現時应作什么，党在現時应提出何種中心政治任務，党在現時应提出并決定何種主要的策略任務，——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如果僅只說現在的階段是一个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階段是不可能的。必須还要觀察現在動作的階級力量是些什么力量，這些力量的排列如何，他們的结構如何，他们彼此的関係如何，他们數量如何，各方面的强弱如何。只有回答這些問題後，方可正確的決定并預先正確的提出現時党的策略路綫問題。所以他首先应說到中國革命現在發展的歷史時期中，各種力量的分化，第一就要說外国帝国主义力量的問題。如果不看見這種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实际上

不存在，以為我們的党所受的環境，是英美及其他帝国主义兵艦不在中國示威——如果是這樣，那就有妄想也沒有的了，中國革命今後的發展中，外國帝国主义必然以大砲和飛機來对付，這是毫無疑义的，故把帝国主义的力量置諸度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那樣來討論問題，那就要產生一完全不正確的策略路線和完全不正確的一般政治上的立場。

帝國主义現在力量的集中是格外强大的，你們如果要認識這種情形，軍事方面的同志定能給你們一个報告，這種力量的集中是從來沒有过現在這麼强大的；最近中國的事件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動作，实際上就是瓜分或佔據瓜分中國的土地，這種瓜分的本身不但引起了日本帝國主义勢力的增加，而且引起了一般外國帝國主义勢力的增加，這裡的敵人是有計劃的，聰明的，技術上的武裝是很好的，這个敵人很有覺悟的和很有計劃的，樹立两个目標；一方面經濟上統治中國，奴隸中国，另方面肅清危險的社会的階級革命潮流，我以為我們还要注意帝国主义者所用的非武力的方法，毫無疑义的，帝国主义的列强，除武裝侵畧，派兵艦和軍隊到中国外，同時还有其他還有力的方法，来做為他們很大的反革命的力量，我這裡所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國帝國主义在中國用各種基金所辦的各種經濟上的事業和社会樂論中的宣傳．現在美国的体育会，飯館，学校和其他机關在中国十分普遍，表面上似乎是本仁愛的，但這个仁愛有自己歷史上的原則，這原則不是别的，就是作經濟上的侵掠，以便達到經濟上華國的目的，以便达到匡北美帝国主义地位的目的，美国帝国主义在現時階段上还想宣佈公開運動的口号，這个口号首先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反对英国帝國主义，美帝国主义為了自己比較有利起見，对中国人民

帶上着仁爱和平，慈善的假面具，這些與他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些不同，但当中国工農革命今後一発展時，這个帶假面具的美帝国主义仍將与其他列强一樣，拿着厲害的武器在自己手裡来一樣的反对中国民众。同志們，在估計現時中国情况的時候，當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很大的衝突一点為從，這些衝突是存在的。不但如此，我还可以說有這樣一个可能，就是日美的衝突，可以偶然從中国問題爆発起来，這个衝突，一经在中国爆发，便能擴大到全世界，虽然美还带着和平的假面具，但現在美国已经有一種报紙主張政策，换言之，就是实际上主張各帝国主义集團间的矛盾是如何，不管這些集团在中国資産階级中和中国统治階级中各自找得了自己的走狗，但可绝对無疑义的說，对于工農的革命，对于資産階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尤其是对于這个革命的轉变，对于無産階级的革命，一切派别，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集团，是都要回轉槍来反对中国革命的，這是绝对明白的事。故当我们說到中国革命今後发展前途的時候，我們不能拿帝国主义列强間彼此衝突的事来自己敷衍，我们应须先從帝国主义者联合起來反对中国革命力量一点為出発。現時帝国主义的力量毫無疑义的是高涨了，我們不僅不应看輕帝国主义的軍事力量，而且不应看輕帝国主义的广大的另一工作，直至所謂文化工作為止，這種工作是很有計劃的，很有觉悟的，很努力的，很普遍的在那兒实行的，实行的人首先就是北美帝国主义，

當我们説到内部力量的時候，同志们有時也应該注意這些内部力量的矛盾与渙散，這件事实的本身是很明顯的。各種軍閥的積團是很多的，各種資產階級和封建軍閥的積團是互相鬥爭的。地方主义和其他各種渙散的情形，表現於資產階級力量与軍閥力量的渙散，表現於這些地方力量中間相互的鬥爭，表現於各派别間对於軍事行動的兒戲。

但是我們在估計敵人力量的時候，应該首先以這樣的观点出發，就是在反对中国革命力量的爭鬥中，上面那種矛盾多是没有作用的，南方的軍隊与北方的軍隊蔣派與以前的武漢派廣東派與其他各派，他們是陷於彼此战爭的情景的或者政治上是有大的糾紛的，但同志們不要忘記，這些派别是一樣的努力，一樣的残酷来屠殺我們同志的，他們是一樣的努力，一樣的残酷来拿着武器反对農工的自衛隊的，他们是一樣的努力一樣的残酷来拿武器在手裡来反对革命的工農階級的，我們应當從這点出發而不能從一個想像的观点出發，這個想像的观点，如果稍為擴大一点，可以把他這樣説出來就是帝國主义差不多不存在，因為帝国主义者自身中有利益上的衝突，資產階級差不多不存在，因為資產階級中的各派别彼此爭鬥，這樣，什麼都不存在了，敵人的營寨陷於完全破產的情景。

若果是這樣，若果最近是這樣，那末我們天天彼此屠殺，天天流血的事情就不可解釋了。殺我們的是誰呢？槍斃我們的是誰呢？當然誰也不殺自己的，誰也不槍斃自己的。我们要承認，我们是為敵人所敗，我们的党和工人階級同陷於很苦难的境況，當应討論如何過渡這個困难的环境問題，為什麼要拿這種思想来安慰自己，以為一個什么不存在的敵人給了

我們一個大打擊，在這個打擊下我們流了許多血而現在方漫々的從這個打擊中逃出來走上新的高潮。這是拿各種辭句來安慰自己，為了次要的事，而忘了主要的問題，是在於中國發生了一個大的力量的分化，自從民族資產階級变到反革命的營寨起，变到帝国主义和軍閥的營寨起，我們看見一个很大力量的联合，即帝国主义，中国的地主軍閥和民族資產階級，惟因有這樣一个联合，惟因發生了一个這樣的勢力的新的積團，我們的力量無論在組織上，技術上，都表現得比他們弱，在相當的程度上，政治上也表現比他們弱，因為敵人的立場，比較巧妙些，他們的政治手腕比較我們的政治手腕要好些，他們的指導雖然渙散，但表現得比我們党的指導要靈敏些我們应從這點出發，且应從這点得出相當的經驗，如果我們看輕敵人的力量，那就是說，我們不了解自己失敗的底蘊，如果我們不明白自己的底蘊看輕敵人的力量，那就是說，我們一定又將採取不正確的路線。革命的勇氣不在於時々刻々在一切條件之下，一切情形之下都要去開战，革命的勇氣是在於一定的情況之下，或一定的階級力量对比関係之下必須開战的時候，才開战的，以便打敗敵人或把自己的兵力從战場上調退出来，以保持自己兵力，緩些時再開战，使預先有所準備。

那種講笑話的，常把每種情況都看作是最革命的，且時常提出暴動的口号来，這是最無用處的，沒有能够想到時々刻々要暴動的一種蠢人。我們不在日本，不在英国不在其他国家，即刻提出暴動的口号来，并不是因為我們不是革命党人，并不是因為那些国家裏的共產党不好，而是因為那些地方的時候还沒有到來，因為現在時候不適當。如果那些地方的情形明天就起变化，

那我們也要提出這樣的口号來。這就是革命策略的所在。且我們应從這点來观察現在的情形。我再要說句話，就是帝国主义營寨内部固然有利益上的衝突，但帝国主义者对我们是一致的。且從這点來观察情形，帝国主义最近厲害些了，試一观反革命營寨中自己的内部関係：他们是很渙散的，他们的各派别是彼此互鬥的，但就他们对于我们的関係來講，反革命的營寨在相當的程度内是堅固的，因為在力量上，我们所看見的不僅是軍閥而是軍閥再加上資產階級，這個聯合在对我们的関係上是丝毫沒有崩坏的——难道這不明白嗎？我们的失败追究到底，是由這種情形來解释的，难道這还不明白嗎？因为所謂我党政治手腕的不靈敏，不是别的，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国民党影响侵入我們自己的隊伍，換言之，即我們敵人的影响侵入我們自己的隊伍，這是絕对明白的事，而且這表露我們在政治上的薄弱，我們不僅到現在才開始在新的基礎上，用新的方法來編制自己的行伍。情形就是這樣，我們在決定策略路線的時候，還应從這種情形出發。

廣州暴動以前與廣州暴動時，我們招了許多的損失與失敗，這些失敗是很嚴重的失敗。敵人的營寨中固然有很多的衝突，但我们也看見他们力量相當的結合，我雖然怕說得过火，但我以為最近連資產階級的營寨中也表現了一種厲害的集中的傾向。我们看見所謂南京派的力量現已增強些了。現在南京派在其他别派中力量的比重比較过去歷史時期中增強得多了。自然這個敵人的營寨中，还有許多变化和其他衝突的可能。我党应利用敵人營寨中的每一個衝突，每一個小的糾紛。但是如果我們要是很真实的說話，不騙人家，更不騙自己，因为說到敵人的问題時，騙人家

还有盖欺而騙自己是最不好的一件事。如果要真实的說話，那末我們就要記住，我們的敵人是很大的，而我們自己的隊伍是被衝破了的，這些隊伍我們僅还在這裡集合。

同志們，我要回答這樣一个問題，這个問題是在俄国党内討論中国問題時常常提及的，且在最近擴大会議上所曾提过的，如果力量的排列是這樣，那末是否是說因我們受了一个重大的打擊，甚至連革命新高潮的希望都沒有了呢？我們招所的嚴重的失敗是否說是中国革命的破產呢？或者可以提出另一問題，我們的失敗是否是那種革命運動退後至數年或十餘年的失敗呢？譬如是不是像俄国1905年失敗後那樣一次革命的高潮直到1917年來發現，虽然在1914年夏天這个革命新高潮的開始已有表現，当然這些問題是要回答的。

致於革命破產的問題，那我們應無條件的而以否定的回答，因為革命的一切客觀任務，都沒有解决，如說中国問題由帝国主义鬥爭的問題，中国内部改造的問題首先即土地革命的問題，這些問題既然都沒有解决，那末怎可說革命的破產呢？現在中国有四百万的貧人，這些貧人中又分出許多完全受餓的人，這些人不能找得供得給自己勞動的地方，中国有數百万的貧苦無告的人，這是一个空前最大而且沒有出路的後備軍，很明顯的，這種情形或者由革命暴發來結束（且只有革命暴發才有出路）因為我們沒有看見絲毫的徵兆，是表現現在的統治階級能够解決這些問題的。

中国革命能否被倒退往後十年呢？這問題有否肯定的回答呢？我以為不可，且我可完全擁護這个意見是对的，為什么呢？誠然不錯，西欧的帝国主义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很竭力的帮助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着简单的以为不要紧，那是极不切实的。美帝国主义有最大的财政力量，有剩余的资本，使他们拼命的要想英国和日本这些竞争者，从中国地界驱逐出去，他能冒险把很大的资本投向中国的企业上去。但有一种情形，是使美国这种企业蛮发生困难的。就是土地問題，俄国專制政府能把俄国革命往後倒推十年，不能是因為謝米諾夫的保王軍，曾经肃清暴動的工人，或不僅是因為征服群众運動的軍隊會遍及於全国，而且还因所謂施托里平的改良，這種改良曾為政府阻止新革命浪潮的第一方法。專制政府不僅把俄国工农的第一个大暴動用流血的手段压制了。而且他曾設法把土地的改良来買活一部农民。這个改良固然是很狭少的，但他在以後事变的行程中，曾有过大作用。第一，一部分地主怕死了革命，故曾把自己的土地的一部分，经过銀行賣給农民一般富的农民。俄国一部分地主的土地曾经轉変到农民中一部分上層分子手裡，故施托里平的改良是帮助了比較殷富的上層分子，农民中的富分子；使他們增加了自己的土地。這一点不要忘記，且這一般的政治情况中曾有过大的作用。要使第二次农民運動不起来，這个改良是不够的，但是這个改良再革命的失败合拼起来，都曾是以阻止革命新浪潮在一个長的期中不発。這是無論如何不要忘記的。我以為对於中国的中心問題，——土地問題，無論你們的中国的資產階級也好，封建軍閥也好，农民自身也好，他们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無論如何都不能在土地問題一点上用政治手腕来敷衍為什么？因為在我国曾经有过大地主，這些大地主曾把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自己手裡，但是你们的地主（我想你们不会以為指導你们的地主的攘混）是很倒霉的。中国有很少数的地主，其次為次一等的地主，但他们都不可与俄国的地主或東普鲁士等処的

大地主同日而語，中国的資産階級和地主没有大量的土地，可隨時拋棄一部分可使自己脫身；他們要使自己脫身，除非自縊。但是這樣捨得犧牲的地主是没有的，而且他們手裡也是没有一部分能夠拋棄的土地的。因為你們的農民已經起来，已嘗了一嘗土地的味道，那他們一定是要竭力奪取土地的，且這也没法止阻他們的。因此，我以為可以說，中国的資産階級和地主，甚至於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都是不能把革命新的高漲延遲長久時間的。所以執行委員会最近擴大会議估計現在的情形，是一種革命潮流，兩个浪潮中間的情形，一方面是一个波浪和失敗的末了，但接着就是新的高浪，我們現在正是在這新波浪開始的前面，在新高漲的足下，或許在這裡接近這个新高漲的足下，大概是這樣。但我在告訴你們，要的確規定這一新浪潮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任憑理論上多大的本事也做不到。没有疑义的是許多徵兆告訴我們的，我們在這裡向這个高浪走去，在什么時候来發生這事呢，這是不可預先說定的，而且要占卦問卜的来發出這事呢猜度，也是不正確的，我現在接近着第二个高潮，我們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距這个高潮的時間，当然不会很長的，因為你們的資産階級和地主不能拿土地来敷衍，因為他們没有大量的土地，我以為要規定我們的策略，有上面這个定义便夠了。因此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在鞏固革命力量的源泉，且我們的党必須充分準備起来，以及擴大這个源泉，以便成為這个運動的領導者，以便在新的潮流中，團結廣大的群众，把那个鞏固起来了的敵人都能打倒，而且根本堅決的打倒。

现在我說到現狀的估計，首先就是我们策略的相当路線問題，使我们有動员和組織工農广大群众及鞏固自己的（新党的）隊伍的策略，是正確的策略，是現时的主要任務，非常明顯的，要動员广大的群众，要團结我们的隊伍，必須要有某些（政治）口号，某種政治路線，一定的發展前途和在現党需要達到的一定目的，對於這些口号及目的等，我将来再說，現在我想說别一个問題，就是党内的一般政治路線問題。

机会主义的錯誤是非常嚴重和非常重大，這些錯誤已揭示在全党党员的面前，至少是絶大多数党员面前，党希望党全战勝這些錯誤，八月会议已經大部分战勝這些錯誤了，中央十一月擴大会議也是继續和鞏固战勝這些錯誤的路線，党的這種改革絶对不能輕視或忽視的，应当無疑义的承認，全党費了極大的勞力，在許多巨大損失結果及殘酷失敗的經驗之下，才能找出和決定自己革命發展的新道路，但是，有一常見之事，特是別在幼稚的政党中是常見的事，即当事变的偉大歷史改革之下，当很嚴厲的破碎旧有政治之路線下，很难免不發生許多曲折，許多周轉，許多逆流，這些曲折，周轉和逆流，在一定的政治條件之下，和一定的环境之内，同樣有非常的危險，雖然在字意上看，他们和所謂右傾很少有相同之处，在共產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爭論当中，大多数的同志，我个人也是其中之一，根据对党内現狀的估計，以為必須向几種徵候鬥争，因為這些徵候如果發展下去可以使党走上非常危險的道路，如果再加上些附帶条件，簡直可以使党走到死亡的道路，我想把這些徵候指出，確切点說，把這些徵候中最重要者指出：

第一点：玩弄暴動——任何暴動必定要有準備，必定事先要組織，必定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和一定的革命形勢之下，才能举行，暴動既經開始了，应当堅決的去幹，

应当拚死的向敵人進攻，但是，没有相当的準備，没有一定的成熟的形式！没有在大群众高潮的條件，而開始暴動，這便是玩弄暴動，便是以暴動為兒戲，有許多時候，我们的组織—特别是地方组織發出一道指定暴動的光桿命令，所以很多時候，很少人来参加暴動，我们的命令只不过是命令而已，有許多時候這些暴動是命定了要失敗的，而结句只是失敗，很明顯的，這種暴動——即没有相當準備和没有環境估計而開始暴動的傾向，应該受指責的；因為他可以使党走上將来失敗的痛苦道路，同志们，毫無疑义的，我们的敵人的計劃是要將我们各个擊破的，我们無論如何是不能中他的各个擊破之計的，無論如何不能在党内造成這種心裡，就是人人想道：誰出来反对在某地方或某一省的任何暴動，誰就是机会主义者，誰在暴動结果有勝利可能時来反对暴動，誰就是机会主义者，誰　歡喜玩弄暴動的傾向，不僅不是机会主义者，並且是真正的革命者，不能把反对事先没有詳细分析一切條件的暴動的人，叫做机会主义者，贊成或反对暴動——這是空話，這是小孩子氣的，這是笑話，只有在　那時才能解决暴動問題，就是当着用顯微鏡分析的時候，就是很詳细的分析的時候，如果分析形势，須把這形势各部分都顧到，討論统治階级的情况，估量工人階级的情绪，攷核農民群众的情形，多多少少的估計革命的兩营壘間的相互力量，技術方面的籌称，只有此時才可以開始暴動，只有在這樣分析的條件之下，才能討論暴動問題，否则，空洞的提出暴動問題，我再重說一遍，是不慎重的，小孩子氣的，冒險主义的，幼稚的提出問題，

毫無疑义的，有些同志在巨大的机会主义錯誤揭穿以後，生怕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有時候一跳就跳到另外的一个極端走另一極端，是蠢笨，雖然是革命的蠢笨

然而總是蠢笨，這蠢笨不会使工人階級有好处，也不会使党的狀況有好处，左傾錯誤可以使命(革命)死亡，右傾錯誤也可以使革命死亡，对於革命從左割殺，或者從右割殺，左傾蠢笨的割殺，或右傾錯誤的割殺，而無產階級及革命本身都是絕麄沒有好处的，這就是第一点，関於坑弄暴動問題。

第二点——对於本階級強迫行動的問題——從許多書面報告及同志們口頭談話当中，以至瞿秋白同志的最近報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有時採取非常特别的動員群众的方法，就是命令的方法，命令工人罷工，倘然工人不願罷工，我們几乎是把手槍拿在手裡逼他們罷工。這个策畧如果繼續下去（我当應声明，我本曾以為他是各处常用的策畧，但只要用两次，三次以至四次那已経是"雷响天下知"了）這个策畧如果要是寬广採用，那末，我們的運動早就"嗚呼哀哉"了，当然這是非常壞的办法，就是同志们把拳頭放在沒有觉悟的工人的頸膊上逼着他去鬥爭；但是，应当說明，事實上這只是應用旧有的国民党的傳統办法，国民党的組織原則就是這樣，高呼群众和命令群众，另外便沒有办法，你们必須注意，先進無產階級的政党对待本階級這種方法是不能採用的，這不是無產階級的政党，這是驅一群去作鬥爭的革命祈祭的屠刷机。党与群众在這樣的相互関係之下，無論什么時候不能群众聯繫，無論什么時候不能把一群众变成真正的群众——自觉的為一定政治目標而走向战场的群众。

在這樣狀況之下，當我们党的在巨大困難和敵人力量佔優势的狀況之下党為完成其最大任務，究竟就应当幹什么呢？就是奪取群众，使這些群众中的各个中等分子都準備着不顧殺頭，槍斃，勦死，而对自己的事業帶着完全的狂熱的信心大踏步的走上前去作战，当然如果

希望群众中每一个中等分子都讀完三卷"資本論"或者懂得剩餘価值的理論以及其他的智識，這是空想的事，是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事，但是他（每一中等分子）应当知道和相信自己事業的真理，应当知道和相信，他是革命的動力，不是這樣怎麼能够做革命吧？不能把本階级的群众看成一群羊，以為可以叱責和鞭打他们去做革命，高呼道："向前走"！我在你们屁股後面鞭策着"這是絶对不正確的意見，因此非常明顯的，如果我们讓這種傾向多少发展下去，那末，我們的事業便要有工作最堅決的，最不留情的鬥爭，讀到這裡又可以說指定暴動的問題，甚至于在秋白同志的报告中（我說這些并非指責這報告，但他是一切的反映，至少在俄文譯品中，是這樣說的）也有："暴動的命令"你們的群众是什么？事实上的軍隊还是軍事组織的力量？（秋白說辯道，中文没有" Директива "（訓令）這个字）或者如此，然而从俄文看来，"命令"是直接的表現出軍事的用法，或者是譯文不大正確，那就要好些，我重說一遍，我並非有什么任何責难指責的意思，我只是想自己了解，並且如果我要了解的对，我想使同志们了解，对本階級的関係，這階级中的人还未完全抓取到我们方面来，我们的党現在真正处在極困難的條件之下，這些困難須要有群众方面最大的努力和愿望才能够战勝。

党驅策和强迫工人做革命是要不得的東西，群众沸騰起来了，我们指導牠，才是当要的東西，這兩件東西不是一樣的。

第三点——誇大个人恐怖問題　当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布尔塞维克派反对个人恐怖時，絶对不是因為我们姑息某几个無賴漢，而怕把他们送到一去不回的地方去，也不是因為我们原則上反对恐怖，在武裝暴動及群众行動之時把階级仇敵的許多人各个的打死，有什么不

好呢？但是特别当這種時候，当運動的直接浪濤已经低落的時候，這時候須要集聚群众．這時候有許多失敗後的失望情緒，這時候有許多人很天真的找尋新出路發生為死者報仇等々的觀念，很可能的使党的力量，应該用之去深思自己的地位，深入群众和開始群众暴動的力量，不用在群众工作上，而用作个人恐怖的行動上去．這是很大的危險．当所有作中国革命事業的同志们，一感觉到同志们這種心理的傾向時，便看出這个問題的玩弄暴動和强迫罷工等，有同樣重要的意义，使我们不得不馬上出来坚决的反对這種傾向。

·的誇大個人恐怖，冒險主义，玩弄暴動等傾向並来的就有輕視群众日常需要的小鬥爭的傾向。無論什么時候，無產階级的政党絕对不能不顧工農的最小要需的鬥爭．無論何時．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就是以為党不能為小的局部的要求或工人階级日常需要鬥爭，尤其是当党和工人階级遭受大失敗之時、当有一部分工作須要重新開始，有些地方須重新團聚工人群众的隊伍之時．通常總是很小很小的要求形成第一步鬥爭引綫，我们当应使這些小的要求漸々生長，漸々擴大．以便提高革命的熱度、現在水銀柱上昇的度数还非常低，必須重新開始来昇高牠．因此，必須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以便重新開始動員群众，這種輕視群众需要的傾向，有時也很确切的在理論上發示出来，創造了許多理論，以為現在我们是应当做武裝暴動及奪取政权，這些才是我们的目的，因此，管這些鬥爭閑事，不是我们应幹的，這樣判說，這樣看問題是不对的輕視這些小事，不会是工人的政党，而在失敗之後，党恰是应当時々藉這些小故提出比較劇烈的口号，把問題提得比較劇烈，直到得出最利害的結論，归结到武裝暴動．在工人運動史上，同樣的在一般革命運動史上，常為很小的原因爆發很大的運動，因

為生虫的牛肉或其他小原因可以引起兵士的暴動，难道革命家不应当利用生蟲牛肉這件小事嗎？应当利用，否則，便不是革命家，而是个空談家。我們階级的敵人越聰明，他们玩的手段越多，小的讓步的事也越多。假若你们不能按時把工人的不滿意的情绪，（虽然原因很空洞）抓住，不能按時把農民及其他広大的社会成份不滿意的情绪抓住，那末，你们便不会利用的情况，便是在那裡空喊革命，便不能与真正広大群众滙合。

此地还須說到党内几種不正当的倾向的嚴重徵象与某几点思想的过战畧有聯連，這種思想也也是应当受評判和被揭穿的，完全是很自然的，人当嚴重的失败之後，当机会主义暴露之後，当其他許多自己批評实行以後，便開始發明些特別名詞，開出些特別藥方，以便纠正过去的錯誤，這些藥方通常是照着為党寻找極端革命的階级基礎的路线開列的，例如，有一个很著明的提议就是不收每月得十元以上的工資的工人入党，這簡直是大笨蟲的辦法，绝不能用這个条件来作為入党的条件。因為這是把許多工人從工人運動中開除出去的企圖。這些工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及社会主义革命前都能够有很大的作用。階级绝不是根據他每月所得的几許工資来决定的，也並非得工資較少的工人時々一定是革命的。這還有許多條件有關係的，例如俄国五金工人所得的工資比其他工人多，在过去和現在他们總是站在運動革命的前衛，這并非時々是如此，我現在不能詳細的去分析這些条件，有時是這一个条件、有時是那一个条件，但是，在中国無論如何，绝对不能把許多工人抛棄的，因為那種整个工人階级，就我们的俗話講来，是"貓子眼淚，是两个半人"；（意思就是很少——譯者附註）此外，我还可以举出一例，就是当広東暴動時，広東的党的机関未曾採纳嚴重的办法以便分裂和中立机器工会，也是錯

誤的，因為机器工会中不仅是些政治的無類之徒，还有真正的工人——熟练的產業工人，不錯，他们是受外国資本收買的工人，然而我们政党工人的責任是要為爭得這些工人而鬥爭，我们唾棄他们是不对的，我们应当宣傳他们煽動他们，企图把他们拉到我们方面来，他们總还是工人。并且是出很大勞動，費很大氣力的工人，我们一定要為奪取這部分工人而爭鬥，當反对城市居民及暴動者時，不僅是軍隊，而且有一部分熟练的產業工人。难道這是暴動的模型或暴動的完滿思想嗎？难道這是思想上的常態嗎？难道這是很好的現象嗎？這不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裡有些被長期收買的社会主义的無賴漢，這是殖民地的国家呀，為什么不加緊努力，以便把這些工人中的一部分或很多部分拉我们方面来呢？然而中国同志到底幹了些什么？他们提議不應收每月得工資十元以上的工人入党，在工人階級本身热烈的企图取得領導权的国家内，工人階級的政党不許三分之一的無產階级入党呀！這真是滑稽之至，這真没有一点無產階級思想的氣味，或者再举一例，还有一个提議，也是想另找一个某種特别的革命階級作党的基礎，就是离開無產階级而走向農民方面去，当無產階級正疲倦時，当他正处在被压迫的环境之下，当農民正活動之時，于是造出一種结論来說：農民比無產階级好些，農民更革命些等々，因此，就發生一種意見，以為党内農民的代表应当比無產階级代表多一点，為農民比工人更革命些。不錯，在這種字意之下，農民是革命的，就是農民自己正在暴動起来，而被压迫和被窒息的工人还未能伸起腰来，但是這樣意見的内容和意义很明顯的是不正確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革命是不要小資產階級傾向的，非常容易了解，農民無論何時，组織性是總差些，忍耐的鬥爭性總是少些，平心靜氣的計劃性總是薄弱些，無政府主

义的傾向，總是濃厚些，他非常缺乏組織性，他非常容易發生原始的行動，然而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却此便作另外很急進的東西来。作出一定要玩弄暴動，差不多無論在任何条件之下都可進行游擊鬥爭的行動的結論来，這不是無產階級本性，他有時須要很大的忍耐鎮静性，須要把各部的関係联貫起来，這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傾向，這並非是說，你們必須百分之百的組織起来，把自己的然後再去作战，但是，這是說，你应当做你可以做到的事情，組織起来，把自己的隊伍团結起来，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应当做到什么地步，当我們刚受了當頭打擊時，实在必需要想一想，首先要想一想這个東西，想一想最基本的東西，就是要想一想将来運動的向前發展的绝对必須的任務，這樣就發生了把党的基礎向另一个階級移動的傾向，由無產階級向農民方面移動的傾向，以及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方面安置党的基礎，虽然难得叫作什么階級，但總是另外一个基礎的傾向，好像他們所發見的新基礎是要更革命些，這些不正確的傾向有使我們力量分散及分裂的危險，有使党不能察觉無產階級的鎮定性及組織力不足的危險，有使党在艱苦中時期分散自己的力量以致被敵人各个擊破的危險，有使党不能盡最高限度的可能来改造自己的隊伍，重新团結工農群众的組織，联貫城市与鄉村運動的関系，以便坚固的準備将来的广大範圍的武裝暴動的危險。現在問題是這樣擺在面前的，我們說到這些的傾向，在我看来是非常明顯的都是有害的傾向。

同志們，与這些问題有関係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我也想提起你們的注意，這種命令群众的办法，以指揮代替指導的办法，对本階級的强迫和重視对本階級强迫方法的意义等々的办法，尤其有害的，就是把直接使党与工人階級分離，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階級对于

党開始不把他看成自己的指導者，不把他看成从本工人階級中間產生出來的指導者，不把他看成本階級的一部分，不把他看成指導的老大哥，而把他看成愛工作的革命的先生們，這先生們对工人会發号施令，站在革命的博愛的观点上為工人們出力，他們有权利向工人們要求些什么，工人們為的交換勞績也有权利向他們要求些什么，因此，就形成這樣的一種東西，工人走上前去說道："喂，失業了，你們驅使我們失業的，現在請帮助我們失業的人罷"，確切点說，就是党是企業主，他雇傭許多工人做革命的工作，党是企業主，工人是雇傭勞働者，党一企業主付给工人薪資向工人發命令，這真是瘋狂的現象，如果工人階級把整个的党看成果種革命企業主，他們被雇傭于這个企業主来做革命，听受這个企業主的命令並且受他的領導，手鎗，短棒，和長鞭的管轄，如果党也就這樣幹下去，那么，趁早把這个党送到鬼窩裡去，另外，还有一件東西，也應当懂得，就是我們假定，我們的党結果勝利了，取得了政权，這裡必須注意，我們的党取得政权，工人階級取得政权，必定是在極端困難的条件之下，那時在中国將有很可怕的經濟恐慌，將有飢荒，將有全国的停頓，將有貨物流通的斷絕，所有各種的仇敵將全力的危害你們，那時党將因組織工作的困難而凋敝，那時工人將向你們要求道："請養活我們，付工資給我們"假若沒有東西給他們，那末共產党員便馬上塌台了，因為他們事前未曾在事实上教育工人，使工人認識這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使工人知道應当經过許多很大的犧牲，才能得到完滿的生活。如果党只是仁愛先生們的揮揮，工人們对于這些事是不会了解的。必須使工人階級認識自己的政党，這種对群众関係的办法真是為害甚大，現在已經有害了，如果不改正过来，簡直是死路，因此，既已發現了這些小徵候，必須起来反对他們，否則，如我們俗語所說：喇叭八換手

不叫的"，就是換湯不換藥。过去机会主义是有害的，現在又發現了新玩意兒，這个小玩意兒一樣的会使党死在另一方向，所以应当反对牠。因此，必須注意，這種傾向是离開正確路線的，我不愿过于誇張這件事，也不愿断定這是中共中央指導的罪过，或者党的較大組織的过錯，我只是尽我应尽的責任及站在共產国际执行委員会的見地，把這問題提出，因為在最近時期這些傾向在党内的確發現了，必須馬上把牠们剷除和消滅，以便牠们不能够變成或形成新的傾向，以致從另一方向在我党及工人階級發展上加以鎖鍊。

現在，我来說一說，党在現在的主要任務，首先就必須使广大的工人群众認識党不是任何外界力量，党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工人階級最好的一部分，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本身的先進隊伍，並且是能够引導農民的，非常明顯的，在我们受过這樣嚴重的失敗之後，我在报告中已經再三的指明，党的主要任務就是動員和組織群众，建立新的大規模群众組織，奪取原有工会，農民委員会，農民協会等々，而尤其首要的，就是鞏固我们自己的党，党的問題絕不是次要的問題，同志们無論如何不要有任何的自欺心理，無論如何不要过于誇張自己的力量，就現在說，如果我们党員的数量計算起来卻也不少，但是不要忘記，在蘇維埃区的各整个鄉村都算在這个数目之内，因為很多鄉村整个的加入了我党，非常明顯的，如果我们把這些党員都看成真正党員，那么，真是很大的自欺々人的办法，此外，這些党員还是集中在几个人口不多地域不广的縣分之内，必須創造新的群众組織，奪取原有的残餘組織，在現狀之下發生出来的某一任務或某些任務之去"動員群众"。

此处在我看来，还須提出這樣的一个問題：現時暴動路線究竟有什么意义，這个路線一般的看来应否存留，

如果他不应存当，那么，为什么，如果存当，那么应当怎樣了解他？在我看来現時暴動路線是应当存留的．但是他有几種另外的意思，或者更確切点說就是暴動路線現時意义，完全一 而前此某个時期，如广東暴動時期或在广東暴動直接的前夜時的意义完全不同暴動口號所以有各種不同的涵意暴動口号的意义可以是我们今天直接要幹武裝暴動，明天我们要建設障碍物．或者暴動口号不是我们一般路線的口号而是直接要實現到空间去的口号。我說明天我们暴動起来罷，而明天人们果然暴動起来了，全中国暴動口号的涵意現在絕沒有這樣意义，也不会有這樣意义，現在中国沒有全国革命形势（這当然是從這个字的狹意的意义上来講）就是，沒有這種情形，就是沒有整个群众处在極大战鬥情绪之中，而準備着只要能得到勝利便打破任何中国長城也無所顧忌的形势，就按一个簡单原因也可看到中国現在沒有這種形势，革命運動的中心，基礎和主要堡壘——無產階级的革命的中心到現在还未能医好嚴重失敗後的創傷，這是絕对的真理呵，工人開始減低战後的情绪，罷工數量的增加是近在工人中反日運動——反帝国主义運動的增加根據這些事实可說新高漲的趋势日益發展，但是还不能否認這一事实，就是工人運動就整个看来，还未到這種境地，还未到無產階级完全已经走出失敗後低落階段的境地，他正在走出這種階段，但是还未出来；他正在走出這个階段，但是还不能直接的拿起来武器作战，我们說現在沒有直接革命形势就是這个意思，因此，絕对不能說現在全中国暴動的口号，和广大暴動數小時前或數日前的暴動口号有仝樣的意义，現在是不能這樣看待暴動問題的．当我說到暴動時，是說的這一口号的广大意义，就是把他看成在全中国領土内——至少是中国大部份領土内广为播傳的口号．我很鄭重的向同志们說，如果解釋暴動口号或暴動路線的意思是，在秋季党無論

何要発出訓令說："開始秋收暴動呀，"這是不对的，但這種傾向毫無疑义的在中国同志中是有的，因為在革命与農民運動緊相联繫的国家，常以為秋收是指定暴動的時期，這一点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曾经五次三番的促成農民的秋收暴動，在1906年，1907年在我们許多同志中间，甚至在我们党的領導中间，都有這種情绪，然而，同志们，講老实話，對于我们現在能够决定暴動的口号是今年秋收時的绝对实施的口号一点，我非常懷疑，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还没有材料可以作成這一决定，首先就没有城市的材料，没有城市帮助的，確切点說，没有城市領導的全体農民暴動，结果是不免失敗的，没有城市的暴動，不会在中国大部領土内得到暴動的勝利，在城市裡總是存在着国家政权的中心，不管這政权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级的，無產階级的，在工業已经多少発達的国家，有工業的中心，有鉄道，有電報，電話，郵政，有国家政权和国家机関集中羅网，没有城市的政权，绝对不能長期存在的，這種政权或是遭敗退和死亡，或者是在某荒僻之地或很小的区域内保持着，現在我们有几个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縣份，虽然牠们很薄弱，但有這件东西，總是很好的事，將来牠们可以成為中心，在這些中心的周圍，革命運動將発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的擺動，這完全都是对的，但不能把存在有几个苏维埃縣政权的事与中国革命勝利的事混為一談，虽然現在有好几縣有苏维埃政权，虽然那裡有很好的同志工作，但中国革命受了失敗，的確是事实，没有工業中心勝利的革命，勝利是妄誕無稽的，假若今年秋季中国情形是這樣，（理論上当然可以假定，因為這是可能的事，）假若在城市中秋季事变成熟了，城市与鄉村都沸騰起来了，那么，或者可以指定暴動，但是，現在情形這種还没有，事先便

發出秋收暴動的訓令以自縛，這是一点什么也沒有細想過，現在城市中的確沒有這種徵候，使我們在失敗後能準備秋收暴動，這仅是一種美勇的犧牲，应当預先警告和反对。如果秋收有了革命形勢，能够指定暴動，当然非常好呵；那時誰也不反对，大家都贊成。但是，現在还沒有材料可以這樣說，如果仅据這一点来說，秋季是農民收獲之期農民有時憤慨，所以可以指定秋收暴動，這还是不够呵，年々秋季收獲年々秋季地主与農民算賬，纔所以年々秋季農民与地主的衝突格外利害，但這並不够，無論是閏年或者不閏年都是這樣情形，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每年秋季一定要指定暴動。除了這个小日曆以外，總还要一些什么補充的条件吧，我們根据這些条件还应当加些什么口号吧，這些条件現在还沒有，不要來束縛自縛似的先提出秋收暴動的口号，很難說，抱歉得很。但大体看来，這些条件在最近的將来或者也沒有。我們不要虛擬事实，提出我們不能实行的口号，以致結果弄得很難為情，不要号召　許多難免失敗及沒有充分基礎的暴動，不然結果还是党要吃虧，如果党指導暴動，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總是失敗，十次十五次總是潰退，那么工人階級將說："喂聽着"，你們或者是很好很好的人但是，請你們讓開，你們当指導者还够不上呵！工人們這樣的对我党說話，他們將自動的跑到這一政党或那一政中去，他們將奔走不暇的去找這一政党或那一政党，我們党的信用完全喪失了。我党不仅在出世不久而年齡幼稚，就是在党員成份的年齡上看也是很幼稚，但不能根此就說，牠可以每次做个失敗的暴動來出一出風頭這个多餘的風頭就是对于革命的党也是用不着的，因此，在這个意义上看，拟我的意見，暴動口号或暴動路線应当取消暴動口号存留着是這个意思，依我的意見，仅是這个意思，就是我党以為只有團体用暴動的方法根本推翻中国現存的政权，用暴力的武装鬥爭的方法以反

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用全中国工農大暴動的手段把帝国主义趕出去,把資產階级封建階級的政权打碎,才有走出現在情况的可能達到這目的只有武裝暴動的方法,然而這並非說,在中国這樣龐大的国家裡,那裡有許多不同的省份,有許多不同的条件,在極短時期内,在一天兩天之内,忽然奮起了 千百万的民众這是不会有的,暴動在某些省份開始然後及到别些省份,在有些地方失敗,有些地方勝利,範圍是愈擴愈大,但這種情形現在还没有發生,或者要経过很長時期才会發生,但是,為的開始大規模的暴動,必須先有準備,所以現在暴動口号的意义仅是:党向廣大群众去解釋和宣傳,不用武装暴動去根本消滅資產階级,地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工農是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的,所以必須把一切的力量來用來準備暴動。至于暴動的時期,暴動的日歷,以及其他等々現在我们还没有根據可以預先决定的東西,请暂不要决定如果我们相信魔師或者咒符,能够使大姆指从手上掉下来或者不掉下来,那么我们或者可以計祘将来。但是,這些玩意兒我们總是不相信的,我们解决問題是要一定的材料根據的,這些根據現在却没有,鬥爭最後决定問題,环境变迁决定問題,我们準備的程度决定問題,這種準備便是我们現時的中心任務,這任務就是動員群众和组織群众,這任務和暴動的任務绝不相反而恰是真正暴動的 最基本的最必要的前提這種真正暴動和一小群众冒險主义者的盲動不同。從什么事可以滴流出和發展出極大的浪濤,结果引起新的衝突,引起解决各階级命運的衝突,真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從什么事起但是,我们任務在于,第一,了解因各種原因,各種事件都有開始發展的可能,她 或者從因資產階级压迫的影响而引起的大罷工潮流上開始發展,她或者从城市罷工運動與鄉村抗租税抗運動联合的影响之下開始發展,

地或者从另一事件開始発展，或从反日運動開始發展，最近報纸及各方面得到的消息都説明反日運動的發展，都説明日本侵略及出兵干涉而引起全中国反日的仇恨。所以反日運動或者可以成為高漲的發端，也並非例外的事。在国内漸漲着革命的力量国家处在革命危机的状况之下，我们绝不要空放过一切運動的可能，因為革命危机的發展有時很是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革命浪濤可以因次要原因而高漲或開始高漲。中国的歷史也証明這一点就是常有因打死某个人力車夫而引起運動的浪濤由反抗，示威而進入于新的高漲。革命的潮流是流動的，高漲可以為的別个原因，為的日本干涉，或者為的槍殺罷工工人，或者為的別个原因遇在某地某縣的農民，一切机会我党都应該利用。如果我们先决定高漲一定在某件事身上開始，那便成了道夫子和笨大虫，因為事實可以完全走另外一条路道，我们不能先決定，革命新浪潮到底從什么事開始，但是，我们的責任是利用一切的可能，喚起最高限度数量的民众利用最高限度的革命可能性，以便動員最高限度数量的工農群众走向新高漲之路，這才是我们的任務。許多同志在那裡討𢌿，在這一事或那一件事身上要爆發革命的火線，把腦筋都用在去想在這件事或那件事身上可以引起革命的危險，其實危机在這件事身上或那件事身上都有爆發的可能，我们的任務是在于即時準備，当這个高漲開始時，我们即時的把他抓住並引導他到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去，看那裡相宜些，這才是我们的任務，現在因日本干涉的関係，無疑的又開始了新浪潮在我们同志间于是發生許多疑問，我们应否參加這个勾当我们应否再来一个民族統一战線，我们应否又只做反对帝国主义的鬥爭，或時同時有民族統一战線中共力量鬥爭等々。不，同志们，不要一錯再錯，不要害怕這些玩意，假如現在客观形势已經是因為日本

干涉及蛮强政策的影响群众開始起来了而我们却还站在边旁不動，那真是再混蛋没有了。我们的任務是在乡参加這个反日運動，就是我们的態望也不会有民族任何統一戰線給恰良心，現在問題應当這樣的提出：我们應当用全生命之力大声疾呼的反对日本干涉，我们應当喚起民众把日本人驅逐出去，鼓動群众，毫不留情的批評民族資產階級高呼牠是民族利益的叛徒，牠要用日本帝国主义协妥，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那裡会說起民族統一戰線呢？我们用共產国际執行委員会的名义已経发出了好几次指令了，假如現在已経有了一万五六千人的示威運動，而我们幼稚的党不参加，那真是很大的政治錯誤了，必須使在這次反日本反帝国主义運動中，共產党的呼声是最勇敢的最決堅的最有戰鬥性的呼声，以便向背叛民族利益的民族資產階級宣戰，我们必須這樣提出問題就是資產階級和国民党已経背叛民族革命，只有工農能够擬民族革命到底。不能破坏封建制度，軍閥制度，民族資產階級及国民党等々支柱，便不能從反外国帝国主义争鬥中得到任何的勝利，因為牠们是妨碍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鬥争的，這是我们現在應持的態度。假如現在在中国這个問題鬧得很利害，我们一点也不要害怕站到前線上去，因為這件事，不但我们什么也不会丢掉，並且对我党及整个革命事業都有很多的好处，同志们还須明白的了解現在在工農之間的各種特殊要求，是相互沒有衝突的，如反对地主的争鬥為土地的争鬥，或者反帝国主义的要求，這些要求相互間都有联系；因為不踏过国民党的屍体上，不会碎打帝国主义的枷鎖的，不消滅封建階級的压迫，不把牠打得透死，不消滅資產階級的政权；便不会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趕出去，掉过来說：如果現在不掀起拼死的反帝国主义的鬥争，土地革命問題是不会解决的，土地革命的道路是不能徹底肅清的，因為你们如果更向前

進的去解决土地问题以至于取得中心城市的一部帝国主义的大砲便要对准你们来开放，一切反動的力量都集合起来去反对工農專政。打倒地主階級，同時也就是打倒資產階級的政权，同時也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反抗，現在的問題本来是這樣的。

同志们，我不能詳细的把這些策畧路線具体的説明，我現在还只想发表一点意見，就是同土地问題有関係的口号。我对于沒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有很大的怀疑，我虽然也怕我為机会主義的嫌疑犯，或者被判是他的罪恶。然而，我有意見都一定要発表。共產国际执行委員会從来未曾提出过沒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我以為這个口号不大相宜，沒收的意义是毫無報酬的取得某種東西。沒收一切土地的意义就是毫無代价，毫無报償，把一切土地拿过来，就是農民的土地也在内，我想農民对于這件事未必都很满意吧，此外，誰来沒收呢？農民自己沒收自己的土地嗎？這或者是話沒有説清楚吧，我看，這裡大概説的是這个意思，就是土地国有的意思，就是一切土地成為国家財產及有重新分配土地的可能等々意思。我以為是先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這一点是我们应当使農民做的，我们的任務絕不是在于把一切有土地的人的土地都拿过来，就是農民也把自己的土地拿出来，這是遮蓋了階級的界限，你本应該這樣説：”你，農夫，最貧窮，最不幸的人，去把地主的土地拿来吧？而你偏這樣説：”沒收一切土地，地主也罷，農民的也罷”這就是抹煞了口号的刀鋒，這就是抹殺了階級的意义，這就是坏殺了農民对于地主階級的憤恨，農民同地主不能混為一談的，農民自己应該沒收自己的土地，這真是誰也不会了解的，農民這樣也是不高興的，如果你告訴農民説，共產党要拿去你的土地。我可以説，這裡已有了”分配土地”（　　　　　）思想的根源，就是把所

有土地從新分配的思想，你們以後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土地怎樣分配法，現在你们不要忙於這个向当，你们应当实行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用一切力量動員農民群众反对地主階级的任務，這是你们中心任務。因此，在土地問題上不应当発出這種口号，把地主与農民混在一塊，把地主土地与農民土地混在一起的口号；而应当提出使地主与農民对立，使地主土地与農民土地对立的口号，应当向農民說，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你们的土地就要多些了，但是，你们的口号却是：不管什么地主不地主，農民不農民，總是要把土地交出来，也不知道那个農民土地多些，那个農民土地不够，我不懂，或者這很好吧，但在我看来，不大好呢，我以为這个口号是十分可疑的，他或者对于這些人是最急進的口号，就想是一下跳到社会主义的天国裡去的人们，想一下跳到社会主义天国裡去的愿望，是很光荣的愿望，但是現在這个愿望却嫌太早了一点，经过這个大寬濟，或者一觔斗可以翻到社会主义的天国裡去，但是也可以翻不过去而掉在這个深濟裡，這却恰々是犯了不斷革命論的錯誤。

現在我要結束我的报告了，同志们，我想說的只是几个主要的問題，其他許多問題虽然也重要，但比較起来，都是次一点的，我都未能說到，然而就是我想說的這几个問題，我也不知道，我曾否尽可能的把牠们詳细的発揮出来。

現在我想得出一个中国共產党現時策畧路像的結論，就是中国共產党在現在的時期不要熱心于过早的暴動，不要留戀于任何英勇的犧牲，尽最高度的努力去实行動員廣大群众的工作，使廣大群众認得共党是组織的中心，而不是什么超过工人階级指揮工人階级的组織，是工人階级中的一部份，是領導整个工人階级及農民共同反对封建制度，軍閥，資產階级的政治影响，以及外国

帝国主义的鬥爭的組織。

同志們，我应当再反覆的申說一次，中国革命的敵人的力量很龐大，要打斷這个敵人的脊梁骨，必須要動員几万万的民衆，要動員几万万民众，党必須要遭受許多流的試驗，不要慌張，要有極大的鎮定性，不要任右傾的对党打擊，要凝結自己的力量，以便動員和創造千百万群众的隊伍，如果你們能把他們掀動起来，能夠把他們爭取到自己方面来，能使他們走向偉大的革命战場上作战，那么，你們便成為完美無瑕的革命政党，沒有任何慌張，沒有任何不堅定，沒有任何動搖，引導这些群众向敵人一战使反抗你們的敵人終至於死亡。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а VI с'езде Киткомпартии.

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産党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関於政治报告的結論

1928年六月廿九日

I. 在現在國际状况之下，中國革命有無勝利的可能？

II. 共産國际，蘇联，與中國革命

共産國际及蘇联是否帮助了中國工農武裝？

蘇联能否以帮助馮玉祥等的樣子来帮助中國共産党？

III. 革命性質及其将来轉変的前途

為什么革命是資産階級的民主性？

沒收工厰的口号，

資産階級革命與無産階級革命的関係，

将来革命轉変的形式，

将来政权的形式，

III. 對現在革命形势之估計及我們現在的任務

革命的現状，

暴動口号

盲動主義

不断革命論

目前的任務

對各地之自發暴動的問題

V. 党内生活及群衆工作

党内的糾紛，

懲罰問題，

党内的德謨克拉西，

命令群衆，

注意小的鬥爭

群衆工作的方法，

VI. 對城市小資産階級的関係及農民土地問題

對城市小資産階級的策略，

在苏維埃区域中对待小商人小東家的関係，

對城市貧民的関係，

土地问题，

共耕制及自耕農，

VII. 蘇維埃區域中之紅軍問題

VIII. 結論

國际代表问题，

提高党内之理論水平線的问題，

對待敵人及对待同志，

走向勝利的道路.

I. 在現在國際状况之下，中國革命有無勝利可能？

同志們！我開始便說到問題的本身，首先我就要答覆許多同志所給我的以及在討論中所提出来的问題。我要将這些问題，集在一齊，我不是一個问題一個答覆的来說，而是将他總成一個系統，加以說明。我開始說到中國革命之國际性，因此說到中國革命有無勝利之可能问題，因此又說到共產国际在中國革命之帮助的及指導的作用問題。有個同志向我說，中國革命若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的帮助能否得着勝利，或者，另外的同志对於這個问題提得更為切实些，但内容是一樣．他问：現在国际的工人運動，首先是西歐的工人運動，还沒有發展到一個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自然也不給與中國革命所需要的那樣有力的帮助．因此就要问：在這一種國际政治状况之下，中國革命即使在他的德謨克拉西的（民主的）階段之上，究竟有無勝利的可能？

同志們，假使我们現在答覆這個问題說，是不能勝利的，則在我们前面便擺着很悲觀的結論．自然呵，也不能故意底自慰，不能因為我们所希望的是另一樣，便不照着事实去妄加說明．但在我们分折了事实，比較了中國所發生的與其他國家所發生的事変，估計了将来應當捲入中國革命战争中的力量，同志们，我们應當要說，我们並沒有任何根據任何理由可以对於這個问題抱着黑暗的悲觀的觀点．為什么呢？我们在蘇俄鬥争的經驗告訴我们說，雖然有很多的帝國主义者向我们進攻，但我们終於保持着自己的勝利，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能保持勝利，主要的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帝國主义的本身在他的鬥争中是内部破裂的．第二，因為我们的党能在很廣大的疆域以内動員很廣大的群衆．假使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或者以前的俄羅斯帝國在疆土上像

英國或者俄國的某幾省那麼樣大，則雖然在帝國主义營寨中有那麼樣的破裂，我們也未必能保持着勝利．我們之所以能勝利，是因為當時有了這幾種條件的湊合．我們勝利是因為在帝國主义營寨中有很劇烈的鬥爭，破裂．又因為我們的工作與鬥爭都在一個很廣大的疆域以内．雖然當着我們的敵人將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工業中心各方面都包圍起来了，但在敵人背後之一塊很大疆土以内，如西伯利亞，已經爆發了革命的民衆運動。

現在在中國所發生的是這樣，中國革命已經驚醒了比較廣大的民衆，雖然尚不十分充足，但他可以驚醒（並且一定要驚醒）世界人類中之一部份最廣大的民衆，在數量上还要超过當時的俄國。帝國主义國家在現在並沒有直接破裂，就是說，他們还沒有發生相互的战爭，但在這一點上中國却有一個優越的地方，就是他在地理上完全與其他的帝國主义相隔離着，僅只一個日本在旁边．這是一個很有力的地方。並且中國革命也發生於一個很廣大的區域以内，自然呵，海道可以使帝國主义容易派遣軍艦，但是另一方面，全國交通的不便，農民區域範圍的廣大，距離鉄路的遥遠，若想包圍他，則有如當時日本包圍西伯利亞之一樣的困難．自然，這也同時是中國革命之中一個很大的弱点．甚至於僅就一點說，中國工商業城市都帶着海港的性質，还有其他的許多弱点．但是所有這些條件的總和，絶不能對於中國革命的事件，便存一個沒有希望的心理．相反的，我們可以說，人口數量的衆多，土地幅員的廣大，與許多其他殖民區域（印度，南洋，印度支那）的接近，縱然當着西歐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还沒有發展到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前面開闢了很廣大的勝利的前途．

另一方面，一切中國革命之継續的發展，自然要反映到西歐及其他各地之無產階級的運動．這是我对於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II、 共產國際，蘇联與中國革命

還有一個力量，他对於中國革命也是有非常之大的影响，這就是苏維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國以及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國际組織——共產國际．我関於這個问題應有幾句語要說．首先我就要提到上次一個同志对於我所提出的一個很堅决的問題．這個問題提得非常有興趣，非常堅決，也絕对不是外交式的．我想在許多同志的腦中都存在着有這一樣的觀点，因此我要答覆這個問題．

這個问題說：„共產國际执行委員会為什么没有帮助我们党来武裝工農？”

因為有這個问題的関係，我不得不加以比較詳細的說明．同志们，我首先應當告訴你们的，就是在現在中國同志中間，对於與上層領袖所說的話所定的條件，還有很大的迷信，而同時不能估計到下層群衆的实际力量．你们以後就知道，我為什么從這裏開始来說，好像這些話與現在的问題完全不相干一樣．這一種遺習，我以為在中國革命發展过程之具体的实际行動中，有非常之深固的歷史根源．在當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参加革命的時候，當着他事实上是在與封建軍閥及外國帝國主义相奮鬥的時候，在各種談判中我们的代表都有很大的意义．因為——共產國际和苏維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國的力量是這一部分参加革命的資產階級在當時所需要的．當着發生了很大的階級力量的变化之後，當着民族資產階級投降到反革命的營壘中的時候，當着他需要反对苏联而與帝國主义吊膀子的時候，自然，在這時候的一切語言，談判，條約等々以前非常有效的東西，便已停止其效用而不能再起作用了．為什么呢？因為在他後面过去曾有的实际力量，現在已經完結了．在以前的一個階段中，民族資產階級需要保持对於苏联之親善的関係，在

當時苏联所有的影响，在下一個階段中便已經完結了，消失了，沒有自己的基礎了。但是共產党員以及當時的許多俄國同志，尤其是鮑羅廷，他們習慣了对於他們的話有相當的意义，他們仍然依舊底繼續信仰他們的話之实際的力量，不明瞭他們與這些上層領袖的談判，現在已經失去了实際的基礎。就在蔣介石上海事變之前，及以後的武漢時期，中國共產党以及鮑羅廷們对於這点都完全不能明瞭而且不能估計到。他們以為不必要群衆去動，自己用語言来與自己的敵人（武漢政府，汪精衛，以前是蔣介石）商確談判一下，他使們不必要做他們所想做的事。不明瞭階級鬥争的規律将要更有力量些，不明瞭當時苏联对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関係，已經不是可以扶助談判商確的，而是需要另外的一種作用了。

這是一個不很大的例子，你們由這個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每一個馬克思主义者，共產党員，革命家在每一個進攻或退守的時候是應該怎樣正確底去变更自己的策略，去整理自己的軍隊，怎樣不應該忽略了所發生了的变動。這一段話說完了，我来說到问題的本身。共產國际及苏联，是否帮助了國民軍呢？是帮助了他的：我認為在當時是應當帮助的。在當時中國共產党也是帮助了他的。中國共產党帮助了北伐，我認為這也是應該要做的。這些是我們都已說过了的問題。苏联站在國际的观点上是應當帮助他的。因此使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报紙都喊叫着苏联在中國的勝利。並不是苏联奪取了中國的土地，而是苏联擴大了他的精神上的影响。這是有非常之大的意义。一切國际上的报紙都說國际帝國主义是在從中國退讓，事实上當時也是這樣。難道帝國主义不是很明顯的有一個時候是在中國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嗎？難道事实上不是有一個時期，使加拉罕

做了北京外交團的領袖嗎？難道事实上不是有一個時期使北京的一切外交官在相當的程度上都要聽加拉罕說話嗎？這就是使苏联在國际地位上之比重加高，這是有很大作用的。固然，以後我们的領事被他们槍斃了，這也是事实。在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當着民族資產階級还有相當進步作用的時候、苏維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國是應該帮助他们的，中國共產党同樣也帮助了他们的。但是說共產國际执委及苏联没有帮助中國工農以使他们武裝自己，這是否正確呢？這是不正確的。我可以向你们說出許々多々的共產國际由此地所給與中國的通告，訓令。國际的政策是這樣，應當在所謂國民革命軍中進行我們的工作。我们屢次的發出許多訓令，說必要組織特別的工農隊伍。在武漢時期，我们主張必要組織七萬工農軍，使他專在我们的指導之下。假使這件事終於没有做，這並不是我们的錯誤。這件事没有做，是因為在中國的種々原因的集合。在這一点上我们共產國际执行委員会絕对没有錯誤。对於這件事做了很大錯誤的自然是鮑羅廷。他的錯誤，他之首先要負責任的地方，就在於他藏匿了我们的許多訓令而没有宣佈。他所没有执行的，無疑义底正是與土地革命問題有關係的。假使我们不能發展農民運動，假使我们不在軍隊中宣傳土地革命的思想，假使我们不能將兵士群眾拉到自己這一方面来，假使我们只像當時一部份很好的同志那樣底只用合法的手續来对待我们的政敵，則我们便不能建設我们自己的軍隊，我们也不能在國民革命軍中作工以奪取参加反革命軍隊中的兵士。共產國际給了許多很正確的訓令與通告，而在中國之很好的同志仍然是做了錯誤。這並不是說，我们在這裏一点錯誤也没有，關於這点我以後再說，但是我们在整個的一般的路線上，我们在這個時期都給了以完全正確的指導。我们的政策，

是主張建設我们自己的武裝，因此若說我们没有幫助中國工農来武裝自己，這絶对是不正確的。

III. 革命性質及其将来轉变的前途。

現在我說到中國革命的性質问題，在這裏我又要首先說幾句話来反对這種中國式的謙讓客氣。我在我的報告中曾說，有許多我们在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道路上所應該做的東西，但他的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我說了土地的社会化，地主土地的均分，等々，都还没有超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以外，很明顯底，許多演講的人，故意特别為我留面子，在這裏說了許多：„這不是社会主义，這还不是社会主义，這也不是社会主义，”說許多東西，都一定要聲明一句，„這不是社会主义”，我很害怕，不知道怎樣对於我们所希望所願意的事，總不能得着相反的結果，許多東西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其他的東西有的已經是社会主义了．我絶对不願意在這個講堂内造成一種心理，使着中國同志恐怕社会主义如像見了鬼火一樣，使着中國同志明天在五鼓天未明的時候，便起来賭咒發誓說他與社会主义一点関係也不会發生．我應當說的，就是我们一切問題之根本的出發点是由於我们希望到社会主义，我们是要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革命在中國並不能立刻的一齊都来到，而我们還要經过好幾個过渡的階段，意思僅只是這樣，问題是在於現在中國政策的重心究竟應該是什么．在受了嚴重的失敗以後，党的大会首先就要决定全國的政治狀況以及目前在党前面所樹立的任務，這自然不是說代表大会不應當决定関於前途的許多问題．在関於中國革命之前途的问題，我们曾答覆說：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由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轉变為社会主义的革命．當着我们說到前途的時候，我们特别注意指明這一点．但是當着我们說

到今天的任務，當着我们說到在我们前面之直接任務的時候，當着我们說[illegible]在实际工作中之重心的時候，我们要问現在还是要立刻实現無產階級專政呢，还是要預先奪取工農的民主專政，还是要立刻奪取資產階級的工廠與製造廠呢，还是要預先進行政治革命以推倒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現在的重心究竟在那裏，這就是首先應當解决的问題．正因為对於這個问題的回答，我纔說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在現在革命还沒有進到社会主义的階段，我再說一遍，在我们党大会上之最主要的任務是要对於現在在議事日程上擺着的問題給以决定的答覆．假使我们在答覆今天之問題的時候便不與明天的问題發生関係，這自然是錯誤的盲目的，也是非馬克思主义的，因為我们之基本的任務仍是社会主义，是工人階級專政，是建設社会主义等々很好的東西，這些東西是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的。這種前途應當使他時々刻々都在我们眼前擺着，但是我们因此决不能只是眷念我们的前途，而忘記了現在直接在我们鼻子下面的東西．究竟是否是一個很好的革命者呢，假使他總在想二千年以後人類是在怎樣生活，當是已經是完全的共產主义，當時也沒有階級，人類彼此也不用鬥争，也沒有槍斃的，也沒有殺人的？我们是在希望這樣的社会．但是假使我们由這個二千年以後的將来的狀况来出發而說，在共產主义時代不槍斃人，因此我们現在也沒有权利来槍斃我们之階級的敵人，因為共產主义時代彼此是相友好的，於是我们現在大家以及我们的階級敵人都應當友好。难道這是一個很好的革命者嗎？他或者很可以做一個佛教的好和尚，做一個基督教的好牧師，但是要做一個好的革命者——這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可以抽出一点相像的地方，我们將要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這是正確的．但因此你不能不注意今天在你前面所樹立的直接任

務，我們要找着離我們最近的地方，而在這裏樹立我們工作的重心．這些问題如像是：反对帝國主义，土地革命，爭奪八小時的工作制，等々．奪取工農的政权．這就是了．這些都还不是社会主义，這就是我以為你們要注意而應該記着的事．

一個出来説話的同志居然做出了這樣的提議．一個工人同志，我不記得他是由中國那一省来的，他説假使我們現在不直接提出佔領工廠的问題，則工人是不跟着我們走的．照他的意見问題是這樣：或者我們要現在立刻直接提出佔領工廠以及資產階級之私有財產的口号，或者像中央之有一封信上説的，應當避免關於沒收所有資產階級之財產的问題．這種避免革命之基本问題的方法，我是認為不正確的，雖然這是你們中央所寫的．

説我們現在應提出佔領工廠的口号，不然工人便不跟着我們走，這種話在我看来是太為誇大了．將這個作為中心口号是沒有根據沒有必要的．是否我們除了提出佔領工廠的口号以外，便不能使工人跟着我們走呢？我想不是這樣．我以為各地作工的同志是比較你們党中的中央委員要看得清晰些．這是由所有這些演講中很無疑义可以看出来的．許多同志都説了現在工人心理究竟是什么狀况的．中國比較最落後的地方——東三省的同志説，我們那裏也沒有机会主义，也沒有盲動主义，什么也沒有，非常乾净．另外又有同志説，工人看共產党如同看野蠻人一樣，很害怕．还有一部份工人甚至於希望張作霖．這就見得並不像第一位同志所説的那樣．事实既不是這樣，假使中國共產党提出„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号，這在這種現像中是自相矛盾的．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你們中间認為很右的某某同志，在他的演講中却説了許多很正確的東西，雖然他過去做了些很大的錯誤．他是説：現在工人這樣説——我們困苦了，疲倦了，

不要驚動我們，讓我们休息一下。無論如何工人的這種心理都不是像有幾位同志所說的：或者我们立刻起来去奮鬥去奪工廠，或者什么也不用說．這是不正確的，事实並不像這幾位同志所說的這樣事实是另外一個樣．

还有一個问題我要說的，就是由這些同志的演講中可以推出這樣的結論，以為在不奪取政权的時候，可以在各地佔領工廠製造廠，例如在还沒有奪取政权的時候，胡漢民或者其他資本家的工廠中的工人起来佔領了工廠，預備自己去管理他．這是絕对的鬼話，絕对不可能的事．你们當然要澈底想想，這為什么是鬼話呢，第一，你们想想，假使你们現在奪取了工廠，而你们在當地却沒有奪得政权．我们既沒有政权，則資産階級的隊伍便立刻開来了而向你们說：„滚蛋！你们若要不走開，便槍斃你們”。你们怎樣呢？假使你们要說：我们是做好事来的，来整理生產，因為資産階級怠工，因此請你们不要槍殺我们．這樣，他们便要用另外的方法对待你们嗎？假使他们不聽你们的話，你们将怎樣做呢？你们要自己保衛嗎？這就是要進行鬥争，要奪取政权，你们若奪得了，很好，我们慶祝你们歡迎你们，或者在你们奪取政权的時候，他们已将你们摧殘打倒了．因此，不奪取政权能否保持已經得到手的工廠呢？不可能的，這是絕对的鬼話，這等於你說„非常乾燥的水”，或是„渾圓的平方”，等々，這完全是彼此矛盾的．沒有奪取政权是不能在手中保持着任何的工廠製造廠的．因此，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党之主要的任務正是在於向每個工人来解釋工人階級必需奪取政权的问題．這是我们党之主要的任務，他有很長久的性質，這是第一点．第二，将来我们在中國是不是有一個時期我们要佔領工廠製造廠呢？自然，一定有的．関於這個问題我不一定要各位同志都與我同意，因為這個意見我还沒有同任何

人說过，就是我個人以為我们在中國要奪取工廠製造廠的時候，将在我们建設無產階級專政之先，就是說在工農專政的時期，在國家歸於苏維埃的時候．我想國家一定是苏維埃的形式，関於這個问題我以後再說．我们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先，便已經要奪取工廠與製造廠．為什么呢？関於這個问題已經由許多同志給了很正確的回答．因為我们的政权，雖然當他还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專政，但他是反对資產階級而存在．因為我们不僅要打倒外國帝國主义及國内封建的政治統治，並且也要打倒資產階級的政权．資產階級因此将要逋逃，資產階級的工廠将要停工，関廠，資產階級要怠工．許多乱七八糟的事，到那時候我们自己要做．於是我们在最後便不得已而開始佔領我们所反对最激烈的外國企業，以後再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所抛棄的工廠、製造廠，以後便是資產階級怠工以及宣佈了関廠的企業，以後再到其餘的．這一点对於我幾乎没有任何懷疑的了．但是问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說我们是不是在很早的時候便要提出這一個口号．我对於這個问題的答覆是，我们俄國甚至於过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还没有提出這一種口号．我们當時的口号是：工人監督生產，企業的强迫联合，在工人監督之下使資本家联合．僅只以後國内战争發展的結果，我们纔開始实行大企業國有，開始执行的時候，他是帶着懲罰性質，當着資產階級怠工的時候，我们因此而没收他们的企業以歸國有．國有是在各地先開始，在大中心地方幾乎是在前後一個時候执行的．但在你们國家中，前途还有一個比較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照我的意見，這個階段固然不会特別延長，但他總是一個整個的時期，整個的階段，這個階段中我们任務的重心还不在於這裏而在於我上面所說过的幾個基本口号：工人監督生產，没收土地，八小時工作制，承

認一切工会，工廠委員会的权利，工農專政，反对帝國主义，将帝國主义趕出中國．這裏就是我们現在的政治重心。

為預防中國同志们的誤会起見，还有一点也是需要我說明的，就是絶不應很機械底将革命的這一個階段與那一個階段完全隔斷．不能說在開始之第一個階段中是完全的百分之一百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点社会主义的原子也沒有．若如此便也沒有什么轉變了．很明顯底，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子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所包含着．並且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時常包含了許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尚未完成的分子在．在中國革命之這一個階段及那一個階段中，不会有什么萬里長城将他隔絶着．無論如何决不能說，到那一年那一個月那一天為止，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此後便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這是世界上不会有的事．現在只是說，要使到一般中國同志不用有無意識的妄想，不要忘記我们現在是被人打敗了，現在还沒有什么新的革命高漲．要記着，我们还沒有完成土地革命，帝國主义还在我们家裏站着，我们的力量还沒有團結起来，要使着所有的同志都明瞭這些，而並不是要說我们革命已經変成無產階級的了，更不是要口裏儘管大聲喊叫而真正的事却做得很小．更或者以為只要共產國际执行委員会給我们多些帮助，我们立刻便可以做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不会有的事呵！你们要喚醒廣大的現在很沉默的工人，你们要聚集現在很散漫的農民的力量，你们要組織現在被人打碎了的你们自己的党，你们不能因為四個鄉村加入党之後，便以為党員的數量是很快的增加了，這簡直是笑話．自己應當很好底知道自己．現在要避免一切的空想而同時要完全信仰自己的事業，信仰自己事業是正確的，信仰自己之最後的勝利，要很冷靜底明瞭底估

討現代的政治環境，一切問題的实質就在於這裏．假使將這些事件都明瞭了，這絕对一点也沒有離開社会主义．„我们一切都可以丢去，但無論如何要聞一点社会主义氣味，”這是胡說，是鬼話，我们應當向社会主义去，但我们應當由現在擺在我们前面的環境出發．我们看着在我们前面有個障碍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跳过去便不應該跳过去．我们應當擺說一層，二層，三層，四層的梯子以慢々底跳过去．這就是我们現在对於這種问題的基本態度．

因此我们說中國革命現在仍然在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的階段上，他将来是可以轉变為社会主义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並不有中國式的萬里長城使他隔絕着．同志们，在這種状况之下，我们的政治任務是什么呢？現在我们所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階段，其中心任務不在於很快底去建設無產階級專政，而在於实現無產階級及農民的專政．不在於很快底去沒收所有的工廠而在於去發展土地革命，驅逐帝國主义出境，開始实行八小時的工作制．以後怎樣呢？許多同志就要這樣問：國际代表，請你答覆什么時候開始社会主义革命，什么時候開始轉变呢？我可以向你们說假使我要是個算命的先生，自然我告訴你们了．誰個也不能答覆這個问題，同樣誰人也不能答覆関於高漲的问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什么時候有革命的高漲，誰人也說不出来．我可以說一点，你们的工作做得愈是好，則革命的轉变便来得愈是快。

関於時间的问題，乃是要階級鬥争的事实来決定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論可以判斷．假使你们照着某々等所說的，好像将一切加在一起，引好多平方根，以某数乘之，再以某数除之，其結果或者可得一個什么巫仙所畫的符咒．假使你们都变成些糊塗蟲，自然你们便看不

到革命之轉变，假使你们聰明些行動，自然你们可以比較快的看見革命的轉变．假使你们还要照着以前那樣連党失敗的那樣做工作，則一切的音樂都要延長到無限長的時期．假使你们能喚醒無量數的群衆，正確的执行政策，則你们很快底便可以得着工廠製造廠以及其他很好的東西．関於革命發展的速度及其期限问題，関於什么時候轉变與什么時候可以勝利的问題，完全要依靠着階級鬥争的事实而决定．而只有你们的行動愈是聰明，則階級鬥争的实际行動纔愈有勝利的把握．你们——中國共產党——是革命的先鋒隊．就是如此，再多的不能說了．

我現在說到另外的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同志給我而需要我給以相當之回答的．這個问題說：假使說我们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有轉变為社会主义的前途，但這是否在中國工農階級奪取政权之後，仍然需要一次新的暴動新的革命呢？更明確底說：假使你们在中國與農民共同奪取了政权．工人階級及農民站在政权之上，在中國內地都在進行推倒地主的統治，進行継續的鬥争，等々．那么，當着革命轉变在下一個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是否还需要一次革命还需要一次暴動呢？或者还有其他的形式可以轉变？究竟是要怎樣底轉变呢？

我應當說的，就是這個问題实在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並沒有預備給他一個答覆，因為這種答覆是可以從所有一切的可能中去推想的．在這裏我只能由這許多可能的凑合中而說一個比較可靠的形式．我想最可靠的将是這樣一種情形，當着革命轉变的時候，一部分從前跟着我们走的，到那時候将要離開我们．例如我们可以想像得到，首先将要離開我们的就有一部分從前跟着我們走現在还跟着我們在一起的富農．

我指出一点有興趣的事．在你们大会中曾有這樣的演講．有許多農民代表説出来了一些這樣的事实，就是有許多大農富農也是跟着我们走．有一個簡直説了大農與我们共同反对地主的事实．這自然是可能的．這種可能的原因是很簡單，因為我们能解放農民之对地主的义務，我们能縮小他的税，使他的税減到最低的限度，因此我们就能吸收廣大的農民群眾使他跟隨着我們，不僅是貧農中農，甚至於一部分的大農也在内．這種現像究竟有什么的程度，這要看在中國各個地方之各種不同的條件而决定．這些條件我们將要在土地問題的报告中来更詳細的研究．現在我们説當着工農專政实現的時候，地主被打倒了，農民都補充了相當的土地．地主再不會分取他们的土地，因為地主在經濟上已經不成一個階級，已經消滅了．現在就是貧農將要為着什么而継續鬥爭．現在的問題就是説．我们一定在許多地方都要發生經濟上的困難，在與敵人進行軍事行動的時候我们或者要採取軍事徵收的制度等々，在這時候比較最富足的一部分農民便要離開我们．到那時候他也要與一切其他的反革命的力量来共同的舉行暴動来反对我们反对政府．假使在我们党内有很大的農民影响，一定有一部份受這種農民的反映以離開我们而走到現在正在組織的第三党中去，成為我们的反对派．或者也會有這一種情形，譬如第三党忽然張大，忽然成為一個很大的政治力量，或者譚平山的党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在這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階段中將採取一個中立的或甚至於與我们很接近的態度，而在革命之緊急時期他又轉到反革命的道路上而引動一部份從前曾跟着我们走过的分子．

我们在俄國也曾过了轉变到純粹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你們知道，我们直在十月革命之後，还曾組織了與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立政府．後来 當我們在農村中組織了„貧農委員会”之後，一部份富農便離開我们而趨向於敵人．這一種現象的政治反映就是使着在苏維埃政府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員舉行暴動以反对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我们的暴動被我们压迫下去了．在這個暴動之後我们将他從苏維埃中從政府中趕出去，於是我们革命的轉变便完成了．

這就是說一部分曾跟着我们走过的富農将要離開我們，或者在将来中國革命轉变的过程也有例如這樣的困難以及類似的這樣形式．但是，我再說一遍，使我保証一定是這樣的形式，則我是絕对不能的．教我斷定事实将来一定的確是怎樣，則我無論如何不能，但這種現象是不会除外的．這裏有許多関係还是現在所没有看見的．假使我們在实現工農專政的道路上已經走了兩步，那么，我们对於革命前途自然要看見得比較更為明顯些．但是現在还不能看見．

我不敢向你們作百分之一百的担保，說你們将来的工農專政僅建築於你們一個党的形式之上而並不與其他急進的革命党成立联立政府的形式．関於這個問題我現在不能答覆．這还是看不見的事．我以為或者会形成一個什么急進的革命党，他在某一個革命階段上将與我们共同行動．或者是左派的譚平山的党，或者是其他的單独組織的党，或者是一種特别形式的農民協会，他不完全是共產党的，他並不完全隨着我们走而有相當的自立性．或者会有這種形式，當着我们要組織無產階級及農民之專政的時候，我們要與他们訂立妥協．有時候兩個階級的联合是表現於一個政党的指導之上，而在這個政党中存在得有小資產階級及農民群衆的影响．這是一種形式．但是也有另外一種形式，就是在那時候發生了一種新的急進的農民的革命政党，他的社会基礎不

是像我們這樣首先依靠貧農，他們依靠着另外的一些人而使着我們在當時要與他们成立联盟，這也是可能的。你們一定要說比較起來這是不好的．要照另外的一種樣子，便比較好些．但是我不敢斷定這種東西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呢？我再說一遍使你们注意，假使我們是已經快到工農專政之勝利的時候，我们对於一切関係可以看得清白，在那時候我们自然容易回答．但是我的觀点是這樣，我们不要誇大了，我们應當記着：在無產階級及農民之專政尚未实現以前，我们是在一個集聚我们力量的時期，要恢復我们的職工運動，改組與鞏固我们的党，等々，我们还要走到大暴動之時期的，到那時候我們要動員廣大的群衆，僅只有這樣，我们纔能得到無產階級及農民的專政．在那時候要怎樣，将有些什么派別，我不能說，我想任何人也不能說．是否說我们不能立刻看見這種前途便不会有自己的政治路線呢？無論如何不是的．由此所能做的結論僅只是一点，就是我们無論如何必要盡量鞏固我们的政党，尽可能底奪取與建設群衆組織，盡量底樹立我们在那裏面的影响．這是我们現在之主要的任務．假使我们完成了這些任務，那么，無論在什么樣的状況之下我们都可以得着比較好的地位．就讓他形成了什么急進的革命党，就讓他能以進行鬥争，只要我们有領導权，我们在那時候已經奪取了群衆，則他对於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他还不是同一個秋天的樹葉一樣，在下一個階段便要滾蛋，同在我们俄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一樣．假使我们不去奪取群衆，我们只是時々刻々底站那裏喊：暴動呵！暴動呵！暴動呵！不同意於我们的便槍斃，結果，群衆沒有奪取，而党会因此消滅，這对於党有很大的危險，因為他取消了我们一部分的群衆．我將要盡量的說明這個問題，因為最近的消息告訴我们，譚平山的党在上海已經有了办

得很好的机関报．我们还一点也没有．你们知道报是一件很大的事．正因為這種可以與反革命勾結的机会主义的党，他現在也進行群衆的工作，他駡我们的政策是跑得太遠忘記了群衆，——正因為如此，我们要加十倍底努力做奪取群衆的工作．這就是現在的問題．要用什么樣的方法来奪取群衆，我以後再說．現在我所注意說的只是一点，就是我们不能預先斷定絶不發生什么小資産階級的農民派别，他企圖同時作工而同時反对我们的党．正因為如此，我们總要用特别的努力特别的注意来提出我们之群衆影响的問題．在這裏我们党應當學習过去革命的經驗．过去的經驗告訴我们說，中國共産党不能完全明瞭革命由這一個階_段到另一個階段之轉变，不十分的自立，阻碍了群衆運動，等等．

從這些过去的經驗中我们應當要說，我们要注意将来由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轉变的前途，抛棄那一種以外来的帮助可以使革命由這個階段推進到那一個階段的观点．我们應當更嚴重的提出我们群衆影响的問題．

因此，関於這個革命轉变的问題，関於是否需要另外一次革命的问題，結果仍是使我们回顧到鞏固我们全世界之基礎的问題上．我们由這個问題上出發又回到了那同樣的一個地方，又是要教共産党需要用尽所有的力量来組織群衆。

関於由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轉变的问題，我还有一点要加以說明．我想無産階級與農民之專政的形式，将是苏維埃制度．还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权之前，还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中，只要工人同農民奪取政权，則他们的奪取定在苏維埃的形式之中．這種可能是非常之大的，因為苏維埃的政权形式是直接由群衆鬥争之組織中而産生的，我们從前已經說过，工

人階級同農民之可以奪取政权，僅只是當着我们能推動非常廣大之群眾的時候．苏維埃是最適合於這種運動的組織．因此我說，若奪取了政权，若政权的实質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則政权的形式政权的建築大概也是苏維埃的形式．最要緊的事件是建築在群眾上，最要緊的事件是要武裝群眾．群眾的武裝總是实际的力量．照我们所有的可能来計算，若是無產階級及農民的民主專政是在苏維埃的形式之內建設着，則這種形式能使革命由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專政过渡到無產階級專政之階段的時候也更為容易更為方便．我们党要奪取苏維埃，要擴大與鞏固我们党在苏維埃中的影响，這都是與這種形式的彈力有密切联係的．因為在苏維埃中将有無党的工農群眾，若當時有了另外别的政党的形成，則或者也有别的革命政党的代表．自然，我這裏說的並不是國民党，國民党中無論是左派，右派或是其他的派别，都完成轉变到反革命的營寨中去了．這裏我们已經斷定了．我所說的是或者有什麼新的政党成立，他在革命之某一個階段中是可以與無產階級及我们党合作的．或者是会這樣，或者不会這樣，總之無論如何苏維埃的形式是給了我们以發展影响的可能．因此苏維埃的形式也可成為政权轉变的形式．在我们俄國就是這樣．我们苏維埃中在開始的時候，不僅是包含着布尔塞維克及無党的群眾，並且也包含得有左派的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了我们的政府之後，他在革命之繼續發展中舉行暴動来反对我们，我们預先在苏維埃中已經奪取了最大多數的群眾，因而能将他们完全由苏維埃中趕出去．

III．對現在革命形勢之估計及我們的任務

現在我說到在許多同志的演講中所争論得最激烈的問題，就是对於中國革命現狀之估計的問題．但是我又

有一点普遍性質的話是我首先要聲明的，就是所有出来說話的同志，或者是許多出来說話的同志，在討論中都沒有走向正確的道路．這種不正確的道路，在中國同志中間可以時常發現的，就在於过量来分析字面．在這裏我们發生了什么争論呢？我說了，我们現在站在两個革命的浪潮之中．你们争論的是什么呢？你们争論的是說：有沒有低落，高漲，波浪，高潮，……等等．有沒有浪潮，波浪與高漲與低落有什么區別，浪潮是什么新名詞呢还是照舊日一樣的了解．照我的意見，你们对於這些争論，結果只是一團糊塗．以後我又看見是那一個同志找出了一個新的定义——革命的高潮．我们要問：波浪或者浪潮與高潮有什么区别，浪潮又與高漲有什么區别，或者我们还可想出好幾千個名詞，来找他彼此的區别．我们可以說，除了浪潮以外我们可以想出許多小的名詞，到那時候我们有——浪潮，波浪，高潮，浪花，高漲，……等等．結果，我们的分析一定要到達那個地步，什么是浪潮，什么是高潮，什么是高漲，等々．這对於詩人或者是很好的東西，但不是对於政治家有用的．因為這些字僅能表示着一種半藝術的意义，而不能確定出的確的政治内容来．不應該由分析字面分析名詞来出發，這樣只是自取糊塗而不能找着真理．那個对於„浪潮”這些字分析得最好，讓他去分析罷！但這個並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現在的事是要分析在中國發生的是什么，這總是主要的．現在中國發生的是什么，當你們争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要去分析字面，而要去分析实際的事实．應當由分析這些事实出發，然後对於所有在中國所發生的事，而給他一個共同的總括的估計．在這裏討論的重心一方面是轉在討論字面上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說，現在在中國的失敗是口頭上的，而在事实上是高漲的．还有一個人，我不記得是誰了，他也說失

敗只是口頭上的，他簡直說：„表面上是失敗的而事实上我们一切事件都是很順利的”．但是事实上現在在中國的情形是：失敗是事实上而高漲是口頭上的．這句話總是正確的．為什么？因為事实是這樣告訴我们的．我應當說的，有一個很大的成見，就是以為好革命家一定要說他那個國家的革命再过五秒鐘就可以成功．這是絶对的妄談．其实好革命家的任務完全不在這裏．関於這一点我要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来向你们說明．

革命最激烈的形式不是國内战争嗎？這是对的，革命就是國内战争．國内战争就是階級鬥争之最激烈的形式．党就是指導國内战争的力量，是一個進行國内战争的無産階級的組織．

假使現在正是國内战争正是革命暴動的時候，假使在你们前面有一大支軍隊，你们要指導這種軍隊来進行國内战争，假使有一個指導這一支軍隊的将軍，他時常向兵士說，不必顧計任何的條件，無論什么時候都應該進攻，不必看敵人有好多槍械，不必看敵人的軍隊是怎樣佈置等々，你们可否說這個将軍是很好的？他時常都說，敵人樣々都沒有，我们件々都好，這是否是一個好的将軍？他說，無論什么時候都應當進攻而決不退却，這是不是好的将軍？他說，我们時常都應該上战場上去，不要計算敵人的力量，不要停止，不要補充預備隊，不要在後方動員群衆以帮助自己的軍隊，他在失敗後剩了五個人的時候，还在向這五個人說：„我们尚在活着，我们还要進攻”，這樣的人，我们是否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将軍呢？我想，我们对於這樣的将軍總不会說他是一個拿破崙而要替他找一個另外比較更普通的名字罷．這是絶对明顯的事．

政治的鬥争也是這樣．假使我们要遇着了這樣的将軍，我们一定要罵他是一個蠢蛋．假使有這樣的将軍，

他只是說進攻而不計算敵人的力量，雖然他将要自命為很堅决的，很勇敢的，很左傾的，但是我们将要向他說：你也不是能幹，也不是左傾而是一個簡單的糊塗蛋，莽漢，我们一定這樣来告訴他。在軍隊中是這樣，難道在政治上不是這樣嗎？當然也是一樣的．聰明的将軍並不是要他時常很左的，並不是要他今天也暴動，明天也暴動，後天也暴動，过四天过五天也是要暴動。聰明的将軍乃是要他時常能估計到敵人的力量。假使這種将軍，他今天也在說暴動，明天也在說暴動，只是說敵人很弱，没有力量，我们很强．這種将軍有什么作用呢？只說，我是口頭上失敗了，事实上雖然我的面目打得紛亂，但我仍是勝利了．這簡直是笑話，是絕对不能這樣說的．因此，真正的革命者並不在於他時時刻々都要喊叫暴動，今天要暴動，明天要暴動，後天也要暴動．假使有人說，„我们没有槍械，没有武裝，没有群衆，怎樣能暴動？今天我面上还有血，怎樣能暴動？讓我将血洗乾净了再說”，於是就要罵他：這是小胆子貨．就是有個人很委屈婉轉底說了這一番話，那么，立刻要々罵他：哎唷！你這狗頭，你這机会主义者，哎，你這取消派，等々．親愛的同志们，我们党中大概已經有过這樣的情形了．現在中國的狀況是這樣，工人階級被打倒了，這應當承認的．有句很好的俗話說：„敗軍善於學習”，列寧時常重複這句話．假使你们的軍隊已經打敗了，而你们妄自高大底不承認，你们反要說，我们战勝了一切，破坏了一切，不承認現在主要的任務是在於補充自己的力量，不願意去學習，則你们会有第二次的失敗，第三次的失敗，以至於最後底将你们的完全運動消滅．這就是共産國际执行委員会第九次会議之决議案的意义，這時候我們轉身过来了．我知道在一部分中國同志中間有這樣的一個觀点：哎，共産國际開始变更自己的政

策，放棄自己從前的態度了．以前他告訴我們：暴動暴動，而現在却說：收集力量，補充預備軍，尋找工人来添補自己的隊伍．在各種群衆組織中作工，注意一切小的問題以擴大我们的工作，等々．這樣，共産國际已經變更了自己的態度．這種見解只是那些在街上散步的中國小姑娘们可以說出来．這些小姑娘们——中國的也罷，俄國的也罷，——他看見說了另外的幾句話，便說共産國际已經變更了他的態度．每一個比較聰敏的人都不應該有這種見解．在失敗之後，我们身上現在还有数十百個創傷，現在若仍要每天暴動，簡直是以革命為兒戲．這是絶对不正確的．假使那個拿出這種覌点来，不管他自命為左派，右派，或是其他什么派，都表現着他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蠢漢．在這裏我應該要說的，工人同志有時是了解得很好的．在你们大会上有許多工人同志．都說了話的，一個工人說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有一次的罷工，工人很勇敢底出来反对廠主．結果使工資加了五個銅圜．此後工人又出来很勇敢底反对廠主，結果加了一角．罷工勝利了．事过之後，党部書記又叫舉行新的罷工，但是工人都知道再多是不能得着什么了的．他教工人再去幹，工人反对，但是結果仍然幹了．幹而失敗了．失敗後將共産党員都由工廠中趕出去．因為在這件事之後，工人再不信任他们了．這就教做不会指導鬥爭．在這個情形中是工人預先看見必要失敗的．暴動的事也是這樣，大家都暴動过了，暴動失敗後的第二天，又有人去教他们明天再暴動．他们不願意暴動，於是用力量号召他们，命令他们，压迫他们，用各種方法恐怖他们．結果使這些人又去暴動一次，又去受一次比較更嚴重的失敗．同志们，這樣的政策是用不得的．我再重複底說一遍，中國工人階級已經受了非常嚴重的失敗，只有瞎了沒有看見這件事．南昌暴動是失敗了，廣州暴

動是被压迫下去了，還有数十百個其他的農民暴動都是失敗了，我們好幾萬党員都被他們槍殺了．在這種狀況之下，不可以不明瞭需要改編自己的隊伍，補充他，鞏固他，然後再去衝鋒．只有那些不以這為預備進攻的，以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要再幹了的人，總是右派，变節者，机会主义者，不中用的東西，等等．但是問題不是這樣．我們由直接暴動轉变到集聚力量，並不是為的不再暴動，我們之所以將我們的路線轉向奪取群衆，正是為的預備更有成效的真正的群衆暴動．我們總是這樣，即令有人說我們是拋棄了從前的路線．不錯，暫時我們是拋棄了的．從前我們的政策是說明天暴動，而現在我們說：明天在全中國範圍内还不能暴動，我們要開始準備我們自己的力量．到了我們力量準備好了的時候，到那時候我們再暴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在全國各處都不能有個別的暴動，並不是這樣，関於這個問題我以後再說．但是在我們党的整個口号方面說，暴動由直接行動的口号变為宣傳的口号．這就是說，要根據日常的生活狀況，每日向每個工人去說明去宣傳，告訴他，若要希望你的生活能以改良，只有你能以明瞭暴動的必要．我再重複底說一遍，暴動的口号是現在向群衆宣傳的口号，現在不是一個直接行動的口号．要向工人這樣宣傳，不要像一個小孩子樣，而是要像一個真正的指導者樣，這沒有一点什么羞恥，慚愧或不正確的地方．假使你們做一個結論：哎唷！算了罷，做不到的，一切都完了，不要幹了，離開党，避開工人階級，這便更坏了．應當一千倍底勇敢些，到工人中間去，去奪取他們的信仰，要整理與改造自己的隊伍．這就是在預備真正的鬥争，真正的暴動．問題就是這樣．現在你們所說的波浪高潮以及其他的東西都是些紙面上的，要這些東西做什么而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者对於詩人是有

意义而对於政治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應當很肯定底說：在現在失敗以後，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新的高漲的，這是事实．無論在那裏，當着高漲的時候絕不会這種情形，如像許多工人同志在這裏說的，工人疲倦了，北方的工人甚至於希望張作霖，在上海廣州等大工業中心中，工人的組織被破坏了，從前我们在那裏有幾百幾千人的地方，現在只剩了二三十個，有時甚至於二三十個也没有，同志们，那種以為現在還可以教工人举行暴動的人，還是表示着他腦中仍有國民党遺傳下来的舊残餘，可以下命令叫工人去暴動．大家都要知道，群衆暴動僅只有當着群衆自己相信的時候，當着群衆已經沸騰得如沸水一樣的時候，總能举行，到那時候你總能指導他，若群衆不願意暴動，而你勉强教他暴動，則結果無論如何去暴動也不能得着勝利．這就叫做没有直接革命的高漲．應當一萬個記着，讓你们怎樣来称呼現在的形势——高潮也罷，高漲也罷，其他什么鬼東西也罷——但是，我们應當要說，在許多嚴重的失敗及大破坏以後，現在並没有强大的直接的群衆運動，因此，提出直接暴動的口号便是糊塗，因此，任務的重心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放着．誰個不明瞭這，結果他一定会倒台。

同志们関於盲動主义說了很多，並且也討論了関於盲動主义之来源的问題．是否由於党中的智識分子？還是有一貫的理論呢？還是由於不斷的革命論呢？提出這些問題都是很好的，我想对於這些問題都可以給以圓滿的答覆．我的观点之不同僅在於這裏，就是不能將這一個解释與那一個解釋彼此对立着．譬如有的同志出来說，盲動主义是由於某種理論而發生的，另外一個同志說，不是的，盲動並不是由於某種理論而産生的，他仍是由於我们党内之小資産階級的無政府主义的傾向而産生的．我们来爭：由於某種理論呢，還是由於小資産階

級的傾向？親愛的同志們，不能這樣擺設問題的．因為這一個就是那一個的表現．舉例來說：正確的革命策畧是由於正確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決定呢，还是由於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生活條件使 他成為最革命的階級呢？怎樣能這樣提出問題呢？事实是這樣，無產階級是因為他的社会实質的関係，使他成為最革命的階級，因此他能接受馬克思主义的理論．他接受得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更多，則他施行的策畧也更為正確．我们說机会主义的来源是一樣，說他的社会基礎是一件事，同時机会主义可以表現於某一種理論或某幾種尚未綜合而能以綜合的理論上．在這裏对於盲動主义我以為首先要握取他的最主要的地方．盲動主义之最主要的基礎就在於他想用軍事陰謀的手段来進行暴動．今天有了四支手槍，十個人，便以為可以暴動了．這什么暴動也不是，只是簡單的陰謀，說不上是什么群衆的暴動．盲動主义的特点就在於沒有群衆而舉行暴動．這就是盲動的实質．盲動主义並不在於他舉行暴動．暴動在某個時候是應該舉行的，應該勇敢底堅决底澈底向前進攻．這並不是盲動主义．這種行動假使是群衆做的，我们指導群衆，我们是暴動群衆領袖，此之謂真正的暴動．假使只是幾個人，後边沒有群衆，發出暴動的口号，参加的有得幾十個普通人和两個兵士，再沒有什么了，這就是盲動．在現在這種階級鬥爭非常嚴重的條件之下，我们党又有這么樣的籌頭，盲動主义可以使我们党迹澈底完全破坏，一点也不存留．我们的幹部被拔去了，我们党的中堅分子被槍殺了，暴動之最好的幹才，被敵人處死了．状况就会是這樣．不僅你们党中，在許多党中，在所有共產國际中都有這樣的病態，這一個同志覺得愈是左愈是好，另一個覺得愈是右愈是正確，但是真正的真理，也不在左，也不在右，也不在高，也不在低，也不是任何其他的空間

名詞所能形容得出来的．真理乃在於當時的政策是否適合对於敵人力量及所有環境的正確估計．我又要說我前面已經說过的例子．在我前面一個溝，我現在應當渡到对面另一個岸上去．最左的策略——跳过去．假使我有很好的腿，我又会跳，自然我就可以跳过去，我也應當跳过去，因為這樣我便可以很快底过到溝的对岸．但是我的敵人已經将我的腿子打傷了，而我的左面的朋友却喊着說，跳，快跳，左脚先跳．自然，我是跳不过的，我只有跌到溝中去的可能，到那時候他还要笑我了。在這時候我應該找梯子，甚至於找十層梯子，将腿緊繫一下，扶着梯子做十步走．無論如何，我終要渡过這個深溝。假使我差一支腿而硬要勉强底跳，那么，不过僅只是将自己的性命丢了．我不跳，你要說：„哎，你一点也不左，太右了，你連跳一下就不願意”．讓你去說罷，喜歡怎樣說，你便怎樣去說，只不过表示你蠢便了．

同志們，正因為由這種观点出發，國际执委第九次会議中共産始轉变他的政策．自然在開始的時候是有幾個同志不能明瞭的．站在進行鬥爭之正確的战略观点上，在這許多嚴重的失敗以後，我们應當集聚新的力量，退後一步而補充自己的預備隊，整理自己的幹部組織，採取正確的政治路線以預備新的力量去進攻．那一個反对這種观点，應當向他解釋，告訴他，說服他，指出他的錯誤，在這種新的態度上去奪取党。這就是第九次执委会决議的意思．

还有一点要說明的，同志們問，所謂不斷的革命論在這裏有什么関係？我覺得無論对於什么樣的党，特别对於年幼的党，不應當故意由西方搬一肚子的新問題，新名詞，等等．這樣僅只是将腦中弄得一團糊塗，而又要費很長的時間像我這樣底来慢慢底解釋．但是在

另一方面說，我也應當給以簡單的解釋。為什么不斷革命論是不正確的呢？因為這種理論只是指出了革命之向上的路線。現在对於中國共產党之最危險的地方，就是中國党不看見在許多失敗以後的低落。這種低落将要延長幾個月呢还是一年呢，我不知道，這要看你们的工作做得怎樣，看你们怎樣去縮短這個期限。許多同志由這種不斷的理論而又造出了新的理論，以為失敗只是口頭上的，事实上我们有許多很大的勝利，他不管我们有許多同志的頭都被人割去了。假使由這一個觀点出發，說革命是不間斷的，這就是說革命的發展是向上的，是前進的。由這種观点出發，則他就使人不能看見現在革命正是間断的。我說革命現在是間断的，並不是說革命完全死了，乃是說革命已経受了那樣的失敗，使着我们現在不能進攻。什么時候有新的高漲，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很快的。但是在目前沒有什么革命的直接高漲，並且也不会有的。為什么？因為我们的一支腿已経被人打坏了，我们只有一支腿是不能進攻的。假使是不間断的，假使我们的腿沒有打坏，則我们便不用什么梯子便可以跳过去，也用不着一点退讓了。

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錯誤，他的錯誤在於他觀察事件只是站在一個抽象名詞的观点上，並不因為„不斷"這個字不好，或者因為其他的不好，乃是因為這種理論不適合於我们應當認得很清的具体事实。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政策之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很正確底認識環境，不要誇大了危險也同時不要看小了。有時候我们同志看小了危險，有時候相反。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曾說过：我们這裏还不好，這裏还不好，這裏也还不好，敵人這裏还好，因此現在不要暴動。过了幾天他又說：固然我们這裏还不好，但是這裏好了，重要的城市中心在我們手中了，群衆跟着我们了，應當開

始暴動，無論如何不能再遲緩了．列寧當時完全是对的．但是到了布列斯特和約（1918年，德國向苏俄進攻，苏俄向德國訂的和約——譯者註）的時候，當時有些同志在當時耀武揚威底說，我们要進攻德帝國主义．但是列寧說：你是個糊塗蛋，你不看見，軍隊破坏了，農民饑餓着，農民不願開战，工人也餓着，應當先用力量使他们興奮起来，以後再進攻．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列寧在十月革命時候的進攻是对的，列寧在1918年的退守也是对的．在我们這裏當時也有过那樣的聰明人，他說：哎唷!在十月的時候進攻，以後又退守，你们看呵，他的政策也被自己改变了．但是，列寧是一個真正的好將軍，他答覆說：不錯，昨天我们進攻了，今天我们要退守．只有糊塗蛋他要每天都進攻，或者每天都退守，或者每天都暴動，這是些鬼話．一樣的字，我们可以將它寫出来堆一箱子，但是对於实际革命的行動是沒有一点帮助的．

因此，我们由上面的分析一定要做總結論說：現在的工作重心應當是奪取群衆．你们腦中还有一個不正確的觀点．我在這裏並不想罵你们那一個，這对於年幼的党是完全不奇怪的．一個同志說，来到大会之後，他看見大会並不想分析一下每個人的頭腦．不錯，我们是不想分析的，我說到你们党内問題的時候，我再說．你们每個人是在想彼此將你我的頭腦分析一下．關於這個我以後再說．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你们中間曾造成了一個這樣的环境，一個同志說：„我當時想暴動是很危險的，但我不敢說”．他並不是一個小孩子，不是一個小姑娘．你看他也是這麼樣高這麼樣長的人，為什么怕說呢．因為說了就有機会主义的嫌疑．我对於他是很明瞭的．在這種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說，要注意到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錯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說他是機会主义，

不守紀律，而將他開除党籍了．在現在中國共產党中不要亂說什么机会主义者，也沒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假使一個出去强姦了女人，你们也要說他是机会主义，關於這我以後再說．要說到那許多名詞之區別的時候，說什么浪浪呵，浪潮呵，以及其他許多其他海運學上的名詞，他们彼此究竟有什么樣的區別．中國離海很近，或者你们对於這些是知道得很清白的，但是由這中間决不能找出什么聰明的政策．要知道在許多嚴重的失敗之後，我们还沒有走到革命的高漲，群衆还沒有起来，城市的工人还在銷沈着．農民運動在有幾個區域中固然是發展的，但是他还不成為一個普遍於全中國的運動．因此，我们政策之最主要的地方要像我在上面所說的奪取群衆．不要口頭上底而要事实上真正底去反对机会主义．要知道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一個同志說了一個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在某地方槍斃了一個女同志，僅々為的她是地主的女兒，雖然她是一個很好的同志．被命為槍斃她的同志說，我不願意槍斃她，因為沒有原因．於是就有人向他說：哎唷！你不想槍斃她，你害怕，你是机会主义．這個人說：我不願槍斃她，因為沒有原因．於是他就被認為是机会主义了．這簡直是用字面開玩笑，這種盲目底乱用名詞去開玩笑，乃是真正的莊重的政治家所不容許的．這是應當直接說的．照我的意見，為這樣的事不能槍斃的．需要打一頓屁股與小小底挫折一下．這句話應當從藝術上精神上去了解他而不是說的肉体的．這樣不能造出党内之任何意見的，這樣不能進行鬥争的．我们現在是要預備暴動，我们要認清時間，到了我们預備好了的時候，到了群衆真正起来了的時候，到那時候我们放一個號砲便可進行總攻擊．在此之前，我们是要用盡所有的方法来組織群衆．在這個時候，我们在某幾種條件之下，也不能拒絕個

别的行動．関於這幾個條件，我下面便說．

関於我们主要任務的問題，関於暴動口号的問題，我已経給了完全確定的答覆．我的答覆是說：暴動由一個直接行動的口号变而為宣傳性質的口号．我们要宣傳：為的实現工農所應有的权利，趕走封建地主，統一中國，等等，必要工人與農民奪取政权，必要武裝暴動．暴動是一定要宣傳的．暴動在今天是不能成為直接行動之口号的．但我又說过了，在幾個例外的特别的情形之下，党可以發出直接暴動的口号或者可以帮助暴動．當什么時候呢？是當着在一個比較大的區域中，群衆已経沸騰到自己開始暴動的時候．我们不能不站到鬥爭之中，我们不能放棄群衆而不去指導，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應當指導這種個别的暴動，使他成為更有計劃更有組織的，使他尽可能底與其他的口号發生联繫，使他尽可能底不致於失敗而得着勝利，使他能消費很少的力量以得着順利的結果．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他有許多偏僻地方是正式軍隊一時不能走到的．我们只拿中國苏維埃區域的経驗便可以知道．我不能說，無論在什么條件之下，無論在那裏，無論什么時候，都不應該有総暴動．我要特别指出這是有條件的，中國党大会也應當這樣指出来．我今天說了，你们不用說浪潮浪花等々的名詞，我很怕过了今天以後，那個提了„浪潮”這個字，他又要被罵為机会主义者．我今天說了，你们不要用„机会主义”這個字，我又恐怕你们因此又做個結論，無論誰個不論怎樣都不要說他是机会主义了．政治家要知道一切話中要怎樣正確底去了解：什么不能做，在什么時候不能做，什么時候能做，什么時候用不着，什么時候有利，什么時候有害．每一種理論，都是在一個相當的程度以內，是对的．應當知道到有了另外一些條件的時候，則他或者成為不正確的了．或者在有另外條件的

時候，他还没有成為完全不正確的，但是他一半的力量已經消失，另一半的力量仍然存在．應當估計到注意到這些各種不同的变動．當着我說你们不要乱用"机会主义"這個字的時候，你们不要由這句話做出結論說，從此不要與机会主义奮鬥了．假使还要與机会主义奮鬥，那么，便應當武裝自己，便應當自己明瞭究竟什么是机会主义．當着我說，直接暴動是可以發生並且應當指導的，我很怕，中國同志一定要向我說：你又這樣說，又那樣說，說得一團糊塗．你们一定要问我：直接說，幹呢还是不幹，我答覆說：照一般的道理說，不能幹，在有幾種例外的情形下面，可以幹．因為要使我的話不會被曲解起見，我还要說一遍．假使你们将這個例外當成了道理，規則，那麼，你们便要離開了共産國际．我怕你们根據這種例外而又曲解了党的正確路線，将例外當成真理．假使我们对於群衆自己舉發的暴動，而不加以帮助，這就是離開了正確的共産党人的路線．生活不是個赤裸裸的圓輪，生活更不像個人一樣，将褲子脱了，便将大腿看得清々白々：圓的，光的，滑的，等等．生活並不是這樣一個赤裸裸的圓球．生活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有各種的傾向，各種的條件，各種完全不同的種類，因此，很多的時候發生各種的例外．我再重複底說，假使我们遇着了這樣的情形，當那時候我们有了真正的群衆運動，當着農民喊叫說：開始暴動呵，在這時候，我们不能站着旁边，我们應指導這種暴動．但是因此不能說暴動就是我们目前的直接任務．我们根本的任務是在於奪取群衆．只有例外的時候，我们可以舉行暴動，同樣也是要奪取暴動中的領導权．我已經說过，我们一般的政治路線，主要的策畧是将我们直接行動的暴動口号取消，暴動的政策，在宣傳暴動及預備暴動的意义上說，仍然存在．這是已經很明瞭了．這要不明

瞭起怎樣可以明瞭呢？這是很明顯的了．因此，現在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将要是這樣說，我们在失敗之後應當停止說暴動這句話，用不着暴動，一切都是空的，工人階級不能由暴動得着什么的，我们跑得太前了，等々．這總是机会主义的路線．我们的路線乃是說，我们失敗之很大的原因，是由於我们只走在尾巴上，我们沒有指導群衆．這是我们共產党之主要的錯誤．在失敗之後，假使我们不看見失敗的結果，不去計算他，當成沒有失敗一樣，這便是同樣的錯誤．相反底，我们的主要任務在於集聚自己的力量，補充自己的預備軍，尽量底去組織群衆，要在這些工作做了之後，再来根據我们过去所得的經驗，根據我们腦中所有計劃，根據我们在這個時期所可以學得的一切政治知識，根據我们所預備的革命高漲時期的組織，根據我们所已經鞏固了的群衆，一根據這些東西，来下我们的總攻擊令．

V．党内生活及群衆工作．

現在我說到関於奪取群衆之幾個最基本的條件問題，関於這個问題，我是與我在所有的結論上一樣，要盡量利用在你们演講中所有的材料．我不是要重複這些事實，乃是要說明在你们的演講的報告中所說的意思．

同志们，我首先要說幾句関於你们党的話．自然，我的任務不在於要将你们的党駡一頓．這樣是不对的．駡是不加說明的，而在這裏是需要說明的．你们党因為沒有經驗的関係，自然無條件底做了許多錯誤．這是沒有疑问的．如像某々同志，他不是個智識分子，是個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個革命者，但是因為沒有經驗的関係，做了許多右傾的錯誤．我應當向你们說，你们每個都是因為沒有經驗而做了很多的錯誤．我也是做过錯誤的．很大的很嚴重的錯誤，也是因為沒有經驗．

每一個人，他活到幾十歲，他都知道有許多東西不是預先可以知道的．許多東西我們只有在生活經驗中在实际行動中可以知道無論從什么書中都是學不来的，只有在生活的教訓中可以學来．書籍僅能帮我們减少自己的錯誤，能帮我們學習在实际生活中首先便可以學得的東西．群衆更是完全由实际生活中學習而不是由書中學来的．我們只能帮助群衆对於這些生活的教訓，應該怎樣去領畧，悟会，了解．

我曾與你們討論过関於敵人之力量的问題．我說你們中间曾有幾个人說敵人的力量並不是很大的，因為在他們中间存在得有衝突．說敵人力量弱並不是真实的，說敵人内部有衝突，統治階級内部在鬥争，這是真实的．為什么統治階級内部自相鬥争呢？因為中國事实上不是一個國家，乃是幾個很大的國家，具有各種不同的經濟條件，有時各地之彼此的經濟联繫是非常薄弱，全國鉄路很少，交通不便，因而也沒有全中國之統一的市場，很大的地方影响，地方的衝突，各處都表現得中國之完全的不統一，各個階級又生活於各個不同的條件之下，等等．譬如你們的資産階級，她也是生活於各個不同的條件之下，他們系屬於各個帝國主义的派別．因此資産階級之内部的利益也是彼此不同，因為不同就發生了彼此的鬥争，就跟着各種帝國主义而分頭跑了．

我还在报告中就已經告訴你們了，用什么東西我們来战勝敵人呢？用群衆以及我們自己的鞏固．但是在工人階級及我們党内部同樣受了這種中國散漫狀態的反映．在我們中國共産党内部有許多很像國民党内部那一樣的鬥争．這是实在的．這裏我也承認這樣說是誇大了一点，是加了一点色彩．但是我們總要說，在我們党内是有些派别，這些派别有時是很難用政治東西去加以解釋．你們大会開始的時候，在選擧主席團的時候便已經發

生了這樣的状况，或者在選举中央的時候又要重演一次．因為在你们党中实是存在得有這種小的派别，這種派别之成立，在相當的意义上說，还是由於中國之地理的及政治的條件．同志们，這是我们党中的分離主义，地方主义，省治主义，或者是其他的„主义”，假使我们再注意中國党将来發展的條件，前途还有很恐怖的很緊急的鬥爭．我们可以說這種樣子很像國民党的現象．

你們都知道，假使我没有記錯，在廣東曾發生过了這樣的派别的鬥爭．一派人想根本消滅廣東党部的幾個上層負責的人，因為他们有机会主义的錯誤．而廣東的這幾個上層分子也想根本消滅這一派人．這種階級鬥争的鬥争形式，發生於工人階級内部了，這是值得注意的事．這裏有一位同志在你们大会上的演講，他說：„現在我說到我们這個區域中的党内状况”，這位同志乃是湖南的農民，„我们党内的工作是不大好的，假使有同志做了錯誤，上級机関不去糾正他的錯誤而去将他拉来處以死刑算了”．我们因這可以想起汪精衛的宣言，說胡漢民錯誤了，胡漢民的宣言，說汪精衛錯誤了．都要做錯誤，都要因别人錯誤的而割取别人的頭，来這樣辯論。同志们，這種國民党式的办法不要搬到我们党裡来罷！假使你们不願意離開政治，你们便應該知道奪取群衆的主要條件．是要週圍着你们的有党．要的是党而不是什么英雄的集会．英雄或者能夠英勇的死，——雖然他有時也还是不要鼻子的——但他不能整理党内的生活使他不發生破裂．你们知道，就是很壯勇底死了，總不如将事情做好了，得着勝利以後再死．你们總要使着敵人多死一点，而我们自己要尽量多活一些時．值得我们首先給以嚴重注意的，没有這一点便不能發展党也不能發展革命的，這就是要尽量打擊地方主义，打擊派别，打擊排除異己（懲罰與我意見不相同的人）

的心理．自然，我是很知道的，國内战争継續了這么長久，人們都習慣了一切的恐怖状態，大家的脾氣性格都変焦燥了．我們可以說出幾百上千個原因出来．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已經很冷靜底研究了所有這些特点．我可以同樣很冷靜底断定說：假使党内保持着這樣的状況，則無論什么樣的革命，什么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什么轉変為社会主义的革命，什么浪潮，高潮，什么鬼都不会有了的．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這些東西正是表示着失敗，正是表示着失敗以後的象徵．我應當向你們說的，就是在我們當失敗以後１９０９年的時候也是同樣發生过這樣的現象，我自己看見过的．那時候我們的武装糾察隊変成專門注意小搶奪的東西，以後彼此搶殺，大家拿着毛瑟槍来彼此算賬：究竟應當怎樣的擁護正確底路線．但這乃是失敗的現象，這乃是党的腐化．

假使党的指導同志也有這種意思，假使他們不能給這種現象以嚴重的打擊，這種現象便可以変成一個很大的悲劇，可以変成一個很嚴重的東西以至於使整個的党完全消滅．你們看，兒戲暴動已經做到了這種地步，有幾個同志說：得了中央的命令教我們暴動，但沒有什么可以暴動，槍是沒有的．於是我們帶着一盒火柴，燒房子去．好了，难道這是暴動，為什么要去燒房子呢？房子是應該奪的，應該燒的是他的房主人．难道你們以為中國的房子愈是少則中國群衆的生活便愈是好嗎？我想，你們也未必想了的呵．暴動変為火柴式的兒戲，因此可以槍斃同志，因此可以使同志犧牲，這是一種很大的笑話，同時也是很大的悲劇．同時党内的生活也是這樣的无組織，無訓練，因為党内的爭論可以打破頭．無論他　帶了火柴的沒有，這是一件糊塗事．這一次党大会應當用很堅决的手段来停止党内的糾紛．這一種武斷的方法是小團体式的．將一切爭論変成了這樣的鬥爭

是很野蛮的．政党必需要取得群众的信仰，共産党人之一切的行動應當是群众的模範．這種火柴式的暴動以及這種党内鬥争是不能在廣大的無党群众中取得尊敬信仰的．因此，首先應當停止在共産党中的一切國民党内部鬥争的形式．中國之革命的無産階級應當立刻打倒這種現象．

我應該要說的，党中的上層智識分子是更要注意這点的．假使在他们中间若發生了這樣之彼此無原則的鬥争，則我们定要號召，動員，勸使，工人去反对他们．工人是沒有智識分子那樣好鬥的．當然，我並不是說時常都不需要鬥争，有時非用鬥争不可的．但是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所有的党内鬥争都不是因為原則的政治觀点不同，說到政治這些東西則大家都說彼此同意，乃是因為各種派别不同而鬥争．假使在你们中间仍有像統治階級（國民党）中间那樣的鬥争，則劝使工人来反对智識分子的領導，是必要的．我要說這些話还有一個原因，要使你们了解這些東西，使你们在選舉中央的時候，不要重演在這個大会所已經發生过了的那種現象了．現在中國共産党的力量是很少的，應當宝貴所有的每個同志，只要他不固执过去的錯誤，只要他帮助正確的政治路線．假使他不固执自己的錯誤，則过去的事我们不用再提了．應當善於估計每個同志，看誰人是站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上，誰人已經不固执过去的錯誤了．不要将一些小鬥争小派别當着兒戲，要拋棄這些東西．假使党的上層領袖只像個國外的小組織樣，假使他们还要鬧那些意氣的鬥争則党不会成為中國無産階級之一個群众的政党的．那么樣，則無論什么党的群众組織是不会有的．

假使是因為沒有政治路線，那么另是一個事．但政治路線是有的．我们現在所說的所擁護的共産國际的路線，並沒有人願意出来說話反对呀．因此，大家对於這

種基本的組織前提應當注意。

與這有関係的，还有党内生活中之第二個問題，這就是我们所有的處分（懲罰）制度．我们之中有人做了錯誤則他便要受處分，從槍斃開始．這種办法是極蠢的，由此是不能得着什么的，做這種事的簡直是發神經病的糊塗蛋。或者你们还有這樣的制度，就是因一点小的錯誤便立刻取消他的工作．這照我的意見仍然是不对的．例如在廣東暴動後所有的那種懲罰，將一切莫明其妙的人都一掃除尽，這我認為是不正確的．自然呵，取消工作，將他送走，有時候对於一切党都是必要的．但是這卻不是因為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而因為某個人有系統的不進行正確的路線，破坏紀律，組織小組織的鬥爭，等々．到那時候這種手段總是需要的．假使一個人做了一点錯誤，他便如在尼姑庵中的尼姑一樣，因這一点錯誤便要受處分，取消工作．則在中國這種沒有經驗的年幼的党中，你们便造成了這樣的一種情形，就是中央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以内，一定要處分好多人，中央完全要掩護着而沒有人批評了．以後群衆便要喊叫着說：你取消了我的工作，你自己也做了錯誤，你也應當滾蛋．於是我们到那時候連党都不会有了的．彼此相互来取消，中央從上面来取消群衆，群衆由下面来取消中央，結果怎樣呢？這種現象曾為普列漢諾夫很聰明底說过．普列漢諾夫說無政府主义者有的政綱是兩條．第一條——無論什么也不会要了．第二條——誰人也不能委託他去执行前一條．這種状況乃是由上面所說的那種危机中產生出来的．党現在處到這一種状况之中則無論如何是不能發展的．我还要說的，你们还需要稍為擴大一点党内的德謨克拉西．你们是書記好像皇帝及上帝一樣．那一個还在這裏說，我在你们大会上像上帝一樣．我也是穿着皮鞋来的．我今天第一次聽着說，上帝穿着

史難走路。但我可以仿擬你們腦中所想的書記，省委的委員說不用暴動，党的群众說不要暴動；工人也說不要罷工，但是書記一個却还是說，必要罷工，暴動，書記要負量好一点，就是人数少一点也是好的。好書記他應當知道，當着任何人都不願暴動都不願罷工的時候，你自己还要暴動罷工，這就是糊塗，這就是等於抱着自己頭来撞這玻璃窗。

同志们，関於党的問題我継續还有幾点要說明。関於指導及命令的问题我已經說过了。我还要重複一遍。所有的同志應該明瞭，党在工人階級中並不是發佈命令叫人服從的，並不是像軍隊中的排長連長一樣。這樣並不需要很大的智識，而党則需要很大的智識。党的智識是這樣，一切党的机関——特别是他的指導机関——在每一次的行動中都應當明瞭群众的心理，要明瞭群众為什么而行動，怎樣能接近群众，怎樣能說服群众。僅只有這種基礎上可以取得群众。自然呵，改正过去之大的缺点，大的錯誤，僅只有當着党的指導幹部作工是非常成熟的時候纔可以。因此，在你们形成指導的時候，——更明白的說，在你们選擧中央的時候，要使每個真正有能力的同志，站在正確的政治觀点上的同志，可以仍然在指導机関中作工。要寬宥他过去所做过的錯誤，只要他現在不固执已見便可以了。我說„寬宥錯誤”這幾個字，或者是不大好聽的話，是我们普通的時候所不說的。應當丢在旁边的僅是那種現在还固执已見而不改正过去錯誤的，這種人可以防害的指導。但是有能力的人，觀念很清白的人，做过实际工作的人，能以帮助党的人，只要他不固执自己过去的錯誤，便應該有他的工作地位。不然，則現在在中國共產党中还不能造成很好的很堅强的指導，因為大家都做了錯誤的。假使你们総是彼此不相融洽，那么只有現在將一切事不做而等待

着新生下的新少年，這些人将是很乾淨的，吃細白米長大的．他们在武漢時期也沒有做过錯誤，因為在武漢時期他还沒有生下地．但這还得很長的時间来等候呀．我想在這個時間以內，你们不僅要奪取政权还要想許多其他的東西，还要想革命轉变等々。我们可以說，党因為年幼的関係，便比較别的党要做的錯誤多些．但我们的任務不在於去計算這些錯誤，而在於說服這些还沒有覺悟的人，而在於給一切人以可能，使能明瞭他过去实在做了錯誤，使他能知道我们现在所指出所努力的路線是最正確的政策。

同志们，你们要注意所有這些党內生活的缺点——党與上層同志之関係上的，党與一般党員群眾之関係上的，党與非党群眾之関係上的，对群眾用强迫方法使他參加革命運動，盲動主义等々，——都是彼此互相联繫的．這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我雖不說他是一種政治方向，而是某一種的——我不知道能否譯成中文——情緒．

事实上，假使我们以為„命令”這個字，是很有力量的．假使再加以手槍或者步槍，於是一切问題都很簡單了．反对机会主义嗎，将党內的机会主义者槍斃幾個，將其餘的机会主义者按倒地下打他们幾百屁股，於是机会主义便消滅了．事实都很容易做了，發個命令，將某人用拳頭照着脊背上打一頓，於是群眾都去暴動了．一切都像軍隊中一樣照着命令去做，一，二，三，一喊，口令一下，於是在這落後的中國，社会主义便成功了．事实就是完全不能照這樣的，中國人民不是軍隊，並且更不是服從中國共產党之命令的軍隊．中國党並不是一個軍官團（就這個字的本义看）．党應該說服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相信党的指導，使他们知道這並不是外来的力量，乃是自己之最好的力量，自己階級中的

頭脳。

假使站在這種党内工作的観点上来看，則对於其他的事件，对於組織群衆，对於盲動主义，对於群衆運動，都是同樣的関係．我没有任何中國同志那樣客氣，我可以很率直底説，這都是些國民党時代的残餘．在那時候，某々建决定了問題，只同那一個説一説便可以了事，現在則這套把戲是不能完了的，這樣是不能解决党内的问題了．現在要發動群衆，要在党内德謨克拉西的基礎之上，使大家都明瞭究竟是一回什么事，為什么需要這樣的政策，等々．只有國民党中有這樣的状況，他可以今天發佈命令停止群衆運動，明天可以發佈命令解散群衆運動，因為群衆運動有害了．後天又可以發命令叫去革命，因為這並不是革命，乃是„朝中的政変”，乃是軍事陰謀．軍事陰謀是一回事，群衆暴動又是一回事．假使在我们的指揮之下是有幾千萬軍隊，有机関槍，有大礮，那么，自然我们要另一種方法去革命，那么，我们便打到大城市中去没收大企業，趕走帝國主义，打倒資産階級，帮助農民暴動．等．但是我们這些東西一点也没有．我们現在要各個地方發動群衆，由群衆中造成軍隊．怎樣能發動群衆呢？要説服他们，有個同志他很興高彩烈底説了一件很可痛的事．他號召工人去暴動，工人笑他．當着工人笑我们的時候，這算是最不好的樣子了．當着别人用鼻子哼我们，我们还可以忍耐，這还是英雄，但當着工人笑党的時候，這便不知道叫做什么了．這要這樣了解呵．應當使工人不笑党而信仰党．當着你説工人現在还笑我们，這就表示在你们前面还有如海一般大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做了之後，總能發動群衆，總能指導他们去鬥争．因此我説，無論用什么樣的命令是不能發動群衆的．因此，在工人運動中我们必要尽量向一切可能的有空的地方去，尽量宣傳他们

煽動他们，然後總能引導他们鬥争．

在這裏首先應當拋棄這樣的观点，以為共産党不可以注意小的問題，小的要求．中國共産党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困难的地位，事实上共産党員在各處都是非法的，為一点很小的事，讀傳單，貼標語，开会，等々，都可以立刻宣佈死刑．関於這不用我說，你们比我知道的还好些．在這種状况之下我们怎樣呢？関於這個问題應當仔細底想想，在提出職工问題及農民问題的時候，更要具体的討論，但是現在関於這幾個问題之一般的路線却有幾句話要說．

我們認為在工人階級中作工的一切共産党的組織以及一切同志，應當利用工人運動中之一切小的甚至於最小的事件，来使他向前進行，假使在某個工廠中發生了工人对工作時间之一点很小的不满意，則做共産党人的應當先活動．做事要非常慎重，不要立刻表示你是共産党員，應當乘机進行宣傳煽動，應當尽可能底来擴大小的问題使他成為階級鬥争，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散佈一切小的傳單標語，只要有小勝利的可能便要引動罷工，等々．共産党人應當鑽入一切有工人的組織中，弟兄会也應當加入，文化團体也應當加入．假使敵人所組成的某個團体，其中有相當的工人，則共産党員一定要加入這種團体，不要他知道你是共産党以致明天便将你捉去了．我们要在這裏面進行長期的有系統的工作，在裏面組織秘密小團体，秘密底印刷標語傳單，要根據某個工廠某個生産某個地方之工人的直接需要来做工作，要不辞仍何的劳苦，要做一切雖然很小的工作．

我在我開始做报告的時候，同志们，我就向你们說过，将来偉大的新的革命高潮之来，或者發生於我们完全不能料到的那個地方，這是完全可能的．例如，我覺得現在中國之反帝國主义的運動便有很大的意义，因為

日本現在已經開始来分割中國，因為廣大的中國民衆，工人，農民，貧民以及許多智識分子，是開始奮了．我们此時的任務尽量底批評我们的敵人，暴露我们敵人的罪恶，指他们是民族利益的叛变者，是向帝國主义投降妥協的．因為在現在的中國真正的沒有任何政党，沒有任何政治派别，沒有任何一般人，能像我们這樣澈底的反对帝國主义．這一種机会是不能錯过的．中國共産党沒有权利将反帝國主义的運動交給任何人，無論是資産階級，無論是譚平山的党，中國共産党乃是要自己活動．

関於恢復群衆運動的口號，我们的態度是這樣，我们不要直接底而要間接底帮助对國民党之請願運動．我们不是要做這種運動，乃是要利用這種運動以揭破國民党以提出我们自己的口号，我们不應當向國民党喊：哎，讓我们進行群衆運動呵！我们乃是要揭破國民党，我们要說，國民党破坏了群衆運動，屠殺了群衆運動，說群衆運動現在必要的．共産党要注意一切群衆的要求，雖然是很少的．更要特别注意那一種要求，如像工人出版自由，工人集会自由等々．這裏一点也沒有机会主义．說机会主义者總提出這樣的口号，簡直是混蛋．假使你们一次二次三次底向工人提議了之後到了　工人自己開始行動的時候，你们又不上這條路而丟棄自己的口号，這是政治錯誤．應當利用一切问題来進行宣傳煽動，總要使着大家知道所有這些要求僅只有在武裝暴動推倒了國民党的統治以後，纔能实現．同志们，在我们革命中之宣傳煽動的方式在各種不同的時期要用各種不動的方法。我还記得我在莫斯科監獄中坐着的時候．這已經是二十年以前了，我遇着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印刷工人，他因為進行革命的宣傳，農民拿起棍子将他的眼睛打坏了．他跑到鄉村中去，向農民說，打倒沙皇．

但那個時候我們的農民是很迷信沙皇的，於是拿起棍子来便將他的眼睛打坏了．為什么呢？因為他接近群衆的方法太糊塗了．我們向農民說，你為什么很辛苦呀？因為我的土地很少．你們那裏的地主有土地嗎？有的呀！有好多？好多．沙皇有土地嗎？有好多呀？好多．呵！沙皇也是個地主呀．在向他对地主怎麼樣，於是他漸漸底自己喊：打倒沙皇．你見了一個信教的人向他說，沒有什么上帝．他一定打你的耳光．你要慢々底告訴他，向他解釋究竟是一 回什么事，則或者結果他也可以加入反宗教同盟 呵．一切都要看对他的態度怎樣，這種態度在各種條件之下，对待各種群衆是各個不同的．在幾年以前當着群衆發展的時候，群衆自己很活動的時候，自然，我們在這個廣大的潮流中想領導群衆是不很困難的．但是到了現在経过幾次嚴重失敗之後，每個工人的腦中都發生了相當的变化．他們都在想為什么我們失敗了呢？有人以為或者我們以前所走的道路是不对的，有的以為這是某人某人的罪过，有人以為這是共產党之怎樣怎樣的搗鬼，有人要懷疑暴動等々的方法，更或者有人要開始說：哎，一切社会主义共產主义都是好的，但是我今天要能多賺五個銅圓却比較更好些社会主义共產主义都不知道是那一天的事情，而我今天想多得五個銅圓，想少做一点工作．假使共產党員聽到這些話便跑去指着工人說：哎唷！你蠢得這樣！豬，你，机会主义者，你糊塗蛋．你連社会主义都不要，只想五個銅圓．這便是絕对錯誤的．不能用這樣的態度来对待工人．我們要告訴他：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助手．我帮助争這五個銅圓．但我的意見，得了五個銅圓之後还不夠，还要加一角．加了一角之後，我說，我們要這工廠中要比較自由一点緩好．這必要推倒資產階級．想推倒資產階級 必要推倒國民党．你想生活好一点么，想看書麼，

那麽，這必需要另外一個社会，這必需推倒國民党的統治，不然國民党干涉我们，不要将工人看成一些糊塗蛋，什么事都不懂的，不要像一個貴族官僚的眼光去看工人，我们要希望在工人階級中能起一個指導者的作用．即令工人是已經被迷惑了，不覺悟，不明瞭，如像有幾省的工人說共產党主張公妻，主張婦女裸体遊行，共產党如洪水猛獸一般，——那么，用這種態度对待工人还是見非常糊塗的．我们对待這種工人需要一種特别的態度．得工人之無智識，不是他的过錯乃是他的缺点．我们正是要与這種缺点奮鬥，只要你们有一点的可能，也要漸々底在鬥爭經驗中，引導他们跟着我们走，以進行以後一切的事．假使我们不能利用一切小问题，来從各方面将工人階級推向前進，則我们简直是加工製造的双層糊塗蛋．同志们，我告訴你们，無論多少，只要那裏有相當的工人，沒有共產党員不進去作工的道理．共產党員應該到處加入一切的團体，到處去進行自己的工作，到處去組織自己的秘密小組織，到處去樹立自己的影响．在現在特别要注意职工会的工作，就是我们敵人所組成的工会，只要那裏有相當的工人，我们都應該進去作工的．自然，我们加入這種組織中，並不是想佔取他们中间的指導机関，而為的是找着与工人發生関係的机会，与他们到一起，去慢々底發展工人階級的鬥爭．這種工作有時需要很長的時間，在那時候不要告訴任何人說你是共產党員，而同時要很有系統底進行工作．我们只有這樣纔能發展自己的工作与建設自己的組織．我们在1905年革命後，我们的組織完全被破坏了，但是經过两三年之後，則所有的空隙我们都填滿了．我自己當時在莫斯科禁酒社裏作工，禁酒社是我们的敵人——莫斯科的商人——為在工人中間宣傳禁酒而設立的組織．我以小學俄文教員的名義加入這個組織，其实以

所教的，完全是另外的東西．我也是参加一切教授会議，與這些大商人们計較金錢的数目，有時所計較的錢乃是他们應當拿出来点神燈来發展教育的．我秘密底進行我自己的工作，誰人也不知道，只有我坐到牢獄之後，他们纔知道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個人都是要這樣做的．要鞏固自己之秘密組織，要加入一切有工人群衆的公開組織．

與工会同時存在的还有弟兄会及其他半封建式的組織．這裏我们也是應當進去的．中國工人現在有的是以互助的基礎而結合成為一個小團体，因為他们懼怕加入公開的工会．這種奇怪的乱七八糟的組織形式，雖然說起来好像是可憐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走進去而佔領着自己的地位．這好像是一種很粗的很下層的而同時是又很精細很基本的工作．真正的革命當决不在乎他每天都高喊着一樣的口号，真正的革命者乃是能在任何困難的條件之下，仍能鑽到各個地方去．雖然在那裏只能得着一個工人，我也應當去．因為由這一個工人可以集聚成為将来的幹部，成為以後的小團体．可以因此而更去奪取其他的群衆，建設我们的組織，鞏固我们党在某個城市中的基礎，以此来復活工人運動，来号召工人争奪集会結社的自由等等．我们要在自己的口号之下，在最後必須以武裝運動推倒現在之統治的口号之下，来進行我们的工作．這就是我们的路線．

Ⅶ、對城市小資産階級的関係及土地問題

同志们，我預先聲明，請你们原諒，就是我無論如何總是还有幾個问題使我不能答覆．你们看得見，我已經說得很長了．我是在尽可能底用極通俗的話来解釋我们関於幾個首要问題的觀点，次要的問題我已經丢下了．我在這裏已經說了許多实际的问題，我認為必是這

樣纔能使你們明瞭我們政策的基礎，纔能使你们在大会之 其他的議事日程上，関於職工運動，軍事工作，組織问題，等々．能根據我们政策之一般的基礎而說明更具体的問題．

現在我想說到你们自己之相互的関係以及共產党对各個階級的関係．在這裏我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非常嚴重而又使人容易糊塗的问題，這就是所謂对小資產階級之関係的问題．自然大家都明瞭，這個问題在中國是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我们與封建的関係是不用說的，他是我们之最有害的敵人，我们只是預備着根本消滅他们．至於对付轉变到反革命營壘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則我所贊成的條文要比較前一個同志在他結論中所說的條文更為嚴厲些猛烈些．應當直接的說，這是我们之最無情最殘酷的敵人，我们已経向他宣佈了拚死命的战鬥．至於関於小資產階級的問題，我却有幾点要說明．在說明這個问題的時候，我首先要表示在相當的程度以内所必要的„謙讓”．就是我認為我自己还不是一個很大的中國專家，不敢說对於許多微細的專門的问題都不会發生錯誤．特别假使我有與事实不相符合的地方，同志们可以改正．我们或者可以因為不真实的报告，对於事实之不正確底知道，而做出錯誤．自然，雖然関於這個问題我们是有國际上各國的経驗，但是或者还可以發生這樣的錯誤．

我認為在這裏面之问題的重心是說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至於我们関於農民问題的觀点則需要特别的研究．最大的问題是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個问題之所以大的，乃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其本身並不是一色的東西，所謂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些什么人呢？這裏有小手工業者，有不僱用劳動力的店主人，並且也有僱用一兩個工人僱用一兩個小孩的店主人，這裏面也有些小商人，

不僱用劳動的．又有僱用幾個店員的商人，這種商人在每次商人店員衝突的時候，都直接関係到他的利益．這裏有許多智識分子以及半智識分子，許多小富户的自由職業者．还有一般站在城市與鄉村之间的商人，他經營農業生産品及工業生産品的交換，賣麵包，賣鄉村暴動用的火柴．你看他们也能供給共産党中之盲動主义者的需要．總之，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城市小資産階級在數量上是一層很大的群眾，他有很大的意义．僅只就数目上說，他在階級生活便已經是有意义的了．我想，首先在我们前面便有這樣的一個问題，我们是否應該很嚴格底将有僱傭劳動的小資産階級及沒有僱傭劳動的小資産階級分别清白呢？我覺得應該分开的．所謂應該分开並不站在道德上說的，並不是說這一個好些那一個坏些，乃是站在政策的观点上．為什么站在政策的觀点上便應該分開呢？因為這一種有僱傭勞動的小資産階級，他直接在工人運動發展的威嚇之下，則是不能成為我们之可靠的同盟者的，就是說他能否成為我们之一般的同盟者，也是很大的问題．假使在我们党前面有了選擇的時候，——應當帮助這些小商店小作坊中之工人運動呢？还是應該犧牲一点工人的利益来用此以拉攏這一層小資産階級呢？很明白底，在這個時候，我们應該與工人合作来反对這些小店東小老板．為什么這樣，自然是不難明瞭的．因為無論如何，這些小店鋪小企業中的工人總算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總是我们比較更可靠的基礎，總是我们自己直接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中的一部分．假使階級鬥爭的形式將在我们前面擺着這樣的问題：與店東以犧牲工人利益还是與工人合作呢？則無論這時候的這一層小資産階級是怎樣在我们前面動摇，我们不加任何爭論底，用不着多說底，去扶助工人来反对小店東．

还有一個问題是比較更複雜而不能立刻簡單解决的，

這就是時常有這樣的情形．工人对這些小東家提出些很大的要求．小東家不能接受這些要求，甚至於破產也不能支持這種要求．於是工人不得已，便自己將這個店鋪拿过来而大家分了他．在這個狀況中我们怎樣呢？在一般底說起来，在現在苏維埃區域中，我们時常將小的店鋪奪过来分了，以後貨物也不能得着，商業也停止了．這種政策我覺得是不正確的．這又是糊塗的政策．為什么這種政策不对呢？因為在我们現在的苏維埃區域中，我们自己还不能組織任何生產．就是要用我们自己國家的机関去經營商業，也还是不成，也还是將来的事．破坏了一切的小商店，這就是破坏一切商業関係，而使自己陷於更困難的地位，使自己不能供給當地人民所需要的生產品．在苏維埃區域中，我们自己要負一切事件的完全責任，因此要非常慎重．在苏維埃區域及沒有苏維埃的區域，有非常大的區別．在有苏維埃的地方，有無生產品以及生死饑餓的问題，我们要对當地人民負完全責任．一切困難是要我们担負，人民是要向我们，向苏維埃政府的．因此在這裏我们所能以停止的商業，僅只是當着我们自己能以組織一点什么東西的時候．假使現在我们还不能去組織，則我们現在便不要破坏．我们可以說得很多，但是若照這樣做了，則我们便沒有商品流通了．然則我们應該怎樣呢？我已為在苏維埃區域中我们的政策應是這樣，我只說一点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假使我们能組織協作社，或者國家的商業机関，或者其他的方法，能維持商品的供給，那么我们便可任意底沒收一切．但是若我们尚不能代替這些小商人，因此我们普通不能用這種方法而應當給他以相當的自由，不然我们便不能維持供給问題．這個问題还需要特別的研究，因為我說了一個原則上的．

假使不在苏維埃區域中，那裏的店員及工人提出了

這樣的要求，他们說：算了罷，将這個商店打了他．我以為假使群衆的心理若是這樣，假使他们正在打這些商店，則我们除了帮助他们以外，别的沒有什么可做，我们不能說，我们站在小東家這一方面而不站在工人方面．

我们不能出来阻碍群衆的要求．自然，我们所尽量做的，在有的時候我们要出来說的，是：提高工資，承認工人的監督权，等々．假使可能，还是要引導他们走這種道路．這比完全毀坏或者平均分散這個店鋪要好些．因為一切分散的本身，都是再造成一些小資產階級，使着以前的店員变成小的店主人．以前是個比較大一点的東家，現在成了四個小的商人．這裏一点共產主义也沒有，乃是很簡單的資產階級的分配．但我们在工人前面不能公開的這樣說，這樣說便似乎表示我们是在阻碍群衆運動．我们在這裏要尽量指導這種運動，使他带着最高的組織性，使他奪取得更多的東西．就是对於這些小主人我们也要提出這樣的要求，如像工人監督市場，監督價格等々．要使着這種運動不是簡單底分散了店鋪就完事，而是要為下一革命階段造成一個相當的組織前提，要教訓工人在他们這一個社会範圍之內，一城中，一縣中，很有組織的發動．範圍無論他大小，或是區，或是州．這種工作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以為对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问题就是這樣．

在這裏还有所謂城市貧民．這不是無產階級同時也不是流氓無產階級．這是些很小的商人，他從来也沒有剝奪过别人，等々．這是一些城市的貧民．我想，這種人在許多地方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沒有理由可以取消他们在苏維埃中的選举权，更不能預先将他们當着我们的敵人看待．相反底，共產党應當企圖奪取這一般群衆．我関於這只能說出非常原則話，如像我们对待這般人的口号，主要的大概是反对借貸資本，反对

高利貸．我们要帮助他们組成協作社或者生產組合等々．在奪得政权之前，我们應當尽量底拉他们到我们這一方面，我们帮助他们與大資本家争鬥，與高利貸争鬥．我以為对待城市平民是這樣．

至於関於農民土地问題，則沒收土地问題我已經說过，関於這些问題我不必答覆了．在這裏我想提出一個新的问題，這個問題将来在你们土地委員会中應該很詳細底討論．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你们的地主在土地数量上是不很大的．你们想奪取農民，那么要使中農——農民中最多的群众，在革命後能得着比較多些的土地．但问題的困難在這裏，你们中國有很多沒有土地的貧農，鄉村中的流氓無產階級，过去現在的兵士，等々，将使所有的土地以所有的人来平均分配，則或者要得出這樣的情形，就是中農在革命以後将要比較革命前的土地还要少些．但這又是一種不可以存在的現象．我認為必要避免這種現象．我関於這個问題很詳細底想了一想，但我終以為需要從别的方面来解决．譬如我们在奪取政权之後，我们可以創造大規模的，工業形式的社会工作，将這寫到我们的党綱上．还有在我们建設軍隊的時候，我们要吸收一些進去．我们还可以将許多人民移到边境去，而在本部不給他土地．請你们想一想，農民起来参加革命，推倒了地主．結果因為領取土地的人民太多了的緣故，使着每一個農民所得耕種的土地反比革命前要少些．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想若是帝國主义来進攻我们的時候，是不是能强迫這一種在革命中沒有得着土地的農民来擁護革命呢？這将是很困難的．固然在我们手中还有另外的方法，在中國這樣國家中解决農民问題的時候，與着土地有同樣重大意义的还有関於稅的问題．或者会有這樣的情形：我耕種的土地少了，但是我的生活将要好些，因為我要少完納幾倍的稅．這或者是中

中國之土地问題中的一個很大的救濟．因此，我们要顧計到這些環境以便在這個上頭来建設我们的政治路線．但無論如何我應該要使你们注意，不用很輕易底任意底提出使土地仍然旁落的要求．怎樣能以避免呢？只有我们預先想出許多办法来安置這些離開了生產过程的人——流氓，兵士，等々．這種方法是要給他们許多非農業生產中的工作．我想有許多的社会工作，修路，築碎石路，等々，还有在我们軍隊中也要安置一部分，等．這些方法对於我们是不奇怪的．（一個代表說——孫中山也這是樣提議的）．他這種提議很好，我们也是要這樣提議，不过我们是站在無產階級之基礎下說的，不是站在全民的觀点上說的．因此，事情我覺得就是這樣．

固然，由湖南及还有幾個别地方的同志，說共耕也是一個出路．說共耕是大家共同耕種，並可以提高生產力等々．我應當說，我很尊重共耕這件事以及由湖南這位同志所作的报告，但我对他仍然有幾点懷疑．說什麼八小時的工作制，說一切都是很好的，這是我所懷疑的．我覺得事实上不会像他說的這樣百分之一百底完善．自然呵，我们應當尽量的用這種共耕的方法．中國之一切氏族生活的遺跡，我们是可以利用而使他仿效社会主义的樣子．這是我们應當做的．但要知道這是一個很長的時期，而不能像有位同地說，在現在不必注意自耕農．這句話是不对的．他们变成協作社的会員或是共耕的分子，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在這以前總是需要我们对於他有很大的注意．

這些都是関於農民土地問題之一些大概的說明．

VII．蘇維埃區域中之紅軍問題．

現在說到関於在你们苏維埃區域中所有的紅軍．我不必說関於在軍閥之軍隊中必要作工的問題，因為這個

問題同志们都說过了，都說得完全正確的．我也不必說到在軍隊中之組織問題，建設支部的問題，因為這些在我们討論到組織問題的時候，再去專門研究．我只說到我们現在所有的紅軍問題．我應當說的，共産國际实在　給了中國一個訓令，這個訓令对於有幾個同志没有發生好的印象．我们發去了一個這樣的訓令，說中國紅軍不應該集聚於一個地方而應該在幾個區域中．我不知道，或者我们錯誤了，但我想没有錯誤．但是我想向你们解釋，究竟為什么我们發出這樣的訓令．我们發了這樣的訓令，以後事实也証明我们是对的．因為我们覺得在一個農民區域中若集聚了這麼多不生産的群衆，紅軍，雖然他们再紅些，再四倍的紅，但他们總是些活的人，需要飲食的．一個同志說，在鄉裏做工生活好些，因為鄉中有雞吃．那麼，他们是農民之一個很大的負担了．農民在開始的時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怎樣奮鬥，殺了好多豪紳等々，但是过了幾天之後，農民要說：他们很好，很辛苦了，奮鬥了，殺了好多豪紳，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後一個老母雞吃了．次一天則這樣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這樣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後便有人說，見了鬼，什么紅軍，还要我的米我的雞給他吃．或者，紅軍是好的，但是难得維持他．他也不與城市發生關係，他又没有銀行，又没有商品．你们想想，到這個時候便　知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我们以為到這個時候，農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紅軍，雖然紅軍在開始是因為農民而反对了豪紳的．事实上這樣的情形已經開始表現过了．因此我们認為我们不要将紅軍聚到一個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幾個部份．三部份，四部份，看當地的條件怎樣．分聚到各地方，經個相當的時間　再轉一個地方．到這個地方住一些時，殺一殺豪紳，吃一吃飯，喝一喝雞湯，再到另外一個地方．到另外的區域

中，还是照樣底殺土豪，吃雞，过了相當時間之後再前進．當着他住在這一區域的時候，他可以变成一個農民的民團，来保護農民，来尽一個人民自衛軍的作用．以後再繼續前進，去進攻另一地方的地主，豪紳，於是在那裏又可以吃一吃雞而又到別處去．這樣也可造成一個組織的連繫，時去時来，都帶着一定的任務．不然，便会像一個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到某一個地方，在那裏大吃大嚼個争光．這就是我們這個訓令的解釋，来減輕這種現象的困難．究竟对不对，我們現在可以爭論，但我認為是对的．我所以要加以說明的，是要使同志們明瞭國际這個訓令的意义；並不像有幾個同志所說的：哎唷！共產國际想解散我們的紅軍，因為他現在只想做群众工作而不做暴動了．無論如何這總是很大的机会主义．我說，同志們可以相信這裏一点機会主义的氣味也是嗅不着的，這裏或者可以嗅一点農民的雞味，因這点雞味可以與農民發生相當的誤会。

IX. 結論

在結論上我想說幾句关於共產國际的話．我直接說共產國际是做了錯誤的．关於這点錯誤許多同志都說过，但是同志們都是很巧妙底很客氣底說出来的．一個同志說：你們馬林（Маринг ）怎樣怎樣說，這一個又是怎樣怎樣說的，這怎樣解釋呢？問題是說得非常精巧的．一個同志的結論是很对的，共產國际的代表並不是個個都經过考試的．不錯，不但如此，我們還做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不派代表比較派那些做錯誤的代表还好些．你們問我：你們可否給我們派一個不会做錯誤的代表，或者給一個很少錯誤的代表，若是在世界上不能找着一個從来也不做錯誤的人，則給我們一個做錯誤做得最少的代表．則我的答覆便是，关於這個问題我們已經想了整年了，但我們还沒找着一個可以派去的人．

因此國際执委决定了一個這樣的計劃 — 就是将你们的代表留兩個到莫斯科．這樣便是經过你们的好代表以與中國共產党發生関係，以與我们共同来实現共產國际对於中國共產党的指導．

同志們，我还有一句話要說，我以為在你們這次大会上所選擧出来的中央委員会，要注意提高党内之一般的理論水平線的問題．要發行許多関於馬克思主义列寧主义的書籍．我以為你们應當發行許多很通俗的小册子，因為你们已經有了一些関於許多重要問題的書籍，如像不斷革命論，如像革命中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階段，等々．這些東西應當散佈在党的幹部分子中間．但是你們还沒有很通俗的，為工人寫的東西．沒有這些是不能傳佈正確思想的，不能教育廣大的党員群衆的．我以為這也是一個非常之大的任務．関於直接暴動的問題愈是嚴重，則在直接暴動之前愈是應該利用机会以提高一般党員的政治水平線．這是一定應該做的．應當使我们所得着的這些經驗，為全体党員所了解．這自然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做．例如假使我在你们大会上不是這樣通俗的說，則我大概要少費十倍的時間，這是絕对明瞭的事．我们有時需要用很長的時間来寫来說，就是因為要使他更通俗的緣故．我認為你们中央委員應該要做一件事．

同志們，我以為你们在這個大会上所表現的，大概總算全体一致的，這並不是那一種的一致，如像《我與以前一切同志的話都同意》而事实上一点也不同意，這一種形式我以為是外交的，我所說的乃是真正的共產党人的波尔塞維克的一致，乃是我们找着了全党将一致通过的政治路線，我们所有負責的同志以及代表大会都完全自信底接受了這種政治路線上，在這種路線上要鞏固要團結我们全体的同志．

我應當說的，若是一種狡猾的政策，欺騙的政策，外交式的奸詐，等々。對待我们階級的敵人是完全可以用的，而在這一点說来，中國共産党員实在完全是一些忠享長者．不獨中國共産党員，就是羅易，他將共産國際之秘密的電报拿給汪精衛看．但是馮玉祥一面在槍殺工人，一面还給共産國際打個電报說，我完全贊助共産國際，世界革命萬歲！而我們的人却　拿着自己共産党的秘密文件很真誠底給他们看．這種人完全是做得糊塗，愚笨，共産党的政策是不能這樣的．

但是在我們党内部，在我們自己的幹部中，我們必需建設更密切的関係．我知道你们中間的糾紛並不是立刻可以消除得尽的，一定还有許多做朋友，做仇敵，彼此扯後腿的勾當．但是要有正確的意旨，要用所有的力量来肅清這一切糾紛而大家走共同合作的路．我再重複底說，應當拋棄各種成見，拋棄這些難以想到的話．在我们腦中不要藏留任何印板式的意見，這些印板式的意見時常是沒有包含什么实際意义的．一切共産党員不用像那一些弄把戲的人樣，不要故意由他個人口袋中連續不斷底扯出許多怪物来，一個不斷革命論，一個机会主义，又一個不斷革命論，又一個机会主义等々．不要像玩把戲一樣，他肚中可以吞一把刀子，故意使別人驚奇，其实這不过是野蛮罷了．應當使着全党都能明瞭這些很簡單很基本的東西，在這一個階段上我们已經被打傷了，失敗了，我们現在首先應當强健自己，集聚自己的力量，整理我们的隊伍．並不是為的坐在那裏不要再動，乃是為的發動群衆，以更大的力量来引導他们反对封建地主，反对資産階級及帝國主义者．要知道，不要尽鬧関於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轉变為社会主义革命的笑話，不要抱住這個革命這個字不斷底去清談．要知道，决定革命的是群衆工作之廣大的發展，是廣大的群衆運動．

在中國住着非常廣大的群衆．我在你們大會上出席了三次，但這三次我都指明這一個中心的任務．所有的同志都應該注意怎樣能團結中國之最廣大的工農群衆，所有的同志應該注意怎樣使我們共產党变成廣大的工人階級的政党，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党．一切的小派别，小糾紛，——無論他是由那一些最好的同志所組成的——都應該取消，應該使党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强有力的無產階級的群衆的政党，要能以引導最廣大的數萬々的農民．只有這樣你們的党纔能完成你們的歷史任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在中國的事实上——不是紙上，不是新聞上，不是演說上——纔真正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过程，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應當明瞭，並且應當記着，関於革命速度的問題，関於期限的問題，什麼時候纔有真正社会主义的問題，不是用决議案可以解决的，不是用演講談話可以解决的，乃是要階級鬥爭的实际行動去解决．當着群衆問你们什麼時候引導他們上战場的時候，問你們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勝利的時候，你們應當将我在大会上的話答覆他們．你們應當說：當着我們健全了的時候，當着我們組織好了的時候，到那時候我們便引導一切群衆去上戰場，到那時候我們總不會成一個《敗軍之将》．只有我們将群衆真正團結好了的時候，這些群衆總去上戰場，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纔能保証着我們全世界的歷史的勝利在你們這個古文化的民族中，你們的勝利将是以英勇的中國無產階級為領袖以中國共產党為領袖．我代表共產國際执行委員會號召你們走向這個全世界的歷史勝利的大道．鞏固着我們的隊伍，勇敢底前進，高擧着我們光榮的有價值的共產主義的旗幟．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КУТК.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6.

Мосгублит 30082 КУТК. А438-439 т. 1000 экз. 1928 г.